

提 要

第一章 正确认识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形势和任务

一、当今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事务中起着主导作用,它自身还有发展的空间和潜力,社会主义力量还没有成熟到能与其相对抗的地步,由此决定当今时代的性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历史局限性没有改变,时代的发展方向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 20 世纪产生的新事物,将在向资本主义学习并同其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和成熟起来。代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将是社会主义新时代。

社会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遏制不住的新生力量。社会主义在 19 世纪中叶孕育产生,20 世纪的 100 年里从小到大,不断发展。资本主义视其为洪水猛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21 世纪的主要故事情节

仍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生产力的空间。但是,发展生产力的潜力最大、空间最大的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潜力还不是发展生产力的现实。潜力要变成现实,就有一个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战略及其变化——试探,恫吓,遏制,热战,冷战,和平演变,发动战争,都是由双方实力对比决定的。社会主义力量可以和资本主义力量抗衡时,资本主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会搞和平演变;一旦资本主义的力量明显强大时,它就会毫不犹豫地优先使用战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不管其方式如何变化,其性质永远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

改革开放使他们有利可图,所以会有和平共处的一段时间。

二、国际资本主义

当代国际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内部不平等的世界。当代国际资本主义国家分三个质量等级:美国是第一等级,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是第二等级,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是第三等级。处于第一等级的美国在剥削着处于第二等级的日本、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处于第三等级的东南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第二等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剥削着处于第三等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些国家20年积累的1200亿美金的剩余价值被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毫不留情地掠走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弱肉强食。弱肉强食



规律决定了其利益配置是等级配置,力量等级决定利益等级的配置。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个结构被历史所验证。即便现在世界上没有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也一定会造出一个美国来。这是一个历史的逻辑过程。不管是美国也好,是一个别的什么国家也好,它的本性都是剥削,其外在表现是侵略、扩张。资本主义的内部规律决定了其内部必然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总是最强大者处于塔顶,剥削和控制着处于中部和底部的那些国家。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用自觉的社会主义政治结构来抵制国际市场经济自发的经济结构。如果搞资本主义,我们的经济实力处于金字塔底部,就必然像其他大多数发展不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受处于塔顶部和中部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控制。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今天不争的事实;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的真理,是明天不争的事实。

三、马克思主义是个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科学体系,一个总是面向未来开放、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体系。这就是说,它本能地接受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有能力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就意味着,这个理论留有发展的缺口,它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在马克思的缺口里产生了列宁主义,解决了在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在列宁的缺口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

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毛泽东的缺口里产生了邓小平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建立之后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从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一个专有概念并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的情况看，它们确实是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的主线，就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如何发展。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样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回答了一元为主、多元并存，开放中接轨不并轨等理论问题。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就没有邓小平理论；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经典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之脉

马克思主义经典核心概念是一脉相承之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脉相承之干。阶级和阶级分析是共产党的逻辑起点。没有共产主义就说不清社会主义，仅有共产主义也说不清社会主义，只有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放在一起，才能说清社会主义。放弃核心概念等于自我解除武装。

五、政经异构、阶级谱系

从理论上讲，党的干部是穷人，可能会有很多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现实生活中并非完全如此。这恰恰说明讨论本命题的现实迫切性。我们承认有相当一部分党的干部通过种种方式已经拥有可观的积蓄了，仅仅由于党的各种规定的约束、群众监督的约束、社会舆论的约束还有一些作用，使得这些灰色积蓄一不敢公然转化为奢侈



的高消费,二不能转化为生产资料,憋在那里,藏在那里,一旦东窗事发就是“不明收入”,成为烫手的心理安慰。这些矛盾正是“异构”造成的。它们成为一部分干部主张“私有化”的动因,希望藉私有化使这部分灰色积蓄转化为公开的、安全的、可以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党变质已经具备一些直接的内因了。正是这些现象使群众减少了对党的信任。

在人类历史上,政治与经济同构是普遍现象。奴隶社会,奴隶主富有,奴隶贫穷,奴隶主统治奴隶,富人统治穷人,是同构;封建社会,地主富有,贫农、下中农贫穷,地主统治贫下中农,是同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富有,工人贫穷,资本家统治工人,也是同构。同构的金字塔结构,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人阶级作为个体是穷人,共产党的干部是穷人(腐败分子除外),但是是执政者;非公有制企业的老板是富人,但是在政治经济结构中处于被领导地位,是被领导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穷人领导富人的政治经济异构现象,这是新的执政课题。这种倒金字塔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毕竟是少数,靠国家救济生活的人也是少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小康”型家庭是大多数。这就是两头小中间大阶级谱系的基本构成。只有处于两头小的这部分人才会具有执政意识与执政能力的可能性。这是少数领导多数的基本规律。

六、一身二任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她从建立到现在,一直是一身二任。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28年完成的任务是资产阶级应该完成的任务,是替孙中山完成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曾一度认为,可以集中精力完成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完成的任务了,在经济建设中单纯使用无产阶级的这一套了。1956年以前,我们党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主要任务。“一大二公三纯”的思路,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端,搞到只有教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的程度,相当一部分已经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开始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仍然要一身二任,既要完成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任务,又要继续完成资产阶级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任务。

第二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的建设 面临的新问题

七、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损人利己是其外部性的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市场活动中,个人成本、收益的差别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成本外化和收益内化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贫富两极分化和分配上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市场经济具有侵蚀性,它会用自己的一套来侵蚀共产党,使共产党变得和它一样。目前存在的党风问题、腐



败问题、党员干部蜕化变质问题,都是市场经济对党侵蚀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机制是指向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共产党人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身上剥离下来,移植到社会主义身上,目的是要充分利
用其发展生产力的一面。共产党只允许市场经济的原则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不允许它进入政治领域,不允许它对政权的性质施加影响。

八、党性原则与市场原则的对立

共产党的原则与市场原则多数是对立的。共产党的原则是大公无私,市场的原则是自私自利;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共产党人的价值标准是贡献大于索取,市场经济人的价值标准是索取大于贡献。二者无法也不能接轨。如果听任市场原则取代党性原则侵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党就有变质的可能,其蜕变的第一步就是成为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

九、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历史局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这里主要指产业工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局限性开始显现出来,其主要表现是:政治上,政治主体意识比较薄弱;经济上,经营管理能力不强;文化上,知识文化水平有待提高;劳动态度上,劳动主动性还不高。

十、国有资本的二重性

社会主义国有资本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新形态的资本力量,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主要

结合点,是社会中多数人和资本的结合,是资本的高级形态。国有资本是按劳分配的资本基础。国有资本的范围有多大,按劳分配的范围就有多大。如果按资分配的比例过大,就会削减按劳分配的积极性。国有资本既具有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基本属性,又具有与私有资本相同的求利性、积累性、扩张性。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是资本,生产的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接轨之后,国有资本必须把二者都接受下来,形成国有资本主体的二重性:资金和资本。这种二重性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具体化,是推进国有资本进步的内在动力。

十一、国有资本人格的二重性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以资本作为竞争主体的身份进入市场时,同样必须有人格模式的规定性。市场主体的本位主义要求国有资本的外部表现应类似“经济人”。国有资本的全民性质规定了它本质上是“资金”,相应的人格是集体主义。国有企业“资金”、“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其人格的二重性。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应该成为真正的所有者代表。党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国有企业董事会的灵魂。党是无私的,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也应该是无私的。这里所说的“私”,仅仅是指个人的一己私利。国有企业的董事会代



表的是国有资本,要体现资本的性质,为本企业赚取最大的利润。

十二、一元为主,多元并存

真理必须是一元的。但是,对任何一个事物的认识,在前真理阶段都会存在多元的状态,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逐步成为一个一元的東西。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说法,争取在下个世纪初建立起来,目前应该说也是处于前真理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得不允许多种多样的运行方式并驾齐驱地竞争和探索。我们党现在实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针,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一元为主体、多元所有制并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形成一元为主导、多元并存的社会意识状况。一元为主体的多元并存,就是多元存在,一元领导。本质的东西必须是一元的,作为领导的那部分事物必须是一元的,基本理论必须是一元的。

第三章 提高党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执政水平

十三、党要学会驾驭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头脑清醒、胸怀宽广、勇敢顽强、善于斗争的党。为了发展经济,为了富民强国,我党清醒地主动地请来了与自己的原则完全对立的市场经济,请来了

自己的对立面,形成了市场竞争的格局。这说明,共产党自信自己居于高于市场经济的位置,有能力、有信心驾驭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经济机制是指向资本主义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与共产党的原则多数是对立的,所以,共产党决不能让市场经济的原则任意发展,否则,社会主义就会变成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必须驾驭市场经济。驾驭的条件和基础,首先是坚强的党;其次是雄厚的物质基础——公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实力强大,在涉及经济命脉的主要领域处于控制地位。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和基础,共产党才能驾驭市场经济、利用市场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十四、国有企业在市场中要强化集体主义的自利观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私与自利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反对自私,但认同自利。国有企业在市场中从集体主义的本位利益自私,是由“国有资本”的性质决定的。“资本”的性格本质是自私的,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实现增值的载体,也必须具有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国有企业对政府来讲,有独立的本位意识,有自私的成分,在照章纳税的基础上依法保护自身利益。

十五、公有制企业劳动力不完全归个人所有

纯粹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最终必然走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劳动力是有差别的,有的智力高,有的智力低;有的身体强壮,有的身体弱小。如果劳动力完全

归个人所有,如果搞纯粹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智力高、体力强的劳动力得到的劳动报酬肯定多,智力低、身体弱的劳动力得到的劳动报酬肯定少。得到劳动报酬多的劳动力,必然产生消费不完的那部分剩余,剩余的积累就会形成资本。如果这部分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剩余价值率,扩大生产规模,则必然会雇佣其他劳动,雇佣无法积累的劳动,因此产生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与对立。到这一步,这部分资本就要要求分配权。完全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是两极相通的。两个极端一种本质,本质在劳动力的完全私有。资本参加分配超过一定比例之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是死劳动。我们要坚持劳动力不能完全归个人所有,捍卫活劳动分配权的优先地位。

十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公有产权占主体地位的股份制企业中的工人才有当主人翁的资格,才是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是他们在支撑着执政的共产党。受雇于私营企业的工人与私营老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买卖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支撑不起执政的共产党,没有资格当主人翁。在国有企业中,管理人员、知识分子从阶级属性上看,也是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整体中的一部分。企业法人是完整的人。国有企业的工人只有使本企业在竞争中成功并发展,才有能力成为真正的主人翁。国有企业亏损了、倒闭了、被私营企业兼并了,国有企业的工人

也就成为“亡厂奴”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能仅仅依靠政权的保护。工人阶级必须在市场竞争中增强本领,独立自主地争得并巩固主人翁的资格和地位。工人阶级是否有独立完整的主人翁资格和地位,最终决定共产党的性质与政权的性质。党要顶天立地,顶马克思主义之“天”,立工人阶级之“地”。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的党就会偏离自己的政治方向,就会改变自己的性质;离开了工人阶级,就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党的性质同样要发生变化。共产党要想不发生质的变化,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第四章 面向未来 迎接挑战

十七、勤奋学习,做好理论准备

邓小平理论是旗帜。旗帜就是方向。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为我们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新的强大思想武器。全党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以党的十五大为标志,我国进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发出了关于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后,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正在全党兴起。

十八、搞好“三讲”,做好思想准备

全党在县以上领导干部、领导班子中进行“三讲”集

中教育,是我们党为迎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所作的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整风的精神进行“三讲”集中教育,认清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明白“三讲”集中教育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命题。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掌握驾驭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主观方法,要经得起市场经济和执政两个方面的考验。

十九、纯洁队伍,做好组织准备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环境,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等事件,进一步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未改和亡我之心不死。为了发展经济,我们党请来了外国的资本主义,培育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对于共产党来说,这些资本主义是锋利的双刃剑,既有发展经济的一面,也有腐蚀灵魂的一面。党的干部,大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小到普通党员干部,被资产阶级拉下水者数以万计,并且,这种状况仍在继续。只有纯洁组织,清除腐败分子,增强党的战斗力,才能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党同它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自发的、自动的、客观的联系。党离开自己的阶级基础,就有变质甚至瓦解的危险。

二十、防止党的庸俗化

党的庸俗化问题,实际上就是党的低标准问题。你是党的领导干部,但却用一般党员或普通群众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就是庸俗化。庸俗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

么大的危害,其实,它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从好变坏的起点,是最危险的一个东西。没有从好变坏的这个起点,就不会有从好变坏的整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这个人,这个政党,就永远处于最先进、最坚定、最有力的良好状态。庸俗化的内容,大致有职业化、技术化、资源化三个方面。职业化,就是党政干部把自己的工作岗位看成是自己的职业。作为国家机器里的人,如果把自己看成目的,他就变成了官僚;技术化,这个技术是广义的技术,不只是指自然科学。它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的“道”和“术”关系中的“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说的“道”是道理,“术”是技术、手段、招数、战术。我们一定要学会统帅和驾驭“术”,而不能把政治上的“术”看做是最重要的东西。资源化,是指用本部门、本位置的权力就一定会带来实际利益。权力后面都有资源,这是执政党无法避免的。权力资源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向意识形态的挑战。

二十一、培养造就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即共产主义接班人,是一项事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能否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能否实现的战略性工程。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这项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要求,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需要,是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二十二、加强和改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表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得到巩固。相反,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不能完全避免遭到削弱、甚至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党既可以站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列,也可能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吞没。因此,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变已经过时的领导方法,研究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巩固执政地位,提高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水平。

前 言

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显示了、并将进一步显示出很多优势：

竞争机制给竞争圈里的市场主体(单位)以压力和动力。

竞争促进降低成本,降低价格。

竞争促进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

竞争促进满足需求,要求生产供给方不断跟着需求走,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改进服务。

竞争促进竞争者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加强自利、自主、自强的意识。

市场经济体制对提高微观经济效率有较大的作用;对调整供给—需求关系,调整产业结构有自发、自动的作用;适于组合(织)多元经济、多元文化并存,为社会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空间或土壤。

在我国,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现在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如果市场秩序能够进一步严格,人的意识能够进一



步与之相适应,交通、通讯能够进一步发展,还有更大的潜力。

市场经济是必经之路。

在这条路上,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现在暂时高于我们,但20年改革实践表明,我们的发展速度并不慢。我们在20年间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秩序与资本主义用了200年发展起来的水平相比也并不低很多。这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功劳,也有社会主义容量的功劳,而最大的功劳则在于共产党的领导。经过20年探索,转型速度之快、转型幅度之大,第一归功于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归功于共产党站在市场经济之上,不到市场中去争利,因而能够清醒地、主动地、自觉地领导这场历史转型。放出瓶子的“魔鬼”不能收回,而要学习和掌握驾驭“魔鬼”的本领。驾驭的前提一如转型的前提:共产党应使自己党性原则仍然高居于市场原则之上,保持自己的清醒、主动和自觉。高于市场才能驾驭市场。这就是挑战。20年笑着走过来了,我们自信还可以笑着走下去。为了笑着走着,走着笑着,我们必须仔细、认真地研究我们是不是我们;研究我们还需不需要仍然是我们;研究我们怎样坚持是我们。

只要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一定会比过去的市场经济有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快的技术进步,更好的满足需求。

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正确认识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形势和任务	(1)
一、当今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	(1)
二、国际资本主义	(24)
三、马克思主义是个发展过程	(28)
四、经典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之脉	(38)
五、政经异构、阶级谱系	(48)
六、一身二任的中国共产党	(59)
第二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64)
七、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64)
八、党性原则与市场原则的对立	(75)
九、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历史局限	(88)
十、国有资本的二重性	(100)
十一、国有资本人格的二重性	(107)
十二、一元为主,多元并存	(112)



第三章 提高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水平	(122)
十三、党要学会驾驭市场经济	(122)
十四、国有企业在市场中要强化集体主义的 自利观念	(135)
十五、公有制企业劳动力不完全归个人所有	(144)
十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153)
第四章 面向未来 迎接挑战	(159)
十七、勤奋学习,做好理论准备	(159)
十八、搞好“三讲”,做好思想准备	(172)
十九、纯洁队伍,做好组织准备	(179)
二十、防止党的庸俗化	(186)
二十一、培养造就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196)
二十二、加强和改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	(207)

正确认识党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形势和任务

一、当今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

时代问题是对国际阶级结构的长期判断,是分析国际矛盾关系的长期判断,是对无产阶级执政党历史任务的长期判断。认识时代问题,首先要确定时代的性质。我们这里所说的时代,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时代概念,它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大的历史阶段。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相继经历了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进入20世纪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竭力向全球扩张,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日益加深。因此,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有一种流行的提法,即世界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时代。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曾乐观地讲是东风压倒西风。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和苏联闹翻了以后,这个提法不怎么讲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

平同志讲“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①。当时我们一些同志也把它说成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没有直接用和平与发展命名时代。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讲，当今时代到底是什么时代？目前没有明确的或者规范的说法。和平与发展对时代的特点进行了描述，但用其命名时代是不妥的。认识时代的规定性应该回到列宁对时代的定义的方法上。列宁曾指出：区分时代不能根据“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而是要确实弄清，“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这就是说，哪个阶级在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谁说了算，这个时代就应该命名为哪个阶级的时代。按照这种思路，我认为，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

在我们这个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确实在国际关系中起着决定作用，是当代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点由于苏东剧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变得比较清楚了。首先，从苏东剧变这个历史现象来看，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中，确实取得了暂时的局部性的巨大胜利，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了暂时低潮。苏联瓦解的影响可以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这件事表现出来，尽管中苏之间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正确认识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形势和任务★

有矛盾和对立,但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过去毕竟大大牵制了美国的力量,使它不敢为所欲为。社会主义苏联消失以后,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就占绝对优势了。其次,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角度来看,这在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从整体上讲,我们是在向资本主义学习。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市场经济不是我们发明的,是资本主义发明的,而且被资本主义认为是它最独特的东西。现在我们要学习这种打上资本主义印记的市场经济,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作的让步和妥协。向对手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妥协、承认,即承认资本主义也有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当今世界,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军事领域,主导者确实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命名我们这个时代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是经过 20 世纪上半叶剧烈的斗争发展来的。主要是 20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三次大危机,即由垄断资本主义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和 1929—1933 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三次危机都使资本主义面临灭顶之灾,一些有亲身经历的老人提起当时都不寒而栗。三次危机提醒了资本主义,迫使它采取一些措施解决自身的矛盾和问题。当资本主义原有的矛盾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的时候,也说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潜力。这一方面证明了列宁 20 世纪初对帝国主义的判断是正确的,帝国主义有严重危机的存在



和垂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资本主义在克服危机和调整自身机制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调整，从而使其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一直处在没有大的危机发生的相对平稳发展过程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小的危机发生，比如 1967 年从法国开始并蔓延到欧洲许多国家的“五月风暴”，但基本上都是调整性的，没有发生危及资本主义生存的政治斗争，也没有新的社会制度出现的可能性。

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原因，一是不能忽视分析 20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三次严重危机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二是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危机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和潜力。三是要充分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具体形式——跨国公司的作用。跨国公司不是简简单单的经济组织，它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强国之间建立了一种经济领域和微观层次的联合。一方面跨国公司经济力量非常强大，目前世界上共有各类跨国公司 4 万多家，它们的生产总值已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 40%，控制着世界贸易额的 50% 以上和国际技术转让的 75%。有资料显示：西方 7 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前 10 名，生产总值相当于这 7 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 GNP 总和。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首脑可以直接参与国际重大事件的解决，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重大事件，离开了跨国公司，离开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势力是解释不了的。四是社会主义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能够与国际垄断资本主



义相抗衡的地步。20世纪上半叶,虽然社会主义比较幼稚,但从力量对比讲还是可以与资本主义一搏的。但从下半叶开始,社会主义一直在进行内部经济发展和体制调整,严格讲我们的迈进不够大,而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和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从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学到了很多新的办法。比如非竞争性质的国有企业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就是从苏联学到的,现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比例都相当高。另外,施行全面社会保障也是从苏联学到的。二战后,在社会党的推动下,欧洲一些国家也开始施行了一大批社会保障措施,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现在回过头来看,凡是资本主义能够大面积学到的东西,都不是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应该说是属于资本主义阶段、范畴的东西或者是中性的、非社会制度性质的。也就是说,早期的社会主义是沿着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进行了一些发明创造,然后又被现在的资本主义学过去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干了资产阶级的的工作。相类似的是,苏联也在资本主义历史段落里做了新的创造。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趋同论”、“补课论”实质上是因为对一些事物的性质没有从本质上定义准确。正是上述四个原因,决定了当今时代的性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有什么特点呢?它确实既不同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它是以国际垄断为特征的。这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了一种微观形式上的联系,矛

盾有所缓和。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由于跨国公司的出现,产生的可能性确实大大减小了。首先,欧洲各强国之间没有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好像没有国界一样,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准备的。其次,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虽然有矛盾和摩擦,但跨国公司的相互渗透日益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关,难以打仗。所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不是铁板一块,但情况与20世纪初已大不一样,20世纪初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主动去打仗,现在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不愿打仗,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有逐步减小的趋势。在这个时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跨国公司,已不完全是经济组织(只有资本主义的中小企业才像是一种纯经济组织,才仅仅是靠竞争取胜的),它有一部分利润是来自超经济手段的,是通过政治斗争得来的,这也是我们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来对时代性质进行定义的理由。

在明确时代性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时代的发展方向。时代的性质和时代的发展方向是对立统一的。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但时代的发展方向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没有形成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力量之前,虽然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代,但它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问题在于,在这



正确认识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形势和任务★

个时代,社会主义的进步、工人运动的发展,还有赖于向资本主义斗争与学习这一历史过程。因为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旧制度中成熟以后才能真正代替旧制度。过去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内部成熟以后,才夺取政权,才代替了封建制度的。而社会主义只有在某个国家内先夺取政权,才能成熟起来,代替资本主义。这在局部的表现形式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从历史规律来看,从整个世界的范围看新社会制度还是要在旧制度内部成熟起来,才能代替旧制度。把中国放在全球背景下来看,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在旧制度的包围下通过向资本主义斗争与学习而逐步成熟和发展的过程,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在世界历史过程中看也体现了当今时代的性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毛泽东同志生前曾三次接近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前,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提到我们要搞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开展,我们党丢掉了搞新民主主义的想法开始批判五种经济形式并存。第二次是1956年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半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想搞点资本主义。当时出现了两类问题:一是市场受到影响,产品和服务质量差,群众生活感到不方便。二是原来的资本家口头上接受改造,但还在搞地下工厂、地下商店,而且还拿定息,一年拿上百万、几百万,钱没有地方花。对于后一种情况黄炎培先生给毛泽东同志做了反映,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于是1956年12月5日、7日、8日三天晚上连续开座

谈会,提出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的设想。毛泽东同志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淡季合规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肯定了竞争,也肯定了资本聚集。他认为国家资本不够,私人有钱也可以开工厂,这样就可以把那些闲散资本的力量调动起来,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但这种思想活动到1957年反右时又突然终止了。第三次是严重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又讲到要肯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特别是后来苏联讨债、撤走专家,加上自然灾害,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时中央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倡导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又提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必须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这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又重新回到了商品生产上。后来到了1964年开始“社教”和“四清”运动,这种想法和做法就都放弃了。列宁在去世前也在理论和实践上接近过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即“新经济政策”时期。但在1929年,被斯大林放弃了。

为什么中苏两个在历史上起过伟大作用的领导集团都曾经接近过市场经济,又都中止了呢?这仿佛是一个历史的谜。但若把它放到时代大环境中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们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理智地思考社会发展道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毕生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对无产阶级怀有深厚的感情,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急切向往,使他们与市场经济失之交臂。这实质上就是时代性质与时代方向的斗争。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力量弱小、脆弱与简单、幼稚的一个侧面。表面上看是领导人的具体设想,实际上是由时代的性质决定的。1979年我们走上改革之路时应该说比1950年发展多了,1999年的中国比1949年的中国强大多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坚定地走改革开放之路,搞市场经济呢?这是时代的性质决定的。

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是最有发展潜力的新生力量。我们必须在本质上保持我们独特的性质,只有保持我们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才能超过资本主义。单靠学习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的东西追赶资本主义,是永远也超过不了它的。新生事物要在旧事物内部,在同旧事物斗争并向旧事物学习的过程中成熟起来。比如市场经济,我们要在学习、熟悉的过程中驾驭它。在未来的世纪中,随着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深化和代表新的生产力的社会力量的发展成熟,代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将是社会主义新时代。

认识时代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应的,是因果相关的。党的基本路线也有国际性的时代根据——四项基本原则来自时代方向,改革开放来自时代性质。

当今时代,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遏制不住的新生力量。19世纪中叶,地球上孕育、产生了社会主义。20世纪这100年间,社会主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资本主义视其为洪水猛兽,想尽一切办法要消灭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种斗争仍在继续,21世纪的主要故事情节仍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将继续发展下去的信号。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事件,也是一个标志着历史阶段性的事件。挖掘其全局性提示和历史阶段性提示,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国际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的现实,面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起的咄咄逼人的猛烈攻势,需要冷静思考,搞清楚与目前国际政治有关的问题。我认为,要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认识问题。

1. 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关于国际政治的内容。国际政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对国际问题认识与国际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全党对国际形势认识的新成果。8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经过对国际问题的深入思考,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这个判断不仅涉及对当今国际问题的总体认识,而且关系到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总体布局。改革开放前,我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世界大战马上来临,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改革开放后,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时期,在一系列政策上做了调整,把很多建在三线的大型工厂外迁,把一些尖端科研机构、先进工业项目部署在前沿,如开发上海浦东,等等。对国际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使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驻南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后,我们尤其需要进一步全面理解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中“两个一脉相承”和“两个衔接”的精神。中央一再强调,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一是和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相衔接,二是和“三个世界”理论相衔接。邓小平同志说:和平主要是东西问题,发展主要是南北问题。东西问题与国际阶级斗争理论一脉相承,南北问题与“三个世界”理论一脉相承。

50年代前后,我党基本上是按照国际阶级斗争理论

来处理国际问题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政策,毛主席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西风”的概念,是按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来分析的。尽管后来又提出了“反修防修”,但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个理论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阶级分析方法的真理性来自阶级矛盾的客观性。过去,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列宁说的,真理再多走一小步便会变成错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消除“左”的影响时,一部分同志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抛弃“阶级斗争”的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他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阶级与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经典核心概念、元概念。新时期国际政治的指导思想,如果抽掉了这个概念,就没有“一脉相承”和一元化理论。过去,国际阶级斗争理论在指导实践过程中存在局部简单化的问题,但阶级分析的方法本质上是对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有着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使地球变成一个整体,把资本主义推广到了全世界。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与利益

问题、力量问题有着内在联系。意识形态是利益与力量的理论表现。比如，“西化”、“分化”的提法，其实质就是“国际阶级斗争”概念。使用这些概念是为了模糊敌人，自己不能模糊，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后较多的是从国家民族角度讨论问题，从而就考虑国家利益而忘记国际阶级斗争概念，更不能从本质上否认这一概念。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我们必须学会阶级合作，有所妥协、有所斗争。但妥协与斗争的两手都必须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原理上。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和袭击我驻南使馆，群众的看法是两句话：一是落后就要挨打，二是软弱就受欺负。这种看法从力量角度来提示原因是对的，但不能忘记事件的性质。这场斗争从本质上说不完全是落后与不落后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的问题，是国际资产阶级要扼杀社会主义的问题。美国打伊拉克，是要解决石油问题，其中含有明显的资源利益因素。但是，打南斯拉夫，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南斯拉夫和美国之间没有举足轻重、息息相关的资源利益关系。美国完全是从政治战略角度考虑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点。美国认为，南斯拉夫还有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堡垒”，美国便要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影响和压力，打南斯拉夫是美国施加这种政治压力的一个具体步骤。由此看来，美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其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南斯拉夫事件进一步证明“三个世界”理论的正确性，真理性。仅用国际阶级斗争理论难以阐明实行资本

主义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还不能完全用国际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和概括。它们在新殖民主义系统中处于受剥削的地位。70年代前期,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逐渐形成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把它作为我党分析处理国际问题的指导思想,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用“三个世界”理论来分析我驻南使馆遭袭击事件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根本没有改变,它们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没有动摇,我们在国际政治斗争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历史任务也没有真正改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从政治上给我们带来很大振奋和鼓舞,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世界上仍然是第三世界,仍然处于被剥削、受欺负的地位。在这样的历史任务面前,我们要尽快增强综合国力,进一步把腰板挺直。

1946年,蒋介石进攻延安前夕,毛泽东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有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就是相对发达的欧洲和落后的亚非拉。这个中间地带理论,已经具有了“三个世界”理论的雏形。南斯拉夫、伊拉克都是中间地带。

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的发展倾向是多极化。而美国根本不允许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坚持要把多极变成一霸独逞。多极化趋势是一个过渡状态,能否真正形成,完全取决于力量对比和斗争的发展变化。美国一直把中国



看成是“潜在威胁”。有人说,南斯拉夫后面是俄罗斯;俄罗斯后面是中国。现在看来,美国的战略顺序表不一定非要经过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会直逼中国。它并不是一下子直接到中国。它与中国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如何对待中间地带问题,是一个具有国际战略性质的问题。有些同志批评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批评援助非洲,援外太多,否定过去几十年党和国家的对外的方针政策。当时的某些做法可能有些简单化。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国对中间地带的援助,决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主义,它直接涉及整个国际政治的全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作为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国援助那些国家,实际上是把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集中于中间地带。当时毛主席下决心打朝鲜战争就有这个思想。我国要搞建设,就要争取把针对中国的战争打在境外。毛主席说,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们丝毫没有掩饰。根据“三个世界”理论、国际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中间地带”的内涵,抗美援朝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但是,也不能完全从利己主义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国际主义援助,因为国际阶级斗争本身就包含了国际主义。美国打南斯拉夫,实际上是政治上的试探,试探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应,同时也有恐吓的含义,恐吓中欧、东欧,也恐吓俄罗斯和中国。我们一定要全面正确地解读这个信号。国际阶级斗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首先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对立和否定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不承认、不相信有什么趋同。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你强大

也好、弱小也好,先进也好、落后也好,刺激它也好、不刺激它也好,肯定要与社会主义作对,其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社会化的程度空前提高,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转折点,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出现了新的大迂回、大曲折,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仅仅是针对华约存在的。在有些人心目中,冷战结束了,好像帝国主义不存在了,好像双方的斗争结束了。事实恰恰相反,北约在华约解散后更加咄咄逼人。由于苏联解体,重大对手弱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改变了越南战争之后的保守态势,逐步采取越来越明显的主动进攻态势。打伊拉克,打南斯拉夫,把战火烧到东欧,又唆使或纵容索罗斯袭击东南亚金融市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三个世界”理论的印证。虽然东南亚国家也是资本主义性质,但属于第二世界或者第三世界,美国对它们发展起来感到不舒服。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美国利用它们和社会主义阵营抗衡,所以,允许它们富,出现了所谓“四小龙”。它们的发展,符合美国政治利益战略,在美苏对立、中美对立的前沿发展起来,并被纳入资本国际化轨道,成为美国“国际资本大循环”的组成部分。但是,美国需要调整国际政治关系时,会一下子把它们打下去。美国的经济力量比东南亚的经济力量强得多。所以,不

能仅仅从技术层面上解释东南亚金融危机,还要用国际政治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通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消除了东南亚和日本在某个历史阶段或某个地区与其抗衡的可能性。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的泡沫经济在本质属性上是相同的。不少媒体透露了当时美国如何压迫日本在金融上自由化,如何压迫日本到美国去炒房地产、买美国国债等,把日本和美国的经济更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内幕。我们要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中,分析美国敢于破坏国际公约、敢于绕过联合国、敢于在二战后一直处于和平状态的欧洲动武所包含的信息。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它军事进攻的辅助手段,是它处于守势时的一种策略。

和平与发展理论同国际阶级斗争理论、“三个世界”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用这三个理论来观察东南亚金融危机、伊拉克事件、南斯拉夫事件,可以从中找出其内在联系。用这三个理论作为观察、分析、处理国际问题的指导思想,就有了对待五花八门新概念的思想武器。如关于全球化问题,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就很清楚了,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或者说是美国要全球资本主义化。有些人认为,全球化就是因特网、运输工具、通讯工具的发展,使地球变小,成为地球村等,从技术层面上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不用国际政治理论分析、解释其政治层面的含义,就会在政治上产生误导。用这三个理论来观察、分析国际现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分析国际现象,就可以入木三分、举一反三,就会有预见性。

这一系列国际事件,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论断的再次印证,是对毛泽东思想中批判惟武器论、惟技术论正确性的再次印证。俄罗斯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拥有最强大核武器和远程运载武器的国家之一,它的空间站在太空中运转着,但它在南斯拉夫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实在软弱。由此可以看出,没有综合实力作基础的核力量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是不足依赖的。没有政治动员力,没有民族精神凝聚力,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等要素,单单具有一两种先进武器,是没有强大威慑力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国际政治策略,是根据当前敌我力量对比关系中敌强我弱的国际大形势作出的。我们必须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出现绥靖倾向或盲动倾向。江泽民总书记在我驻南使馆被袭击后所说的“卧薪尝胆”,也是根据现实敌我力量作出的选择,“卧薪尝胆”,强大之后才能“有所作为”。我们要用这一脉相承的三个理论来指导我们对当今国际政治问题的认识。

20世纪已经结束。回眸这激荡的百年风云不难发现,它大致分两个具有明显差别的时代:前50年,基本上属于动荡不安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后50年,总体上进入相对繁荣稳定的和平与发展时期。受这种宏大而深远的时代状况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开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强调的是革命和政治斗争,而从60年代特别是从80年代以来,逐渐转变为突出和平与发展、现代化建设上来。大致上说,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思



想是革命与战争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成就,邓小平理论是和平与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初步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大趋势的形成,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时代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例证。

时代特征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人在《世界文明史》中认为,从西方历史角度来看,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几乎100年间,世界是一个长期和平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宣告人类进入了一个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战争与革命的动荡时代。伯恩斯等人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20世纪上半叶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和20世纪下半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之间的区别、转换、变奏关系很有帮助。由此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及他们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均处于从1815年至1914年长达百年的和平时代。经典马克思主义属于和平与发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由经典向现代形态的根本转变,即由强调经济发展的第一性、历史发展必然规律性向革命辩证法时代主题的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半世纪发展史的第一次重大主题变奏。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的根本变化:“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些说,列宁主义



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① 斯大林的这一论断有两层意思:(1)列宁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从时代背景看,列宁主义可称为战争与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2)列宁主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专政是革命的继续。因此,列宁主义是以革命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历史实践证明,关于世界形势和时代的矛盾、问题、特征的认识,是关系到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战略、策略和社会主义运动前途命运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什么时候对时代特征作出了正确判断,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就会取得长足发展,反之,便会遇到挫折甚至出现失败与倒退。总的说来,包括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内,他们对 20 世纪上半叶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实际上已经朝着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转变。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判断上。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变化在开始阶段表现得不充分,还不容易看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跟不上时代的变换。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我们仍然把革命与战争当做时代的主题。这种判断持续了二三十年,直到 80 年代,邓小平才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了和平与发展问题是“现在世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 2 页,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第 2 版。

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①。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第二次主题的重大转变和第三个基本范式的开始。

2. 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社会主义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企图要消灭社会主义,这是双方都非常清楚明白的历史性战略目标。但是,现实情况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完全把社会主义从地球上消灭,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取代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不能有任何在短期内结束斗争的幻想。我们要把工作放在扎扎实实教育群众、扎扎实实做好工作上。从形势教育角度看,当前要调整文化氛围,要让青年在思想上、精神上有所准备,更全面地适应当前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近些年来,我国进入太平盛世阶段,一些群众受此影响,追求奢侈、讲排场,缺少国际政治斗争的思想和精神准备。我国的文学艺术,80年代前期还有一点伤痕文学,有一些悲剧色彩;80年代中后期开始,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之风日盛。在许多大学生中,先是琼瑶热,后是三毛热。我们的一些干部,把很多精力放在迎来送往、拉拉扯扯以及卡拉OK、桑拿浴上,生活化冲淡了政治化。报纸宣传也存在生活化压倒政治化的问题。生活版特别畅销,人们在太平盛世生活得非常安逸。安逸的生活环境就需要这些生活化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客观规律。现在,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武侠小说、爱情小说畅销,反映宫廷生活的图书畅销,电视剧走红(如乾隆、雍正、刘罗锅等),也是这种安逸生活的一种表现。青年人和干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是不会有国际政治斗争的思想准备的。这几年上映的一些美国大片倾倒了很多人,他们崇拜美国,迷信美国,害怕美国,又出现了抗美援朝时我们反对的崇美、恐美症。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票价,在广州高达120元人民币,有人居然会花1万多元看100多遍。一位已经三四十岁的女副教授看一遍哭一遍,哭一遍看一遍,不知看了多少遍,不能自拔。我写了影评公开发表,做了一些思想工作。这位女副教授对她的父亲说,一个大煞风景的林先生写了一篇《〈泰坦尼克号〉和美国文化》的文章,打破了她心目中的偶像,她不想哭了,也不想看了。

我驻南使馆被袭击事件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一件好事。美国人用导弹打掉了自己的假面具,使许多人特别是青年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看到这些年美国文化在我国青年思想中造成的混乱。1999年年初出版的《呼喊——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就很有典型意义。作者旁征博引,断言“美国政府没有把遏制中国定为国策”,并劝言不要对美国说“不”。邓小平同志对自由化的定义是资产阶级化、资本主义化,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自由化是弱化政治动员力、瓦解斗志、降低民族凝聚力、丧失民族自尊心的重要手段,是帝国主义掩盖自己的本质、瓦解第三世界对新殖民主义警惕性的手段。对此要有充分认识。我国70年代、80年代对美关系的



基石是50年代抗美援朝、60年代抗美援朝打出来的，没有战争的胜利，就不可能以主权平等的身份同美国人对话，就没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中印战争后，毛主席说“这一战的胜利可保十年的和平”，结果保了30年。如果没有这两场战争的胜利，根本就保不住我国对美国半个世纪的和平关系。在教育群众时，和平与战争、改革开放与自力更生、进步与反动、发展与遏制、劳动和资本、招商引资与国际剥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些对立统一方面的内容都要照顾到。

3. 在改革开放中斗争，在斗争中改革开放。我驻南使馆被袭击事件，给对外开放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因此把已经打开的大门再关起来。正如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的：“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来之不易，是从热战和冷战中打出来的，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改革开放可以争取到信息、技术，争取到国际上的联系，维护我们的发展速度，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备条件，只要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公开对我国进行侵略、扩张，把事情做绝，我国就坚持对美国、对全世界的开放政策，保持对我有利的开放局面。我国仍然需要美国市场，也仍然需要学习它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决不能因为同美国进行斗争而主动放弃这个市场。既要斗争，又要贸易，政治上要坚决斗争，经济上要引进它的技术、资金。一定要区别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区别美国政府和人民，区别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

行为和其他一般性行为,区别美国政府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和贸易行为。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同美国的斗争,要坚持“斗而不破”。我们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取得最后胜利。我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将是长期、尖锐、复杂、激烈的,一定要有长期艰苦奋战的思想准备。

二、国际资本主义

当代国际资本主义是一个内部不平等的世界。当代国际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三个等级:美国是第一等级,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是第二等级,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是第三等级。处于第一等级的美国剥削处于第二等级的日本、欧洲发达国家和第三等级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处于第二等级的日本、欧洲发达国家剥削处于第三等级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还有一种分析角度,美国、西欧、日本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剥削第一、二、三世界的劳动人民。

东南亚金融危机说明,外资质量上存在一个剥削链条和控制链条。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引进外资的数量虽然仍居世界第二位,但绝对额和增长数字大大减少,已不像前两年那样高比例增长。我们过去的外资结构中60%—70%是东南亚资本。金融危机后,我们引进外资的结构有了调整,东南亚资本量减少了。在国际资

本链条中美国资本是最高级的资本,然后是西欧、日本资本,再次是东南亚资本。这三个层次所代表的知识力量、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军事后台、政治后台是不同的,它反映了生产的国际垂直分工链条。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的外资,在国际资本链条的垂直分工中处于最低层次。美国资本代表的是技术水平最高级的资本,其背后有宇航、卫星、原子弹及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计算机技术,代表的市场水平高、市场容量大、市场运转能力强,剥削水平也高。日本和欧洲的资本是中级资本力量,其背后有汽车、轮船和摄像机,代表的市场水平、市场容量、市场运转能力和剥削水平低于美国。东南亚资本中有很大大一部分的层次和我国的接近,生产鞋、帽、服装,代表的市场水平、市场容量、市场运转力和剥削水平是最低的。在国际垂直分工中,美国资本控制日本、欧洲资本,而日本、欧洲资本控制东南亚层次的资本。这是一个控制与被控制的链条。战后美国凭借核能、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所积累的实力,以WTO、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国际货币制度等为手段,建立了由美国领导和控制、相对开放又不对称的世界经济结构体系。这一链条理论进一步说明,资本的国际流动,配置着全球资源,控制着全球格局,使利润流向西方。在这一循环链条和体系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而第三世界国家受剥削最重。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外国的资本,发展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我国国际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发

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索罗斯1997年7月袭击泰国后,陆陆续续席卷了东南亚,后来又发展到东北亚、东亚、日本和韩国。索罗斯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他背后是美国政府,攻击哪个国家是由美国政府决定的。据世界银行统计,1998年上半年,约1200亿美元的外资从东南亚流出,中国的外资不但没有外流,反而增加11%。这说明,在中国大陆的外资是赚钱的,只有赚钱才会增加。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了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在中国的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国际资本有上千亿美元)。东南亚、韩国身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没有独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保护,根本没有办法采取已被证明是成功的技术性措施——控制资本项目下的外汇自由兑换。只有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能力保护国际资本主义在这个国家的发展,使其免受危机的伤害。在我国的资本主义与东南亚的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为什么东南亚就避免不了遭受危机呢?这是资本主义的排他性在起作用。弱肉强食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虽然资本主义在今天仍有发展生产力的空间,但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有发展生产力的空间,比如在非洲它就发展不起来,总是病恹恹的。非洲的工业生产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发展一直非常缓慢,一直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东南亚虽然暂时发展起来了,但缺少独立性。东南亚不是完全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更强大的资本主义攻击一下,它就可能垮下来。东南亚在



金融危机中几千亿美元外流。外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因为索罗斯的攻击倒退了20年。印度尼西亚自称20年白干了，他们20年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剩余价值被更强大的资本主义掠夺走了。在当今世界，并非所有国家都能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全世界现在有160多个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真正强大的、经得起东南亚危机的只有二三十个，而在这次危机中占便宜的只有七八个国家。七加一首脑会议中的日本这次也吃了大亏，给美国大进了贡。其原因是，美国与苏联抗衡时无暇顾及日本，日本经济发展起来后，不大听美国的话，在一些问题上敢于对美国说“不”。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分子的作风就是称王称霸，不允许有人对他说“不”。苏联解体，华约解散，美国没有假想敌了，便腾出手来教训日本一下。前几年日本出现泡沫经济，美国不许它治理，使日本在这次东南亚危机中，在泡沫经济的状态下，给美国贡献了大量的美元。美国之所以能够教训日本，就是因为美国资本处于最高地位，处于剥削其他资本的地位。如果中国也处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就免不了遭受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这种残酷无情的剥削。因此，我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利用国际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样，我国既能够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又能够减少、减轻国际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剥削。当然最根本的是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等级（包括劳务），降低成本，在国际剥削链条（层次）中尽量向上靠。

三、马克思主义是个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科学体系，是一个面向未来、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体系。这就是说，它有能力接受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有能力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意味着，它没有结束真理。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立足实践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对此有十分精辟的概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受阶级利益、民族偏见和小生产狭隘视野的束缚，人们一直没有认识和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到了19世纪40年代，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联系的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首次发现了人类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的最高的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

应”。马克思最杰出的历史贡献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它存在着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为生产力发展准备了极为广阔的自由的社会关系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的狭隘性而严重束缚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以一种极为严格的科学的逻辑和大量经验事实,预言将来会出现一种新的、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它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哥达纲领批判》首先明确提出来)。这是马克思解决的两个主义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联系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一直到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哥达纲领批判》,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没有从基本理论和当时社会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和恩格斯早在青年时代(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出的革命(首先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欧)“多国同时胜利说”,成了无法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上的缺口。这里的缺口,是指真理的相对性。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过程,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缺口里产生了列宁主义。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的

具体情况,在20世纪初实践了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统治最为薄弱的链条上实现了突破,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解决了在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列宁没有解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怎样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使列宁主义形成了一个缺口。在列宁主义的缺口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改造,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实现了两弹一星的重大突破,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有了一席之地。但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很好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一个缺口。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这个缺口里面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亲身经历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期性的错误和挫折。在毛泽东思想的缺口里产生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成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一个专有概念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的情况看,它们的确是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的主线,就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发展。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如何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

正确认识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形势和任务★

利的问题；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如何能够打破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联合包围，在资本主义力量最为薄弱的环节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变为现实的问题；邓小平所关注的是，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在一个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所主宰的全球化格局中进行的问题。其表现形式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模式，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以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问题，即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内各个领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现代社会制度、发展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它通过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的方针，站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现代全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利益的高度，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世界接轨而不并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共处而政治文化并不趋同的关系问题，即解决了在垄断资本主义力量占绝对优势的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从一个角度看，这个一脉相承的过程，是后人不断解决前人所未能解决的重大时代难题、不断解除既有理论模式束缚的辩证扬弃的过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不断战胜理论和实践的困难乃至危机的过程中获得理论上的新的生命力、新的生长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一脉相承的过程，是后人不断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吸取

前人的理论和实践教训的辩证前进上升的过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更加全面、丰富、完善。正像马克思在其晚年(特别是在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的信中)已经直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而后来的列宁则通过十月革命的实践,将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的”设想(马克思提出的跨越条件是:一、俄国保留土地公有制;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给予俄国以援助)在俄国当时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变为现实;正像斯大林晚年开始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有所察觉和反省一样,毛泽东曾经一度认真思考和探索过一条克服苏联工业化模式缺陷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主要体现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正像列宁晚年已经在全面系统地考虑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形式,迅速改变苏联原有的落后生产力面貌一样,晚年的邓小平则在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深刻反省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十年动乱极左错误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大胆运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先进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手段、方法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对自己所处时代最重大基本问题的科学发现和正确解决,没有对自己所处时代最先进科学成就的自觉掌握,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发展。正像没有两个伟大发现,特别是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现,就没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的严格事实逻辑论证,就没有马

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正像没有帝国主义理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没有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严重不平衡的规律揭示，就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落后国家变为现实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构想，没有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持久动力机制和基本条件的科学揭示，就没有关于在落后国家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邓小平理论。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是对第一代领导集体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当时产生的一些正确思想的发扬光大。在1956年后长达20年的探索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以下主要成果，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方面的基础：

第一，在政治上，提出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

第二，在经济上，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用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提出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以及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积累和消费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等原则；提出了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实行“三个主体和三

个补充”的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灵活性等观点。

第三,在文化上,提出了以马列主义作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文化科学事业的基本方针;确认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借鉴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

第四,在外交上,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人类进步事业;主张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交流。

第五,在党的建设上,提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重视执政党建设,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还提出要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上述这些思想,都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应该说明的是,上述思想,有的仅仅是党的领导人个人的思想,并没有形成为党中央和全党的共识,有的仅仅是一段时期的思想火花,并没有得到展开和发展,有的在提出后没有能够坚持和贯彻下去,有的甚至在后来完全走向了反面。正因为如此,这些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正确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其意义更显得重要,其作用和价值更显得巨大。

邓小平理论是对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准确及时的反映。首先,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广大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



家和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性、时代性的迫切问题，是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说，革命斗争和民族独立只是解决了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政治条件的话，那么，革命胜利、民族独立之后的主要任务便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政治体制。然而，“要建设，没有和平的环境不行”。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就成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另外，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之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总结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才认为发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通过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和利益所在。其次，和平与发展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问题，而且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因而，要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和整体利益的高度，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新视野来认识这个问题。发达国家的人民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一样渴望和平。再次，和平与发展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和全球性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它的存在制约着其他问题的解决。问题的严峻性恰恰在于，“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当然，正如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的那样：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整个人类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会像前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在几十年的短期内实现。现在的问题是要建设比资

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要建设能够摆脱贫困、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理论、新思路、新战略、新方法,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表现是:邓小平理论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高度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从中国的国情这一最基本的实际出发,对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了准确而全面的把握,指出了中国当前并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仍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我们只能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改革目标只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次,邓小平理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观念的论述,既体现着国内现阶段发展特征,也体现着当今世界的发展特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这正是邓小平发展观念中最具有时代创新特征的内容,既是他对剧变着的世界形势的正确把握,也是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再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冲破了传统的革命斗争辩证法思维模式和闭关锁国的建设模式的束缚,找到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持久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外部国际条件。最后,邓



小平理论根据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提出了解决当代国际争端和矛盾,发展对外关系的一系列新思路、新方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的国际政治观。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世界观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我们不难认识到,虽然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面临的总问题始终是如何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过渡,但具体的时代内涵不同,时代主题也明显不同,所以才有了理论主题不断辩证地转换的阶段性特征。与资本主义矛盾初步暴露的时代主题相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主题是强调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和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在经济必然性意义上的灭亡命运,他们着重思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为何必然胜利论”;与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充分暴露的时代特征相呼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所开创的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是高扬革命政治力量的主观能动性和突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灭亡趋势特征的革命斗争辩证法,他们集中探索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如何取得胜利论”;与战后资本主义重获相对稳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探索遭遇严重曲折的时代氛围相适应,邓小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是思考 and 解决在和平与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怎样进行巩固和建设论”。

四、经典核心概念 ——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之脉

经典核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之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主线。没有共产主义说不清社会主义；仅有共产主义也说不清社会主义；只有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放在一起，才能说清社会主义。阶级和阶级分析是共产党的逻辑起点。

邓小平理论关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首先来自于比较，来自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纵向比较，来自于社会主义自身的比较，还来自于和资本主义的横向比较。横向比较更有意义。我们不是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而是和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和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还处在不发达阶段。和资本主义横向比较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社会主义是先进的、高级的、科学的社会制度；二是我国的生产力还处在不发达阶段。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坚定地发展社会主义，勇敢地学习资本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建立在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之上，其思想起源于1912年，成熟于1914年，1916年成书。这一理论的核心判断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阶段，资本主义必然出现危机，而且是



总危机。列宁的英明论断在后来几十年中,在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中得到了证明。资本主义确实被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吓怕了,看到了灭亡的现实可能和具体途径。吓怕了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把社会主义视为最可怕的对立面而加以遏制;另一方面,在不改变其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积极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1936年年初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其宏观调控理论基本上是从社会主义学来的。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使得西方经济学出现了“国家调控”这类概念,使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有了新的稳定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没有发生总危机,不能不说是它们的改革成果,不能不说是它们学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办法。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今天也承认这一点。比如,实行社会保障,使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不总是处在尖锐对立的状态下,不至于动辄发生革命。又比如,西方许多国家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控制电力、邮电等国民经济命脉,给其他行业提供了一个正常运转的平台,当竞争中出现过剩时,经济危机不至于蔓延成总危机,局部竞争性行业出问题不至于殃及整个社会,不会出现1929年那样的情况。国家调控总需求、总供给,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不足,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

20世纪前半叶和后半叶的鲜明对比,使得马克思主义者要重新认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独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和潜

力,今后还会继续发展。所谓独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它不被其他强权的资本主义挤压。现在,有独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还是“八国联军”时代的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放松压力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等,虽然也创造了很大成就,但毕竟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发达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依赖性,一场东南亚金融危机足以使之倒退几年、十几年甚至20年。这就是说,20世纪1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没有一个落后国家赶上来加入其“俱乐部”。落后国家要赶上来,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平起平坐,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独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和潜力,今后还会继续发展,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本判断仍然是对的。列宁的论断,是就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来说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是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它的没落、垂死,是一个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垂死,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垂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其实就是人们通常的“一叶知秋”论。“垂死”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插不进另外一个社会形态。对“垂死”的正确理解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根据。

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命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



老老实实地学习资本主义。我国曾经照搬苏联的一些经验,认真地学习了十几年,又发明、体验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直到1978年,我国才痛下决心,开创新的道路,这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开创的过程,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市场经济”拿了过来。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时,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作了许多理论分析和论证,认为我们搞不成,等着看笑话。经过实践和探索,我国取得了初步成功,解决了经济过热、基建规模过大等问题,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过去我国常常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调整,像1981—1982年那样,靠行政命令关停并转了许多企业,这种办法造成的后果是非常痛苦的。1993年经济过热的调整,用的是市场经济手段。这种调整虽然也有一些困难,如职工下岗等,但实现了平稳的“软着陆”,在“软着陆”过程中还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第一次。过去每次调整,经济速度都会降低。或者低通胀低速度,或者高通胀高速度,从来没有出现过低通胀高速度。这次调整是个大胜利。

坚持社会主义和向资本主义学习是世纪性课题,反映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性,即我们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另外一个彻底性是:我们一旦发现资本主义的长处,就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向它学习,这也是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性。

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确实香得很。美国的《光



荣与梦想》一书，记述了大危机后美国弥漫着向往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的气氛。罗斯福在竞选美国总统时，从东海岸喊到西海岸的口号是“社会主义新政”！当然，他所说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凯恩斯的那套理论。但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地位。就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所暴露的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应该说是政治总危机，1929年的危机是经济总危机。电影《泰坦尼克号》反映的就是资本主义非常繁荣、踌躇满志的年代。那时，资本主义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征服了世界，几乎是无所不能。“泰坦尼克号”上的一等舱确实豪华，像宫殿一般。但是，突然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这些豪华的东西。这是一种历史的比较。另外，“泰坦尼克号”上一等舱与三等舱的比较，也是一种阶级的比较。用船的沉没，而且是豪华客轮首航式的沉没来预言，还是一种繁荣与灾难的比较。20世纪末，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世纪之初的洋洋得意，很多资本主义政治家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苏联解体后写的《大失败》，虽然对共产主义进行批判，对资本主义未来充满了狂妄的得意，但字里行间仍然透露着隐隐约约的不祥之兆，认为资本主义也有“泰坦尼克号”式的危险。20世纪最主要的旋律仍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如反共斗士布热津斯基所称，20世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大搏斗的一个历史时期。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是一部政治史，他首先回顾



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初的踌躇满志,接着回顾本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危机四伏的状况,最后回顾 50 年代后资本主义慢慢缓过劲来开始稳定发展,回顾社会主义怎样出现一系列危机。学术史领域也有这种标志性的人物和著作,马歇尔在 20 世纪初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是一例。这部书是主张自由市场的微观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流行了半个世纪。因为资本主义在这半个世纪里经常闹危机,该书便屡受怀疑,1929 年的总危机,使该书的影响力受到了更大的打击,但仍无别的理论来替代。当时虽然出现了很多经济学方法,但这些方法只能是它的补充和完善而不能替代它,因为它们在体系与结构上是一致的。凯恩斯 1936 年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和标志性时期。20 世纪中叶又出现了西方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他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搞了一个拼盘式的《经济学》教科书。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都把它当成经典看待,但这本书近几年受到了极大挑战。美国学者斯蒂格里兹,把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融会贯通后写出了自己的教科书,像 50 年代萨缪尔森取代马歇尔一样取代了萨缪尔森。这一变化和发展表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变化阶段的出现,西方经济学家也出现了阶段性标志的人物,出现了阶段性标志的经典著作。

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标志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出现了标志性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新的变化,社

会主义的发展也有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充满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并进行历史性竞争。毛泽东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高估了社会主义的成熟程度,对这个时代的判断是“革命与战争”。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①。东西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南北问题是发达与落后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两种社会制度与两种经济发展现状,就是社会制度的二元,生产力的二元。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形成表明我们敢于学习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先进的东西,敢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大胆使用,在使用中变成自己的东西,发展和壮大自己,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学习资本主义,一定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学习。道理很简单,一个运动员落后时,即使把处于领先地位的对方的优点百分之百地学到手,充其量也是等距离的追赶而已,而且谁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把对方的优点学到家。我国要赶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除了百分之百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地学习它们的优点外,还要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保持自己的绝招,加上学习它们的长处,才能缩短距离,才能赶上和超过它们。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赛,是不同量级运动员之间的比赛,就像一个80公斤级的运动员和一个60公斤级的运动员摔跤一样,这种比赛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更麻烦的是,我们是在和一个运动员兼裁判员的强大对手进行比赛,当我们刚刚有一点优势时,他们就改变比赛规则。如果完全按他们的规则办,必然要受制于人。只有依靠自己独特的办法才能在这场不平等的比赛中打个翻身仗,这个“独特的办法”,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的逻辑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世界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有160多个,而绝大部分,不仅根本没有能力赶上几个发达国家,而且差距还在逐渐加大。就像毛主席说的,那些虔诚当学生的国家总是受到当老师的国家的欺负,这就是上个世纪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历史的逻辑说明,我们学习西方是必要的,但绝不能照搬,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总框架。

近几年来,我国扶持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之所以敢于在社会主义框架里让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因为总的判断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相当大的容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资本主义更多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个文明成果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人

担心中国是否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能讲空话,而必须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忧虑,而且来回答那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解除”和“回答”是两个侧面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正确、大胆、有效地学习资本主义,“解除”国内人们的忧虑,“回答”那些要和平演变我们的人。列宁曾说过,我们应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和方式。他还说过,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明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列宁在这个问题上讲得很多,是当时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可惜战争和其他因素使斯大林无法把这些理论变成现实。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双线运行的阶段。以社会主义框架为主体,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但多种分配方式、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并存。这个阶段明显有大量的资本主义,但这些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是局部的,是一定程度的。我们不搞资本主义制度,但要搞些资本主义。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都出现过不同社会制度的交叉阶段。尽管我们现有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资料很少,但过渡阶段双线交叉并行确实是存在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有很长的双线交叉并行期。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简单,认为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酝酿成功,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后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忽略了新旧社会制度交替有一个相当长的交叉过渡期。交叉过渡期也可以称之为混合过渡期。股份制中有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放大到历史现象有一定普遍性。有些人把这种“放大”变成要求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回到资本主义的单线运行上去,这是非常错误的。我国现在之所以能够高速、持续发展生产力,原因之一就在于实行双线运行、二元并存。双线运行、二元并存有一定风险,有谁吃掉谁的问题,但由此派生出激励机制。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内容,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深层次矛盾”只能驾驭,只能因势利导,不可能消除。毛主席因循“消除”矛盾思路,犯了“左”的错误。当今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内应力。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解决这些矛盾,在解决矛盾过程中发展生产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国两制”,邓小平理论中总是出现“二”字,其原因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发展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的双线运行,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元混合交叉。

我国搞的资本主义,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其不完整之处在于,不搞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是公有制为主体,思想上、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的一元化领导。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有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也有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克服不

了,将导致它最后被埋葬。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是可以克服的。例如,工人阶级以前没有当过管理者、统治者。一旦成为管理者、统治者,就应当积极地、努力地学习包括资产阶级创造的治国方略和经营管理办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国家治理好,把企业管理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长短,不取决于判断,而取决于实践中学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进度和成效。党的十五大提出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这种判断的根据是现在的生产力状况。如果学习得好,发展得好,完全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完全可以缩短初级阶段。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对手就没有自己的进步,没有自己的进步就没有对手的矛盾的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丰富多彩的时代,我们既感到压力,又感到幸运。

五、政经异构、阶级谱系

在人类历史上,政治经济同构是一个普遍现象。奴隶社会,奴隶主富有,奴隶贫穷,奴隶主统治奴隶,富人统治穷人,是同构;在封建社会,地主富有,贫农、下中农贫穷,地主统治贫下中农,是同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富有,工人贫穷,资本家统治工人,也是同构。同构的金字塔结构,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从总体上说,工人阶级作为个体是“穷人”,从



理论上说党的干部是穷人,但却是执政者;搞非公有制的人有“富人”,但却处于被领导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穷人领导富人的政治经济“异构”,这是新的执政课题。

在这里“穷人”、“富人”都是为了简化描述而使用的通俗化概念、过渡性概念,并不周延、规范,“穷”与“富”是相对而言,指群体的主流,指有无生产资料。“穷人”包含实现小康消费水平,依靠工资而生活满意的人。党的干部如果仅仅依靠工资,如果严格遵守党的各种规定,从理论上讲,不应该拥有生产资料,不会有超出小康水平的积蓄与消费。现在很多人对“党的干部是穷人”提出异议,认为现实中并非完全如此。这恰恰说明讨论本命题的现实迫切性!我们承认,有相当一部分党的干部通过种种方式已经拥有可观的积蓄了,仅仅由于党的各种规定,党的传统作风的约束,群众监督的约束还有一些作用,使得这些灰色积蓄——不能转化为奢侈的高消费,二不能转化为生产资料,憋在那里,藏在那里,一旦出事就是“不明收入”,成为烫手的心理安慰。这些矛盾正是“异构”造成的。它们成为一部分干部主张“私有化”的动因,希望藉私有化使这部分灰色积蓄转化为公开的,安全的,可以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党变质已经具备一些直接的内因了。正是这些现象使群众减少了对党的信任。

政经异构,是社会不稳定的内在原因。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我们如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



济高速发展的欣喜,和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上徘徊的欣喜是相同的。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欣喜的同时,还要认真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政治与经济的异构现象。“异构”,是与“同构”相对的一个概念。“同构”,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普遍但又很少有人觉察的社会现象。在一般社会运行机制中,经济机制与政治机制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而且是兴衰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其社会地位,就是对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从人类经历过的社会制度看,统治者都是富有者。财富使他们获得了权力,权力又反过来保护他们的财富。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告诉我们,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实际上是拥有财富者和没有财富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封建社会地主对贫下中农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无一不是这种关系的展示与证明。在政经同构的社会,政治权力与拥有财富的关系是一种正比例关系,一个人的政治权力越大,他所拥有的财富就越多。“当官发财”是对古代社会,尤其是对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集中概括。后来,在文化领域,人们将“权力”当成“权利”,甚至彼此不分,也从社会学的角度证明了同构理论的正确性。

政治与经济的同构,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础。希望巩固自己的政权的统治者,多数是同构理论的继承者和完善者。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阶级社会里,经验丰富的统治者总是不失时机地用各种手段来建设、巩固、发



展同构机制,使他统治下的社会在良性状态下正常运转。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是一般的道理,统治者更惯于此道。封建社会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统治者借鉴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进行统治的成功经验,资本主义社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者又借鉴封建社会成功的统治方式。向政权“投资”是他们的共同经验。这种以金钱作为扩大政治活动空间的办法,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为充分。随着经济与政治同构关系的逐步完善,有钱者就是强者的逻辑成为公理。富有的统治者对贫穷的被统治者的剥夺“合情合理”。“有钱便是爷”的天下,自然是弱肉强食、穷人生活艰难的天下。对剥削者来说,用剥削的手段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是一种良性循环;对被剥削者来说,自我力量在被剥削的过程中被削弱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是阶级社会的必然逻辑。

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则不同。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不属于无阶级社会,但它主张与实行的是平等、正义的社会制度,与历史上任何一种剥削制度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超出了同构理论的范畴。讨论社会主义与同构的关系,必须分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阶段。虽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的政治都是人民民主专政,所有制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分配上都基本上是“按劳分配”,但这两个阶段的条件与主导思想是有区别的。计划经济阶段不存在剥削,公有制内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一种“准同构”的政治制度,也可称其为“后同构”。这一“同构”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与剥削制度的社会有天壤之别。两极分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存在的。这个没有巨富与赤贫存在的社会,从根本上消除了政权的市场化和经济的政治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即使有同构现象,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同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则有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大不相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由于公有制主体之外还有多种所有制存在,阶级或曰阶层就可能成为现实。富有的阶级就是占有有一定财富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占有资本的基础上以股东或者董事长的身份出现,通过“按资分配”敛财、分红、积累,从而很快发展成为拥有巨大财产和势力的阶级力量。“财大气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学词语。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下,工人阶级是处于领导地位的阶级,他们的主体力量在国家政权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经济地位完全取决于国家财政状况。他们与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之间的经济力量悬殊极大——异构现象出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权的拥有者在经济上不占优势,而经济上占优势的则是政权的“局外人”。财大者不能气粗,财小者偏偏要气粗。这个矛盾推动钱多权少者想抓权,权多钱少者想抓钱。这是多么迫切的交换愿望,多么完美的交换条件!不管现实中这种交换的途径多么曲折、复杂,最根本的推动力都来自这个异构带来的矛盾。这是我们党反腐败的艰巨程度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反腐败的一个社会原因。在这样一个异构现象存在的社会里,各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随时都会发生,社会不稳定就是

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结合社会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分析它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社会定位问题,即提出“阶级谱系”命题,是很有意义的。

阶级谱系指的是社会稳定的有机结构。谱系,泛指事物发展变化的系统。在阶级社会里,政治经济无论同构还是异构,各个阶级或阶层总是处在一定位置。在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过的历史形态中,处于“两极分化”两极的都是少数人,处于中间位置的是大多数。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亦如此,可能还更突出。奴隶社会,处于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自由民”是大多数;封建社会,处于地主与雇农之间的“中农”是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大资本家以下和贫困线以上的“蓝领”与“白领”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例外,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和靠国家救济生活的人是少数,处于中间位置过“小康”生活的人是大多数。这就是“两头小、中间大”阶级谱系的基本构成。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谱系是社会保持稳定和良性循环的基本前提。政治与经济的同构,加上统治阶级有意识地采取种种手段,将权力高度集中于他们这些在人数上占少数的剥削者手里,阶级社会的稳定才有了基本保障。这是阶级社会长期存在的“秘诀”。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同构”的原有功能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失。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之后,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打破了社会原有的稳定与平衡。社会的这一失衡恰恰来自于异构现象的发生与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异构现象则不

可避免。问题在于,对异构现象的存在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要勇敢地正视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政治与经济出现大的反差时,社会不稳定因素必然膨胀,尤其是在处于富裕一极的经济雄狮逐渐从幼小发育到成长乃至成熟的过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上无权的经济实力派必然将那只无形的手伸向政治。马克思在评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金银,虽然它只是那么小的一点东西,但它却可以把白的变成黑的,丑的变成美的。金钱与货币的效力绝对不是美丽的理论和正义的演说所能比的。因此,我们的理论不能仅仅限于空谈,必须是能够限制这种“金钱”变味的实际理论。

目前,金钱正在演绎着腐败的悲剧。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98 年对全国总的要求是,5 年之内抑制住腐败的蔓延。但是腐败仍在蔓延之中。腐败造成民怨,民怨造成上访,上访又容易在个别问题的堆积中形成民怨的合力,造成社会不稳定。在异构存在的现实中,我们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的发展:一是巨富与赤贫者的截然对立;二是经济力量雄厚者的“扩张”。历史已经证明,同构社会里处于中间状态者在人数上从来都是大多数,但他们从来都不是社会性质的决定者,也不是社会变革的主导者。社会变革的发生,都是处于两头的少数人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市场经济是“经济”的法则,资本主义是经济法则的极度泛化者。在社会主义使用经济法则发展生产力时,由于异构的作用,很可能导致经济法则



在其运行过程中对政治领域进行渗透。经济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钱的法则。市场经济的法则就是“认钱不认人”,“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对金钱功能的生动描绘。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一部分人的腐败提供了足够的“营养”。如果我们不加限制地任其发展,其结果就不仅仅是社会稳定的问题了,社会性质发生质变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市场化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但其负面影响决不能低估,市场化正在影响我们的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意识形态领域。封建社会可以卖官鬻爵,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坦言自己花了多少钱捐了个多么大的官;资本主义社会的竞选,实际上是比封建社会高出一筹的隐形“捐选”。资本主义的贿选与封建社会的捐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市场经济机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样是诱发这种畸形政治的因子。在一些地方,通过“经济”手段拉票、逐权已成为公开的秘密,1999年被依法查处的河南滑县原县委书记——其卖官几乎到了明目张胆的程度。“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本质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组。“钱”与“权”的交易是赤裸裸的,金钱对权的危害显而易见,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很大,其方式则是温情脉脉的。以教育为例,在教育体制不断改革的今天,从公费到自费,从“试点”到“并轨”,都对教育的“机会均等”提出质疑与挑战。这个挑战不是别的,而是工农这个一直被尊为主体的主人翁阶层还能否拿得出自己的子女受高等教育所必须的钱来。固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体人物

也不应该是拿不起学费的贫穷落后者。但是,谁能保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异构”的社会结构不给在政治上占优势的工农阶级带来遗憾呢?工农在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一生,他们的贡献就一定比那些靠钻法律空子起家的“暴发户”小吗?由于经济的原因,工农群众本身及其子女失去接受良好教育机会的大量事例已经出现。文化市场化现象已经出现,很可能导致“损不足而奉有余”。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出现文化“同构”现象,有钱人的孩子可以进“贵族学校”,有钱可以买到文凭。法律市场化可以使“有钱就有理”成为现实。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与健全,社会上的法盲会愈来愈多,人们打官司必须通过已经市场化的“中介”——律师来解决问题。撇开种种人际关系可能给法律仲裁造成的障碍不讲,仅仅因为拿不出相应的钱请律师的贫者会屡见不鲜。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钱人的增多对贫者的人权以及生命都可能构成侵害和威胁。我们必须研究解决工农主体地位面临的威胁,一是要力避贫富差距愈来愈大,二是要有约束资源的政策。政府行为如果对市场化暧昧,政府就会在实质上不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由选择机制,这种机制在政府行为中运行就会引起腐败。实际上,一个政府腐败的过程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异构”向“同构”的转换,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课题。对社会主义来说,“同构”面世意味着政权变质。当民主生活市场化之后,“异构”是不堪“同构”的诱惑与演变的,结果只好让位与后者。防止两极分化,让工农阶级大多

数也富起来,减小社会各阶层的差异是十分必要的。

小的社会差异是社会稳定的杠杆。社会存在差异,并且可以依靠劳动、努力的差异改变贫富差异是社会发展的杠杆。差异使发展与稳定矛盾。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差异论”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手段,“共同致富”是目的,是理论关怀的终端。我们说的是要减小差异,不是不要差异。为什么说既要减小差异又要保持一定差异呢?根据阶级谱系结构,“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设计理论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间力量从来都是相对稳定、守成的阶层,他们一般不会充当历史变革的发动者。只有处于两极的人才具有执政的欲望和勇气。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就曾不断颁布与修订反垄断法,制定高比例的遗产税、房地产税等限制措施。防止“大鱼吃小鱼”带来的“两头大”趋势是资产阶级理论家为政府行为策划的上乘之作。就差异论的实质来说,差异是刺激人们在竞争机制中充分发挥自我潜力创造价值的巨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一定的失业率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但是,失业率的增长与过度膨胀,则会给社会增添许多不稳定因素。这是对差异论的直观说明。

差异,是在不平等中追求平等的社会发展动力。产生这一动力的根本原因是人在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对自身潜力的挖掘。现阶段的平均只能造成人的懒惰。因为有了差异,人们才在这个不平等的格局中奋力拼搏。因此,不能把差异固定化。固定化的差异同样会使人自暴

自弃。一个人如果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光明,当然就会采取另一种方式与社会作对,这也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值得说明的是,差异的固定化是由于差距不断拉大以至走到极端,社会对其已经无可奈何才形成的。所以,在我们坚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同时,又要避免贫富之间的距离拉得太大。社会既要有形成差异的机制,又要有减小差异的机制。但是,也不是说距离越小甚至没有距离就好。距离在美学中是产生美的必要空间,在经济学原理中则是自由竞争秩序的前提。历史上,农民造反、起义,都是因为走投无路,是地位、财产固定化的结果。陈胜、吴广在只有死路一条时爆发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就是对世袭制度的强烈不满。在差异中追求和谐,是真正的公平平等。没有差异的、无机的、静态的绝对平等不但不可能,而且还会以自欺欺人的方式误入歧途。我们提倡“先富”是首要的一步,“同富”才是社会稳定的支柱和平台。让没有富起来的人看到希望,看到机会,让已经富起来的人感到失去富裕的可能与威胁,伸出友爱之手帮助没有富起来的人,这不仅仅是伦理范畴的道德问题。在社会学尤其是政治社会学意义上,这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机制问题。资产阶级社会学学者为统治者提出了不少有益的社会稳定理论,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更需要学者关注社会转型问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六、一身二任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从建立到现在,一直一身二任,既要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任务,又要完成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任务。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28年浴血奋战并取得胜利,既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曾一度认为可以集中精力完成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完成的任务,在建设单纯使用无产阶级的办法。1956年前,共产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一大二公三纯”的思路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端,搞到只有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的程度,相当一部分已经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仍然是一身二任,既要完成社会主义本身的任务,又要继续完成本该由资产阶级完成的发展经济的任务。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完成本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没有经过单纯的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没有出现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反对封建主义,但是,中国的资产阶

级没有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发展资本主义和发展现代生产力的任务,这些任务,只有共产党来替他们完成。中国的五四运动,就具有一身二任的性质,它既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内容,又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内容。“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①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反对封建主义、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斗争,“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②。事实上,这个“大工程”一直没有完成,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上,就是一身二任,既要反对封建主义制度,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又要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前一个任务落后于西方几百年,后一个任务可能超前于西方几百年。

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写白话文等,完成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思想启蒙任务。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就非常成功。他1926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② 同上。

在 74 年后的今天读起来,和现在的语言几乎完全一样,非常通俗易懂。这些任务严格讲,应该是辛亥革命的延续,是孙中山应该完成的任务,是孙中山应该解决的问题。五四运动提出了问题,逐步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存在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有的也还有它存在的客观依据。我们的小班禅,就应该属于这个范畴。但是,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的泛滥,给共产党增添了替资产阶级完成反对封建迷信的任务,这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法轮功”的实质就是封建和迷信。这本应该是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由共产党替它来完成。封建主义的东西之所以长期存在,一方面是中国缺少专门的、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现在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还有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为了反对社会主义,保护、支持、利用中国封建落后的力量。五四运动后半期是中国最进步的历史时期之一,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很快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解放,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很不容易的。东亚各国的共产党大部分是 1919—1921 年前后成立的。但这些国家绝大多数没有搞成社会主义,在后来社会主义发展的高潮时期也没有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惟独中国有一批志士仁人很清醒地从资产阶级革命者、激进民主主义革命者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毛

泽东等人),他们很快地聚集起力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党在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我们虽然是共产党,但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是非常英明的。同时,共产党是在坚持自己本身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坚持共产主义性质的前提下,替资产阶级完成本该他们完成的任务。毛泽东是完成这个任务的佼佼者、杰出者。这个任务完成得漂亮,首先是因为完成这个任务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资产阶级的人,而是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人,是干社会主义的人,是更高明的人。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这些任务是由二百年前的卢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开始的,但在中国就得由共产党人和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开始并坚持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毛主席和党内干部群体对革命阶段论的理解出现了绝对化的倾向。不少人认为,共产党过去出生入死牺牲了2000万烈士,是替资产阶级、替孙中山完成的任务,新中国建立之后,该一心一意完成自己的任务了。1956年前,党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幼稚,由于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搞单轨制,按照“一大二公三纯”的思路进行经济建设,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思路发展到极端。在此期间,1957年后,搞到没有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的地步,相当一部分已经是共产主义的内容,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接受了“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党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仍然是一身二任,仍然要替资产阶级完成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河南省农村目前生产力的水平是相当低

的,大面积的农田仍然靠牛拉犁来耕作,靠人工用镰刀来收割。完成这种由镰刀、锄头、牛耕向拖拉机、收割机过渡的任务本来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替资产阶级完成这些任务。在生产力处于低水平的今天,资本主义仍然有发展空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可调动的积极因素。五四运动以来一直一身二任的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需要学习、利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经验。党的一身二任,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要有替中国的资产阶级彻底完成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这一任务的长期思想准备。

第二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 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七、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为了说明市场经济的含义,可以用以下两个公式来加以表述。

公式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社会主义制度 + 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个公式里,制度要统治体制,亦即社会主义要领导市场经济,而不是相反,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要素,是相加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拼盘,而不是融合。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派生出来的经济体制,同资本主义不但具有渊源关系,而且还有血缘关系。而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利用,就是要充

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充分发挥竞争,追求效益最大化,实现生产社会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在这一点上,它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具有共同的逻辑归宿,二者是相通的。但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矛盾,是对立的统一,而活力和动力恰恰就在矛盾中。在这个矛盾中,加号就是共产党,是由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的,并解决这个结合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学会驾驭市场经济。

公式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社会主义制度 + 资本主义经济因素 + 个体经济

这个公式说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部包含着对立的经济因素,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也是当前许多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多元混合经济,并且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例如,国有经济内部也有私有经济,还有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方式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包含着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实现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兼容性和混合性,会引发出不同的主义。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其机制是指向资本主义的。我们党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中剥离出来,移植到社会主义身上,目的是充分利用其发展生

产力的一面。我们只能允许市场经济原则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不允许它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消极作用,不允许它从消极方面影响我们党,影响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市场经济具有侵蚀性,它会用它的一套来侵蚀共产党,使共产党变得跟它一样。目前存在的党风问题、腐败问题、党员干部蜕化变质问题,大都是市场经济对党侵蚀的结果。

我们要用唯物史观来对待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既要肯定这种结合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又要认识到,这种结合是不完善的,也不像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宣扬的那样,是“自然秩序”的体现,是合乎“自然法权”的。

市场经济机制在经济发展上具有较高的效率作用,这种高效率建立在竞争法则的残酷性上,引发人们为了利润和私利去冒险、创新,也教人们去尔虞我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不仅得不到遏制,而且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人性上的卑微结合起来,使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受到遏制,使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外寻找能够取而代之的新制度。

要消除或者最大限度地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在市场活动中,个人成本和收益的差别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



制和资本家贪婪剩余价值的本性,成本外化和收益内化成为市场机制难以克服的外部性问题。比如,资本家的化工厂污染周围的环境、机械厂给居民造成噪音,就是资本家把个人成本的一部分转嫁给社会,从而获得超额利润。科斯认为,资本主义通过产权制度建设,可以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可以使资本主义生产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然而,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所言,“很不幸,科斯的强有力的理论性论争遇到了严重的实施上的问题”^①。问题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掌握着社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可能违背资本本性和阶级利益,制定阻碍其获取最大利益的立法,或者说“作恶者与受害人之间……达到这种交易的困难(指成本)可能会大到无法克服的程度,几乎根本不可能成交”^②。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它主要存在于公共物品中。公共物品就是具有较强外部性的社会产品,比如,要竞争就要有公共的比赛场所,这个赛场就是公共环境、公共物品。私有制总是驱使竞争者把自己的成本转移给公共物品,把公共物品的利益尽可能多地转移给自己。公共物品问题与外部性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公共物品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对周期长、风险大、社会效益比重大的投资动力缺乏问题。

二是垄断问题。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

① 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第20页,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② 同上。

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垄断削弱了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最终损害效率,妨碍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其统治权的长治久安,制定了较为严格和细密的《反垄断法》,以确保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的充分实现。但是,《反垄断法》只能解决商品市场的垄断问题,而最根本的垄断是资本的垄断、高等教育的垄断、知识产权的垄断、舆论权力的垄断,等等。私有制的本性是排他。垄断作为资本的本性,作为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不会被资产阶级轻易放弃。垄断造成的市场不完全、效率下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身不能根治的痼疾。

垄断是资本集中和扩张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是资本本性的反映。列宁指出,在生产领域,当股份公司把大量中小资本集中为大资本时,垄断就会在生产流通中发生,“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①。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看,垄断最早发生在私人资本领域,出现较大规模的垄断组织,如托拉斯、康采恩等。20世纪70年代,美国4家汽车公司垄断了全国汽车产量的87%,7家钢铁公司垄断了全国钢产量的72.3%。私人垄断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经济的垄断竞争,经济政治化的重要结果是资产阶级国家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列宁明确指出,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国家同势力极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

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①。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中央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美国为25.3%,英国为38.2%,法国为43.7%,意大利为49.6%。当私人垄断资本把国内市场瓜分完毕并日益同国家垄断资本结合起来时,垄断资本对国际市场的瓜分成为不可避免,国际垄断资本的产生也就势在必行。垄断资本的国际化使国际垄断竞争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并最终诉诸武力,以解决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国力强弱的变化而对世界市场原有格局提出的重新调整要求。

垄断,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消解了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阻碍了效率的提高,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损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垄断没有绝对的好坏、善恶等价值观上的区别,只有和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后,才对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一定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同私人资本相结合、同资本家像狼一样贪婪剩余价值的本性相结合,就成为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成为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手段。垄断同私人资本结合还增强了私人资本的排他性,必然激化垄断竞争,使私人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

资本之间、国际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

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过分强调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过分强调与国际市场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忽略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忽略资本国际化背后的利益矛盾,单纯地认为世界各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美好的“国际大循环”时期。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取得辉煌成果。一体化首先是经济意义上的。美国《幸福》杂志曾载文指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种全球经济之中,全球具有相似的购买方式,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喜欢意大利生产的贝内顿运动服,对日本制造的激光唱机垂涎三尺。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顿克说:“全球正在迅速变成一个单一的市场。”美国《洛杉矶时报》对1989年美国的朋蒂亚克—莱曼牌汽车作了分析,结果表明,该车几乎不再是美国车了。这种车在德国设计,在韩国组装,其发动机在澳大利亚和韩国制造,变速器在加拿大和美国制造,电池、轮胎和电气配件在韩国制造,车用金属薄板在日本生产,无线电设备在新加坡制造,燃油泵在美国制造,等等。1988年,在米兰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了建成欧共体“无边界统一大市场”计划,该市场实现了商品、人员、劳务、资金等4个自由流通。1992年,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正式签订建立经济区的欧洲经济条约。1998年,欧洲中央银行正式启动,欧洲统一货币——欧元于1999年1月1日正式起用,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再是遥远的事情。一体化也包含着政治和军事意义。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实质上是各参与国以部分放弃国家经济主权为条件,以调节生产过程和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为内容,谋求垄断资本主义共同利益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结合。

经济一体化归根结底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的国际化,一方面,并未改变垄断资本追逐超额利润的本性;另一方面,并未消除激烈的垄断竞争,并未使世界经济、政治进入一个完全和平的共同发展的黄金时代。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适度的选择,既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总体趋势中保持民族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又要学会按照国际市场规则与各种经济组织打交道、做生意。

三是分配不公问题。分配上的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能克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分配制度不公平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经济注入动力,但是,过分的两极分化是极大的社会破坏力量,它影响经济效益,阻碍经济发展,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为了克服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做了一些努力,如改革税收制度等,甚至打出“福利国家”的旗号,以欺骗社会公众,掩盖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必然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目的决定的,是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表现。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消除分配上的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的。

分配上的不平等首先表现在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在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呈下降趋势,即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以美国为例,从1919年到1947年的近30年间,采矿业和加工业这两个部门的工人工资占该部门国民收入的比重从37.7%下降到27.8%,而资本家利润与该部门国民收入的比重则从62.3%上升到72.2%,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虽然在生产发展中有所提高,但相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变得更加贫困了。马克思指出:“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① 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紧扩张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世界范围内穷国和富国的分化瓦解日益加剧即贫富两极分化的国际转移,成为当前市场经济的重要表现。有关部门统计资料表明,1987年,占世界人口总数16.2%的发达国家占有世界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81.5%,而占人口总数83.8%的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仅占18.5%(其中,占人口总数64%的低收入国家只占4%)。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1950年,发达国家为3840美元,低收入国家为164美元,相差22倍;1980年发达国家增至9684美元,低收入国家增至245美元,相差39倍;1983年,发达国家达到11060美元,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9—35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收入国家仅为 260 美元,相差 40 多倍。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报告,世界上 40 多个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 219 美元,与发达国家相差达到 50 倍。国外一些经济学家预测,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这种人均产值的差距将再扩大 14 倍以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不久前发表的报告说,最近 30 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平均增加两倍,但自 1990 年以来,约 100 个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或滑坡;占世界人口 20% 的最贫困者的收入由世界总收入的 2% 下降到 1.4%,而 20% 的富人的收入则由占世界总收入的 70% 增加到 80%。报告又说,358 个大富翁的收入超过 23 亿穷人的收入;从 1980 年到 1993 年,穷人人数超过 10 亿,他们来自 70 个经济异常萧条的国家,现在的平均收入比 1980 年还低,而其中 40 个国家的平均收入低于 1970 年的水平,21 个国家的平均收入甚至不到过去平均收入的 1/5。报告认为,如果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到 2030 年,世界上最贫穷者的年收入将低于 325 美元,而工业国的人均年收入将达到 4 万美元。又有资料表明,在 1995 年约占世界人口 1/5 的 13 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人数比 1990 年增加 3 亿。再看一看一些国际大财团和大跨国公司的情形。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所报告说,全球 100 支最大的经济力量中一半以上是公司而不是国家。200 家最大的公司所控制的经济活动不少于全球的 28%。日本三菱公司的经济力量要比印度尼西亚还大。由萨拉·安德森和约翰·卡瓦纳撰写的调查报告《最大的 200 家》透露,这 200 家大

公司 1995 年的销售量相当于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8.3% (1982 年为 24.2%) ; 销售总额为 7.1 万亿美元, 大于除去 9 个最大国家之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 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剥削的社会表现。社会再生产不能均衡, 市场不能出清, 则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剥削的经济(价值)表现。市场经济机制最重要的运行原则就是要均衡、要出清。当贫富分化过大时, 市场机制就受到了私有制的破坏。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 必然影响市场机制的效率作用。经济学中的公平理论对此有专门的论证。提出公平理论的是美国人 J. 亚当斯, 他认为, 职工经常参加一种社会性的比较, 即设法评价彼此从工作中得到的与个人所作贡献相联系的结果(公式为: 个人成果: 个人投入 = 他人成果: 他人投入), 这种评价成果成为他们采取下一步活动的动力。如果个人成果投入之比相等于他人成果投入之比, 就获得一种分配公平的认识和自我价值的肯定。获得分配的公正是职工强大的工作动机, 人人都希望在公平合理的经济环境中工作, 分配公平合理会调动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分配不公会挫伤人们的热情和积极性, 导致人们对管理和社会的敌视情绪。

资本主义还存在三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通货膨胀(周期性)、衰退、失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技术性问题, 也有非技术性问题, 最根本的是制度性问题, 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生产资料占有上的私有制与

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在客观上形成摧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巨大物质力量。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为了减少这个矛盾激化时的破坏,使用国家宏观手段对市场机制进行反调节,结果是治标不治本,危机固然被延缓,但麻烦增加了,进一步调控的回旋空间减少了。只有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能解决通胀、衰退和失业问题。

八、党性原则与市场原则的对立

共产党的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多数是对立的。共产党的原则是大公无私,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自私·自利。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共产党人的价值标准是贡献大于索取,市场经济人的价值标准是索取大于贡献。

资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致的。它的一致性既可以从政党的角度讲,也可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资产阶级政党不仅适应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适应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等于私有制加市场经济。私有制加自然经济等于封建主义。这个“加”,是说它有一种契合关系。契合在理论上称同构或者正相关。这样分析,就可以明白“三讲”教育中要解决问题的来源,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共产党的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的矛盾,研究市场经济机制。要研究构成

市场经济的要素。市场经济有三个基本要素：

一是自私·自利的市场主体。有市场主体才有竞争。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在市场上都作为独立的单位出现，其利益是本位化的。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你别拿我的，我也不拿你的；你的需要和我的需要如何实现，如何把商品卖出去，市场竞争见分晓。谁的商品质优价廉，谁就能卖出去，谁就胜利。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没有本位化，资金、产品可以调拨。1958年的共产风就是在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进行调拨。后来的实践证明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不能随便调拨。但国有企业之间还存在调拨，还有“部管机床”或“局管机床”这种没有本位化的设备。市场经济则不然，它第一位的是自私·自利。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也要谋取利益，即以本企业为本位、为单位的自利。在目前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这一家国有企业战胜那一家国有企业的例子已屡见不鲜。马克思曾经说过，市场经济有四个条件，即自由、平等、所有和边沁。“自由、平等”是指本位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所有”是指所有权要明确；“边沁”是指自私。边沁是西方一位经济学家的名字，边沁的理论是主张自私的，所以，“边沁”就成了“自私”的同义语，边沁就是自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不叫自私，但应该自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条件的判断是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发现了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机制。“看不见的手”的首要前提是规定市场经济的主体人格——“经济人”人

格。经济人人格就是自私的人格。对经济人人格,后人只有肯定、丰富和发展,没有否定和推翻。

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自私·自利表现为追求利润,把资本投放到市场上运转,在运转中收益,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区别于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会推动自利性向自私性发展。

三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生产资料、资本、劳动力等都是生产要素,其流动要充分自由。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是不充分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实现生产要素流动的充分自由。我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能够站稳脚跟,就是因为资本项目没有充分市场化,更没有国际市场化。否则,索罗斯们就会在瞬间大量吃进吐出,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的金融搞乱,从中赚取大批资金。

分析共产党的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的矛盾,需要分析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一是阶级性。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必须从阶级性上弄清楚资产阶级政党是怎么适应市场经济的,弄清楚共产党怎么不适应市场经济、怎么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工人阶级是多数人的阶级,工人阶级政党执政是多数人阶级执政,而任何国家直接的执政者都是少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人数是很少的。这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党中央和多数人组成的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系非常紧密,共产党必须要保持这种阶级性紧密联系的政党机制。这一机制需要经过一个很长

的集中过程,同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私有制机制的集中过程是相悖的。资产阶级是少数人阶级,资产阶级政党执政是少数人阶级执政,根本不需要充分、广泛、多层次的民主集中制,仅靠几百个人的参议员、几个人的两党领袖的台前幕后活动,就能完成阶级性的联系和阶级性的集中。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工人阶级作为整体是富有的,作为个体是相对贫穷的。市场经济靠资本市场配置资源,资本的力量在市场杠杆中居于领导地位,市场经济原则倾向富者、强者。作为个体贫穷的工人,怎样组成统治阶级,怎样在市场经济中领导富有的人(“三资”企业主、私有企业主、个体户以及其他高收入者),这是一个历史性难题。比如反腐败。西方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一般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美金,因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员从政前就是百万富翁,收买百万富翁的费用当然很高,腐败的价格很高,否则他不动心。西方的反腐败是一元反腐败,就是在他们资产阶级内部反腐败,腐败和反腐败是一元的。我们很大一部分问题是二元反腐败,收买者一方是一元,是资产阶级;被收买者、掌权者一方是另一元,是工人阶级。收买者用相对较低的价格就可能把我们的干部拉下水。反腐败机制犹如一堵墙,墙外的富有,墙内的贫穷,如同水位差。资本主义一元反腐败这堵墙内外水位差不大,腐败成本较低;社会主义二元反腐败这堵墙的内外水位差很大,腐败价格较低,腐败成本较高。这种反腐败的难

度大得多。能否富有成效地解决二元反腐败问题,对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峻考验。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和被统治是政治关系,富有和贫穷是经济关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政治结构与富有和贫穷的经济结构是同一结构。富有的奴隶主统治贫穷的奴隶,富有的地主统治贫穷的贫下中农,富有的资产阶级统治贫穷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贫穷的领导富有的,这个结构倒过来了,称为“异构”。异构是最困难的事情。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没有穷人。即使个别人出身贫寒,或者青年时是穷人,或者老年时是穷人,但他担任资产阶级政党领袖时,担任政府职务时,一定是富人,一定是富人集团的成员。所以,资产阶级政党和市场经济的财富分配、运行机制是契合的。而工人阶级政党在这方面与市场经济机制则有相当部分是相反的、对立的。另外,市场经济的原则重视资本,轻视劳动。资产阶级政党通过各种财团、基金会,依靠资本的凝聚力,强调市场经济的利益第一,调动政治力量。共产党之所以要驾驭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理由是要使劳动高于资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实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所以,从阶级性角度讲,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对立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致的。

二是自觉性和自发性。工人阶级政党讲自觉性,资产阶级政党靠自发性。工人阶级政党是一个把自觉性放

在第一位的政党,有着远大的社会目标——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自觉性还表现在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我们党以一元化的理论作指导,和资产阶级政党有严格区别。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急功近利,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没有远大目标,这一点和市场经济是一致的。最典型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非常充分,政党建设也非常讲实用主义。共产党则相反,《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的这种高于自己本阶级利益的自觉性,使得它有资格作为领导者。

三是组织制度。西方最喜欢讲民主,什么竞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它们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民主进程。有民主的同时也有集中。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不是体系,不是严密完整的制度。它的民主过程、集中过程,以利益本位化为原则,以个人为单位,在集中过程中,把基层民主活动中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意见逐步转换为资产阶级的意志。这是一个二元过程。工人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以利益本位化为原则的,而是以整个组织的理论和信仰为政治标准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以组织为单位,以政治、信仰、自觉性为原则的一元化。资产阶级政党允许内部有派别、派系,这些派别、派系以利益为原则,而不是以统一的信仰为原则。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每次竞选前先产生本党的领



袖,党的领袖的竞争非常激烈,先在党内斗得一塌糊涂,直到产生一个领袖后握手言和一致对外。而竞争至上原则就是市场经济原则。所以,资产阶级政党的机制是市场经济机制的翻版。

四是基层组织。工人阶级政党是代表劳动人民、代表工人阶级、代表大多数人的政党,必然有基层组织,基层组织必须开展活动,靠基层组织的活动扎根于群众,来代表组织和动员群众。基层组织必须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其承担的任务和中央的任务性质上相同,这是工人阶级政党非常突出的特点。工人阶级政党要对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负责,要把处于广大劳动人民之中的基层组织统一起来。如果离开基层组织,共产党将失去自己的物质力量,因为共产党所依靠的物质力量不是资本,而是广大劳动人民。资产阶级政党是代表资本力量、代表少数富人利益、代表少数人阶级的政党。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统治劳动。掌握资本的人是处于高层的少数人,资产阶级政党只要抓住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几个大财团就行了,不需要也不会到基层普通劳动者中寻求力量。所以,资产阶级政党只需要政客集团,不需要基层组织活动,它们的党员只是完成投票竞选任务,不需要参加基层组织活动,更不承担基层组织的任务。如果共产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政党,肯定要“傍大款”。苏联共产党瓦解后,新产生的政党的最大特点就是“傍大款”,政治家和新的财团即资本相结合。

五是作风。共产党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三大作风是形式,它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是工人阶级政党形式和内容统一的一个具体表现。“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怎么说,实践就怎么办;实践提出新课题,理论必须研究解决。如果理论和实践脱节,就意味着我们党背离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党性。“密切联系群众”,说明了我们党的阶级性,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必须和基层的同志心心相印,是一元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别人的标准和要求自己标准是一致的,在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取得一致。资产阶级政党、市场经济原则不讲这个。中国传统美德也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市场经济原则恰恰是“己所不欲,必施于人”;我不灭亡,但是我要你灭亡;我不破产,但是得让你破产,你不破产我怎么能发达?竞争过程就是我胜你败,你失败我才能胜利。市场就是这样,对别人和对自己的标准绝对不一样。市场经济以市场主体为本位,以利益单位为本位。所谓“本位”,就是自己的利益至高无上,就是自私·自利。市场经济原则自然就推翻了理论和实际的一致性、人对己的一致性、领导和群众的一致性。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本质区别,它和市场经济原则在本质上是対立的。

六是组织,七是权利和义务。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是从组织角度讲的;个人义务大于权利,是从党员个人角度讲的,整体原则与个体原则是一回事。为了便于从党的机制、从建党机制上来区别它们,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阐述。市场经济主张以个人为本位或者以一个利益单位为

本位的自由平等,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对称的。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是西方人权理论的基础。但是,共产党人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不对称的。共产党员和公民相比,义务比公民的多,权利比公民的少。党组织的严密性来自于党员把部分公民权利自觉贡献出来并由党组织集中起来。如果党员和公民的权利相同,党员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党就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章、党纪、党内规章制度把党员的部分公民权利集中起来形成党的权力。党组织在必要时,毫不客气地使用这种权力。从这个方面讲,彻底地否定了市场经济原则,形成了部分的、有条件的不平等、不自由、不私有。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就在这里。狼牙山五壮士的任务是用小部队的牺牲换取大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生存。这样的战例不胜枚举,就是党组织要求党员献出生存权利!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党要驾驭市场经济,必须高于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原则和工人阶级政党原则对立面前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包括一些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一是理想信念动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识不足,缺乏信心,一遇到问题和困难就摇来摆去,甚至对党离心离德,为自己谋划所谓退路。这是市场经济原则的表现,个人利益第一,所以才理想信念动摇。二是政治观念淡薄,政治立场模糊,甚至缺乏起码的政治判断能力,是非不分,好坏不辨,在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患得患失,回避矛盾,推卸责任。这也是市场经济原则的表现,从一

己私利出发。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患得患失,回避矛盾。三是从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实用主义地对待中央的政策,无视国家利益和法制政令的统一,甚至利用职权保护和参与犯罪。从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就是信奉市场经济原则:个人利益本位化、利益单位本位化、市场主体化,讲究实用主义。四是跑官要官,任人唯亲,在干部中拉拉扯扯,在班子内勾心斗角,搞无原则的纠纷,甚至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这也是把市场经济原则搬到党内来,把“官”变成有含金量的东西拼命追逐。五是作风浮漂,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热衷于形式主义;铺张浪费,追求奢靡之风,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更有甚者,个人私欲膨胀,贪赃枉法,索贿受贿,腐化堕落。形式主义、沽名钓誉也是市场经济原则。这五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党的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对立的情况下形成的,同党的性质是格格不入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党性原则同市场原则的矛盾和党内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告诉我们,是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由我们党来驾驭市场经济,还是完全让市场原则取代党性原则,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如果听凭市场原则取代党性原则侵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会出现党内的政治生活的市场化,使社会主义民主蜕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如果这种情况成为风气,蔓延开来,发展下去,共产党就有可能蜕变为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背离党性原则的个人追求和政治主张,党内存在的



背离党组织的某些非正式组织等,都说明多元混合经济主体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孕育着共产党自发滑向社会民主党的条件。

当代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和工党),一支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后裔,一支是东欧苏联的共产党蜕变而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社会民主党恢复了联系并建立了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制定了纲领和章程,鼓吹“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不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主张在保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兴办新的公有企业,市有或地方性企业,或消费合作社”等形式,争取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充分就业,实行社会保险和财产的公平分配,搞“福利资本主义”;在思想文化上,宣扬“真理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自由化。几十年来,由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和繁荣,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政治上成为一股重要的势力,不少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取得过一段时间的执政地位,使“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在社会民主党及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党性原则,奉行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多党制,搞政治多元化,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鼓励私有化,放弃公有

制的主体地位；在思想文化上，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鼓吹自由化，纵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由泛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欧剧变、苏联瓦解，是共产党丧失党性，滑向社会民主党的必然结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之类的主张是没有地位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所谓中间路线的破产，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和平的环境里，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可能与动因是增加了。当今世界，共产党的理论、思想，它的路线、纲领，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仍然是最先进的，是任何政党也超越不了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近80年来的辉煌历史、它的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已经成为历史的丰碑，是谁也抹杀不了、否定不了的。因此，在中国，取消共产党，搞老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是不大可能的。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容易滋生“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有使共产党滑向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危险。共产党的蜕变，第一步只能是社会民主党，而共产党的牌子，包括大量可以被民主社会主义接受的口号、理论都会继承下来，但阶级实质会被改变。

我们党之所以坚持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利用”有两个层次：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机制，这些成果、机制本身的属性并不是资本主义，如市场经济机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如前所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交叉的时代。

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还十分弱小,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是两个主义并存的时代。原来我们在国内搞纯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完全排斥在国境线之外,发展得比较慢。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这个时代“二元”并存的特点,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中局部地装进资本主义。这是处在两种社会制度交替的特殊阶段的一种丰富多彩。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两种社会制度二元并存,呈现出百家争鸣、人才辈出、起伏跌宕、丰富多彩的特点。我们党在20世纪二元并存的中国历史上一身二任——既要完成工人阶级政党自身应该完成的任务,还要完成本来应该由资产阶级政党完成的任务。党在1949年以前浴血奋战牺牲2000万人,完成的不完全是自己的一些任务,而主要是替孙中山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有著名的“革命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1949年以前,我们替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任务;1949年后,我们要专心致志地干自己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单纯了。1949年后,我们仍然有替资产阶级完成的一些任务——发展生产力,这一任务不能全部由社会主义来承担,还得由一部分资本主义来承担。邓小平同志发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还是一身二任,只不过是主题变了,政治任务变成了经济任务。既然资本主义在今天还有发展的余地,还有积极性,我们就拿出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来,学习它,利用它,驾驭它,利用它在经济上发展

生产力,在政治上培养工人阶级。没有资产阶级是培养不出成熟的工人阶级来的。苏联共产党垮台时,苏联工人阶级和基层群众几乎没有反应,处于麻木和脆弱的状态,原因之一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在企业没有独立的权利,只听计划的命令,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独立的主体性。辩证法和组织学中有“自组织原理”和“被组织原理”。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被组织”,其经济活动几乎完全是被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是自组织,必须自己组织起来搞生产经营。只有“自组织”才能组成充满活力的有机体,而“被组织”的时间如果太长了就只能形成没有活力的结晶体。计划经济非常纯,但它是结晶体。市场经济充满对立和竞争,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在这种对立和竞争中获得内生组织力,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生的过程中获得免疫力。如果我们党能够战胜今天出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我们就比50年代、60年代先进得多,这是获得免疫力后战斗力的增强,是获得免疫力后的纯洁。

九、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历史局限

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阶级。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该具有先进性;它应该具有独立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和历史使命,具有独立性;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剥削、消灭包括自身在内的阶级,为了实现这一

最终目标,必须全面提高自身的阶级素质,发挥阶级的整体力量,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所以,它应该具有全面性。具有先进性、独立性、全面性的中国工人阶级,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能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历史责任感,英勇斗争,艰苦创业,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革命和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人阶级更是顾全大局,为了促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让步,责无旁贷地承担了改革的“转移成本”。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阶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工人阶级(本文主要是指产业工人群众)在市场经济中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出来,其主要表现是:政治上,政治主体意识比较薄弱;经济上,经营管理能力不强;文化上,知识文化水平有待提高;竞争上,劳动积极性不够高,竞争能力不够强。这些局限性影响着它的主人翁地位的实现和阶级力量的发挥,影响着国有企业的振兴。因此,客观分析当代工人阶级的局限性,便成了全面提高工人阶级整体素质、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第一,政治上,当代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意识比较薄弱。应该肯定,当代工人阶级较之他们的前辈,其政治意识和主体意识有明显提高,并正在以渴望参与国家管理、体现个人政治价值的形式迸发出来。但也要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素质和主体意识还不能和目前时代对他们的要求相适应,其表现是: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核心部

分——产业工人,还比较缺乏现代政治所需要的积极的政治态度、科学的阶级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仅以近几年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为例。十五大前后,在中央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旧框框的同时,也确实有人借机说了很多出格的话,比如,说职工是国家的主人翁,是改革的最后一道障碍,是改革的核心障碍,应该用钱买断主人翁才能继续改革;还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对国有企业要困它、分化它、用它,就是说,要给国有企业增加困难,要把它拆开,还要让它继续作贡献(这就不仅仅是卸磨杀驴了);有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竟然认为,没有充分根据说公有制优于私有制;有的作家在小说里以“私有制万岁”为题,成段成段地阐发“高论”;有的大学教授甚至说,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及相关的民主管理理论——主人翁论,是全民所有制发展道路上布满鲜花的陷阱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危害公有制和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言论,我们的公有制企业,我们的工人阶级,没能给以坚决回击和有力批判。

工人阶级的这个局限性,有其历史根源。工人阶级取得执政地位前,处于受雇佣受压迫的地位,没有能力去占领这个舞台。工人阶级取得执政地位后,由于“师法苏联”,政治上实行了高度集权的封闭政治体制,经济上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得政治任务 and 意识形态任务完全由上面负责,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虚置和形式化,正是这种势力的影响和计划经济惯性力量的作用,致使工人阶级在新时期仍然政治意识薄弱、阶级主体意识

不强,不能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体现自己的力量。

第二,经济上,当代工人阶级经营管理能力不强。这首先表现在参与领导、参与管理的水平低。如何管理好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工人阶级既缺少心理准备,又缺少必要的管理知识和会计能力。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不少企业因人祸而垮台,因企业家腐败而破产。面对这种局面,工人只有流泪、控诉和抗议,而没有积极有效的作为。因为受到管理能力、会计能力的制约,很多情况下只能是等问题彻底暴露之后,已经大祸临头了才知道到政府诉苦、请愿。工人阶级中有些人对现代企业制度中具有刚性特征的制度管理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适应性。其次是资本运作能力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国有资本同其他资本一样,在共同的市场规则下竞争、发展。工人阶级在资本运作上明显不如其他经济主体的人。如在商业资本运作上,工人阶级不如资产阶级、个体商贩会做生意。1964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向资产阶级学会做生意。从推行市场经济的这些年看,国有商业在商业领域的比例大大低于生产领域。国有企业在生产领域大概占70%,在商业领域低于40%。这种情况,对国有经济而言是很可怕、很要命的,因为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必须在流通领域实现。由于不善于商业运作,工人阶级创造的价值相当多的部分被其他经济主体如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拿走了。例如:北京一家衬衫厂生产的衬衫,自己在市场上定价18—20元。小商小贩批发走后贴上其他商

标,便以 300 元的高价出售,而且比较畅销。这说明,在市场经济中不仅要有生产意识,还要有商业资本意识和市场运作能力。又如金融环节,这是高利润、高回报的领域。资产阶级大投机家索罗斯,靠投机聚敛了巨额财富,并用来资助世界上一些反动的党派进行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我国工人阶级的这种利用金融资本赚钱的意识和能力还很差,远远不适应市场经济。再次是创新能力不足。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仅就技术创新来讲,我国工人阶级的创新能力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上海宝钢是全国最大、最先进的钢铁企业,而宝钢一年的专利数大概只及韩国同样钢厂(普向钢厂)的 3%,宝钢一年大概有 60 项,而普向钢厂一年有 1000 多项。

第三,文化上,当代工人阶级的知识文化水平有待提高。改革开放后,随着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的进程,这个阶层的知识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不断增加。同时,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空前地提高了整个阶级的知识水平。再加上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老一代工人退休离岗,新一代工人接班上岗,整个工人阶级的知识状况也得到了改善,60%以上达到了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但是,这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尤其是与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比,整个工人阶级知识水平的局限性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太少。在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教育比较发达,不少企业中受到高等教育的高达半数以上。而我国 1989 年的统计数字是 0.9%。二是知识水平落后。改革开放后,高等院校开始考试招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教材既脱离现实,又落后于先进的科技知识,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世界科技进步和知识更新速度在急剧加快,几年一更新。而我们现在的岗位再培训、再教育以及带有战略性的智力资源开发等都还没有纳入轨道。三是高级人才匮乏。在国有企业,无论是高科技人才还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经营管理人才都很少,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要。四是产业工人中,尽管大都有初中、高中文化知识,搞一般机械操作还勉强可以应付,但要搞技术创新则显得力不从心。随着第三产业和高科技的发展,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工人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体力工人阶级比例将逐渐缩小,脑力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面对这种形势,他们怎样才能形成阶级意识,这是当前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列宁早就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如果不立足时代前沿,拥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便不能真正地、理性地掌握和驾驭资本运行,更不能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占支配和领导地位。因此,牢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弥补缺陷,向“知识工人阶级”转型,是当务之急,势在必行。

第四,竞争上,工人阶级的竞争能力不够强。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承包制、租赁制的实行和按劳分配原则的恢

复完善,改革给工人带来的实际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调动了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发展生产和创造社会财富中起了积极作用。然而,总的看仍不容乐观。目前,由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种种矛盾尚未完全、妥善解决,企业职工中出现了积极性明显低落的情况。华东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对上海几百家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97.5%的厂长、经理和97.3%的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21个城市职工的调查表明,工人在生产经营中只使用了67%的体力和61%的脑力。90.7%的人认为如职工积极性能充分发挥,企业经济效益将增加50%—200%;全国总工会的一个调查表明,当前制度工时利用率只有40%—60%。另外,许多苦、脏、累、险岗位没有人去干,企业只得另雇临时工。

形成工人阶级政治主体意识比较薄弱和经营管理能力不强等局限性的原因,从历史角度讲,是资本主义经济统治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阶级处于被雇佣被剥削的地位,被排斥在生产管理之外,工人阶级大多被安排在生产领域、生产环节。在交换领域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干推销工作,在一些关键环节和部门中,主要还是资本家或其代理人,即少数高级管理人员。金融环节是资产阶级实现统治和领导的世袭领域。情形往往是:金融环节的资本家领导商业环节的资本家,商业环节的资本家领导产业环节的资本家,产业环节的资本家实现对工人的原始剥削即第一剥削。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下,工人阶级的经营管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被压抑了、



萎缩了。从现实角度讲,是计划经济的影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计委、经委实行封闭的运行机制,层层下达生产计划,而企业只是整个计划大盘子上的一个棋子。不仅生产如此,原料供应、产品销售等都由国家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经营管理能力、经商能力不可能得到锻炼。第三个原因是,市场经济尤其是现代企业制度还处在探索建设之中,诸如产权关系、企业微观机制等很多关系还未理顺,也影响了广大职工的创新能力。形成现在工人劳动积极性不够高、竞争能力不够强这一局限性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分配不公给工人阶级带来了相对剥夺感。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于收入不仅和自己的过去作纵向比较,主要的还要和其他阶层作横向比较。如果发现自己的收入提高的幅度小,就会感到收入相对下降。现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工人的收入不仅同私营企业主、个体户无法比,同第三产业和“三资”企业员工相比也相差不少,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困扰着他们,对他们劳动积极性和竞争能力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二是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缺乏竞争机制。传统的固定工制度以时间的长期性、空间的固定性和技术的单一性,影响了人与人、人与岗位的最佳结合,阻碍了职工特长的发现、发挥和积极性的调动。必须采用体现生产合理配置的全员劳动合同制,以保证劳动组合处于优化状态。另外,工资制度,无法解决劳动量的多元结构同工量量的单一性的矛盾,必须实行工资量的多结构,即采用以工资结构反映劳动结构、以工资差别反

映劳动差别为特点的企业工资制。只有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改变僵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和“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实现就业制度变静为动、分配制度变死为活,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提高。三是企业缺乏全面的激励机制。多数企业只重物质刺激,缺乏精神激励。实践证明,物质刺激对调动积极性作用是有限度的,目前已经出现弱化趋势。现在工人中出现了“不给奖金不干活,给了奖金也不干活”的现象。企业缺乏精神激励机制大致有如下一些表现:忽视“实绩考核”的原则,论资排辈,职工缺乏内在动力;缺乏自由讨论和竞争的氛围,抑制了职工的创造力;感情投资未到位,只重视改善生活福利设施,忽视和职工沟通感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企业在正面激励机制(压力机制)的相互作用上也重视不够。

工人阶级如何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实现自己的阶级地位,是现实向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阶级作为党的阶级基础,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没有自己独立的单独的全面的经济活动。职工从工资、福利到参与企业、社会活动的方式,都是由计委、经委统一设计或由其他政府部门安排的。进入市场经济后,随着政企分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主要是搞好宏观调控、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等。国有企业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法人实体,同其他经济实体一样,在共同的市场规则下独立参与市场竞争。这就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必须以经济核算单位为

基础,以集体的力量,独立地争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实现。独立地位的争取,是指在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建立起来后,职工利益和企业兴衰息息相关,国家不再统包统揽,企业命运完全掌握在企业全体职工自己的手里,靠全体职工在市场经济中去拼搏,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巩固和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企业发展了、兴旺了、成功了,工人既履行了主人翁的职责,又实现了主人翁的地位。相反,如果企业生产经营失败,企业破产了,职工就得下岗、失业,或被其他经济成分所雇佣。集体的力量,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无偿调拨转变为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公平竞争、互相合作关系。工人阶级实现主人翁地位主要表现为以单位集体的方式来进行,并通过各个企业独立的活动,达到整体阶级力量的实现。这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阶级行动的方式有很大区别。

工人阶级以经济核算单位为本位实现阶级力量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工人阶级要提高自身素质,增强阶级意识。工人阶级自身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影响着主人翁地位的实现,而且关系着工人阶级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巩固和历史使命的完成。因此,工人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提高自身的素质。当前最为紧迫的是从阶级整体利益出发,牢固树立主人翁意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也是国家的政治、法律赋予的。不仅如此,从现实讲,

我国国有企业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企业职工创造的,由国家委托给职工占有、使用。企业全体职工这个集体是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受国家委托的经营者的代表,是真正的主人,是第一位的主人。还要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有企业不振兴,成不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会有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因此,工人阶级要敢于以主人翁的姿态承担阶级责任,牢记阶级使命,创造性地投入到改革和发展之中,自觉地、坚决地反对一切不利于国有企业发展的言行。此外,工人阶级要下大力气掌握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不仅能占有资本,还要善于运用、经营资本;不仅要使资本履行自己的使命——增值,还要通过努力,使整个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要善于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用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优势,保持、发展和实现自己阶级的先进性。惟有如此,工人阶级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壮大自身。总之,工人阶级要像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感,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克服自身弱点,把工人阶级自身锻炼成一支真正具有先进阶级理想、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严格纪律的强大阶级队伍。

第二,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是一个庞大系统,是通过一系列的良性机制支撑起来的,如:科学的产权设置,合理的利益机制、奖励机制、创新机制、民主管理机制以及管理者、经营者、操作者相互支持的合作

机制,等等。一个完善和科学的企业制度,将使管理者与工人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共同的目标、合理的利益机制、共同的精神理念为内驱力,以不断创新为特色,在充满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使企业发展壮大。至于如何构建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在实践中,结合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探索、总结、完善和创新。应该强调的是,制度就是关系,不同水平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关系就会不同,制度就会不同。工人阶级的主体素质和企业制度是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较高的主体素质有助于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较成熟的企业制度有利于提高工人阶级的主体素质。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工人这个群体应居于能动的地位。

第三,发挥企业党组织的作用。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公有制企业的工人阶级是党现时期的阶级基础。在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只有在形成自己的政治核心——共产党时,革命才能从自发走向自觉走向成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工人阶级只有在党这个强大的政治核心领导下才能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在国有企业,无论是工人阶级主体素质的提高,还是现代企业制度各种关系的构建,都离不开党组织的作用。当前,企业党组织在积极参与企业管理的同时,要着力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觉悟,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之能够担当起振兴国有企业的重任。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要在企业党组织

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和建设,不断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增强阶级意识,提高主体素质,以企业为单位,脚踏实地,独立地争取自己历史地位的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工人阶级求解放时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呼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仍然是激励工人阶级顽强拼搏、不断进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进军号角。

十、国有资本的二重性

社会主义国有资本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形态的资本力量,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主要结合点,是社会大多数人和资本的结合,是资本的最高形态。国有资本既具有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基本属性,又具有与私有资本相同的求利性、积累性、扩张性。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是资本,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接轨之后,国有资本必须把二者都接受下来,形成国有资本的二重性:资金和资本。这种二重性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化,是推进国

有资本进步的内在动力。

为了透彻地了解国有资本二重性的有关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回过头来看一下历史。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公有资本”的概念,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既根本对立又相互联系、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两种主要形式。从一般意义上说,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国有资本的同义语。

一、国有资本概念的确立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辞典里找不到“资本”这个概念。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计划取代了市场,把现代市场经济视为落后、没落的东西抛弃了,连农村集贸市场这种初级交易方式也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资本是市场的灵魂。没有市场了,资本就没有安身立命之所了。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中,资本便成了资金。资本与资金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资金与资本相比,内容比较单一。资金是货币,而且仅仅是作为价值尺度和产品流动符号的货币。资本则是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从现代意义上说,资本和市场的关系是花和叶的关系,恰似“人面桃花相映红”。市场发展 to 一定阶段,产生了资本,资本的成长壮大进一步促进市场向更高级、更复杂的阶段发展。

我们党历史上对待资本的态度是不同的,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正确地

分析了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为有关正确政策的制定在理论上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又正确地运用有关资本的理论,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有关政策,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与此同时,也有意无意地产生了把资本等同于剥削而加以批判和抵制的情绪。这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因为资本主义生来就是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在阐明资本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在私有制条件下所代表的剥削关系。他指出,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只有当生产资料和货币为资本家占有并作为剥削手段时,才成为资本。资本是通过物来表现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只有从经济理论上说清剩余价值的源泉、形成过程以及分配形式,才能启迪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使工人阶级成为独立自主的阶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剩余价值直接归国家所有,也就自然被认为归全民所有。为了避免产生“剥削”的误解,彻底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使用“资金”概念取代了“资本”概念。这种人为的规定与取代,使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局限于产品的“超额完成计划”,把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同资本运动及其价值增值分离开来,把生产同市场隔离开来,使国有企业缺少必要的资本运动和价值增值的意识,忽视经济规模、成本、利润、亏损等问题,失去资本保值增值的强烈内生动力。这是因为,“资金”是凝固的安静的价值表现,缺少“资本”内在的价

值增值冲动。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发现资本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巨大的自发力量,看到资本是市场经济诸要素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是市场竞争中非常积极、活跃、能动的一种内生变量。“利润”、“劳动力商品”、“剩余价值”等一系列概念,都是从“资本”派生出来的。只要给国有企业以独立的法人地位,和其他各种所有制资本以同等身份竞争,只要肯定市场、竞争、利润等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不能不明确承认和使用“资本”这个概念,并肯定它的地位。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①,定下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用“资本”概念的体制前提。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为各种资本的滋生繁衍开辟了广阔的土壤。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提出“企业法人”的概念,给企业以资本为本位提供了法律依据。1993年的《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按其投资额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表明了企业中的权利与资本是直接相关联的,其权利和资本的关系是成正比的关系,即资本份额越大,权利越大,资本份额越小,权利越小,没有资本就没有权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资本”的概念,要求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就是承认社会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义企业应该是资本的集结,而不是单纯的生产技术组织。这标志着我们党对“资本”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全面理解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

要在理论上透彻分析国有资本的二重性,就必须对资本进行再认识,就要重温马克思关于资本属性的一系列分析。

第一,资本是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工具。从资本的属性来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被资本家所占有,资本家用它来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造成了当时社会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对立。这是它的特定历史属性。而资本的一般属性在于它是带来价值的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在其中增殖、增大。”

第二,资本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资本的历史作用来说,它不仅仅是资本家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它还直接地创造出了银行、信用、股份制等现代经济的具体形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特指资本主义中的资本。马克思在《共产党

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 资本不仅是生产关系，而且也具有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它是一种生产方式。资本的发展进程与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是同步的，是结伴而行的。竞争是资本的主要生存方式，只有生产规模大、生产效率才会高，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竞争才会活跃。马克思指出：“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这就是说，资本管理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是党的十五大接受资本概念的重要根据之一。

第三，资本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这个一般形态的资本，存在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之中。在产业资本领域，它存在于各种不同的部门之中。马克思曾指出：“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之中。”由此可见，资本的存在先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这个范畴，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了统治地位，资本才随之成为社会的轴心，价值增值成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企业经营的目标,资本成了生产发展的根本要素。从概念上说,“资本”不能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马克思还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资本问题,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提出无产阶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①。马克思在150年前就提出了“国家资本”的概念,但是,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如何拥有国有资本,用什么形式具体运作国有资本,这些问题,正是我们今天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今天重新学习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国有资本正处于发育成长阶段

说国有资本正处于发育成长阶段,主要是指国有企业正面临着转换经营机制、实现由国有资金向国有资本飞跃的历史性课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创性事业中,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角度看,它必须形成资本的品格;从人类历史上“资本一般”的各种具体实现形式看,我们正在构造一种特殊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资本。这种特殊的资本应当比其他任何资本都更高、更先进、更有前途。它应当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更富于创造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更能够实现资本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的合理配置,应当具有使用资源更节约、生产效率更高、科学技术更先进、发展速度更快等一系列优势。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一直把国有企业的改革作为重点,就是为了让它形成新的优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重振雄风,再创辉煌。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焦点、难点和关节点都在于:要把竞争性国有企业营造为国有资本的强大力量。为此,需要解决一系列外部条件、内部机制和结构调整等复杂问题。其中,实现和建设国有资本的人格化是关键的一环。

十一、国有资本人格的二重性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以资本作为竞争主体的身份进入市场时,同样必须具有人格模式的规定性。市场主体的本位主义要求国有资本的外部表现应是“经济人”,其人格是自私·自利。国有资本的全民性质规定了它本质上是“资金”,相应的人格是大公无私。国有企业“资本”、“资金”的二重性决定了其人格的二重性。

国有资本人格的二重性来源于集体经济人的二重性。集体经济人的市场表现首先是经济人,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十足的经济人品格,对利益、货币孜孜以求,嗅觉灵敏,充满活力,充满激情,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殚精竭虑。其次,集体经济人又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经济人,它不像真正的经济人那样偏好机会主义、搭便车,它遵章守纪,富有同情心,具有集体主义观念,为了大局的利益,有条件地牺牲本单位、本部门或个人的利益。集体经济人的二重性来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的不同,它是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主要指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我们承认,市场经济发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私有制有着天生的契合关系,双方一见钟情,一拍即合,相互促进,而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之间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从意识形态来说,社会主义要求的是大公无私,而市场经济机制要求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本质要求是自私·自利。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既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实践,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工程。社会主义公有制崇尚的是团结的力量、群众的力量、集体主义的精神,而市场经济机制崇尚的却是个人决策、个人意志、个人利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在基本原则、运行模式、性质特征等方面各自不同的特质,反映到市场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身上,就构成了市场主体——经济人人格的二重性,即集体经济人。

前文已经说到,国有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国有资本人格的二重性。国有资本的二重性是指国有资本既具有资本增值的本能冲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的一般属性,又具有社会主义对全社会利益、对人民利益负责的特殊属性。国有资本人格化后从事国有资本运营的人,自然也应该具有这种二重性的人格,具备这种二重性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做到又红又专,红在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专在市场经济机制所需要的自私·自利,追求利益最大化。

国有资本人格化是一个不能被分割的完整概念。目

前,经济理论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主张国有资本要逐渐从竞争领域退出。这是对国有资本人格二重性的片面理解所产生的某种误解,是对国有资本人格化这一完整概念一定程度的分割。资本的本性之一就是竞争,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都只有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增值才有资格被称为资本。靠行政性的垄断获取垄断利润既有悖于市场原则和资本本性,也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调节机制的发展。退出竞争,国有资本也就不必要称为国有资本了,党的十五大在思想解放上的历史意义几乎被取消干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来是把资本与竞争联系在一起看待的,十分重视竞争在资本增值中的作用。国有资本作为具有增值本能的资本形态,必然要求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领域一展身手,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把国有资本仅仅限制在非竞争性领域,人为地压制、限制其竞争力和增值本能,它就只能获取较低的利润。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既违背资本增值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是对平等竞争市场原则的破坏。所谓平等竞争原则,就是所有资本不论规模大小,不论技术高低,不论姓公姓私,凭大家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凭企业实力、产品质量、服务水准、销售策略来占领市场,赢得消费者,赚取利润。平等竞争原则,既不允许国有资本享有市场规则之外的特权,也不允许国有资本被剥夺参与竞争的权利。从资本运行的三形态上看,资本增值是在生产阶段被创造出来的,然后在流通环节被实现,最后在货币环节被集中起来。产业资本就是不断地在这三个环节中循环,并

形成紧密的联系链条,从而保持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这三个环节给人格化铸就共同的文化特点,又分别注入不同的、具体的心理特点。这三个环节,无论哪一环出现断裂,都会直接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影响资本的增值,也会影响人格化的完整性。国有资本在这三个环节不仅要保持质的主体地位,而且还要有量的比例,这样才能保证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国有资本人格的自利性格是“外生变量”——是通过市场竞争“学”来的,退出竞争等于退学。

国有资本人格的形成过程必须是以阶级为单位进行的历史过程。国有资本的二重性决定,搞好国有企业,不仅要解决好一把手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好广大企业职工思想建设问题。国有资本的人格主体是广大职工群众,企业职工的命运是与企业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集体经济人”人格的形成过程必须是以阶级为单位进行的历史过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法人代表,在搞好国有企业中承担着重大责任,发挥着重要作用。要重视企业领导班子建设,要为企业配备一个好的领导集体。但是,一把手问题解决不了国有企业所有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国有资本经营与私有资本经营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非国有企业,职工与企业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职工仅仅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取消费费用,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是松散的买卖关系。资本家虽然想出许多招数,如日本的企业文化等,企图加强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增强职工的责任感

和积极性,但最终收效都是有限的。我们国有企业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国有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厂长、经理是代表职工来管理这个企业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没有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广大职工群众本来应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富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精神,投身于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然而,由于目前国有企业的困境,由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单一薄弱,国有企业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原则,只要相信广大工人阶级、发挥职工群众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国有企业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国有企业大有前途。

国有资本人格特征决定了国有企业在管理上重视以人为本。国有资本人格的二重性决定了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管理原则和管理经验。国有资本既然与私有资本在人格上具有不同的特性,那么,在资本运营、管理形态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比如“泰罗制”是私有资本的管理制度,它有一些适合于一般资本运营的管理原则,如目标管理、重视制度建设、重视劳动纪律等。列宁也曾指出,苏维埃政权要学习“泰罗制”。但是,“泰罗制”毕竟是私有资本的运营管理方式,它缺少起码的对劳动的尊重,用秒表和计算尺来规范劳动者的手臂动作,把劳动当做机器的附庸,用机器来异化人性等,这些都是国有资本所不能直接接受的。国有资本人格认为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是机器的制造者、支配者,机器与人的劳动是一个

互动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劳动者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国有企业在学习借鉴国外管理经验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国有资本人格的特性,把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同国有资本特殊人格结合起来,搞好“人本”管理,充分重视发挥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

党的十五大之后,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转变的方向已经明确。1998年出现的买方市场,标志着国有企业的市场经济环境已经初步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对内部管理体制的规定性也大致是明确的。诸多条件逐步具备,并把改革推向“人格化”。我们认为,国有资本只有在集体经济人这种人格化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更好地贯彻社会主义经济方针和目标。

十二、一元为主,多元并存

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在前真理阶段都会存在多元状态,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渐成为一元的东西,成为真理。真理必须是一元的。比如,现在对原子核的认识有很多模型:有人理解原子核是一层一层的,像洋葱头似的,这叫壳层模型;有人理解原子核,像滴下来的一滴水,在水滴里介质是均匀的,这叫液滴模型;还有其他种模型。这些模型的推导公式都可以找到局部的根据,但也都有解释不通的地方。这几种模型本质上互相之间是排斥的,



所以是多元的。对原子核内部结构的认识现在还处在前真理阶段。随着探索的深入,终有一天人们可以揭示出哪种模型是对的,或者目前的这几种模型都不对,再出现一种新的正确的模型。那时就一元化了。这个例子说明,对事物认识的前真理阶段会处在某种多元状态中。

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很多领域还处在摸索状态,“摸着石头过河”。江泽民总书记讲,我们争取在下个世纪初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仍然处于建设时期,处于前真理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不得不允许多种多样的运行方式并驾齐驱地竞争和探索。这也是一种前真理阶段。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中存在着某种多元现象的原因之一。“摸论”、“猫论”、“两论起家”,这些开玩笑的话,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当前阶段的某些特点。今天的很多事实未必是将来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必然现象,它处在前真理阶段,有多元的特点,有过渡性。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作为领导干部,在“三讲”中要真正贯彻落实江总书记关于“讲政治”的指示精神,首先必须澄清其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理解深、把握准并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关系,是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基础。首先,需要弄清楚“元”的概念。元是什么意思呢?词典对“元”有几种解释:一是万物起源,一是基本要素,一是事物的系统性。这几种解释大体上可以用逻辑的方法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搞政治的人,

首先要对事物进行元的分析,清楚地分辨对象所属的体系。它与什么是一个体系,与什么不是一个体系;在力量上,在利益上,或者在意识形态上各是什么体系。元的分析是性质的分析。

我们党现在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针中,使用的是“种”的概念。如果用哲学上“元”的概念来分析,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以一元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并存和以一元为主体的多元分配方式。“元”这个概念太抽象、太书卷气,所以中央没有使用。“元”反映矛盾的性质,而“种”有时候不能完全地反映事物本质的区别。比如,多种所有制在整个社会里可以组织起来,但在具体领域里是融合不了的。“元”还反映事物之间体系性的联系,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分析。比如,一元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元为主导、多元并存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状况。就是多元存在,一元领导。本质的东西必须是一元的,作为领导的那部分事物必须是一元的,基本理论必须是一元的。目前社会的这种多元状态,要求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必须学会用“元”这个概念来分析问题。

这里涉及到 1989 年前后理论界一直有争论的一个问题。自由化分子强调实行多元化,我们反对多元化。自由化分子关注和强调的是“化”,不是“多元”。“化”不是描述性的,而是导向性的。“多元化”中的元和元之间是一种谁也不领导谁的平起平坐状态。我们现在提倡个



体的、私营的、外资的、国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所有制形式上就是多元的。多元的经济成分在股份制企业中不是融合了,而是暂时的和平共处而已。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都是在强调元和元之间根本的利益区别,不可能融合。“多元化”和我们党的政策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体制是一元为主体的多元并存,即多元存在,一元领导,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状态。这和多元化是根本不同的。这也和“左”的、“文革”前的或“文革”中的一些早期的计划经济区别开来了,那时的计划经济是一元存在,一元领导,是一种僵化保守、缺少生机的状态。我们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回到那种状态了。

多元并存的好处比较多,可以构成竞争状态,可以提供多种选择,可以适应多种条件的客观情况。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生活比过去丰富多了、方便多了、灵活多了、提高多了。新的生活需求一旦出现,很快就会有新的生产力自动地迎上来满足这种需求。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美国那么富裕,但在现有的经济水平下,拿群众和群众比,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生活的满足程度和美国差得不太多。这是我的很多在美国留学的同学讲的。他们说,我们的东西不一定那么好,但是差不多都有,想买什么都能买到。这种活力和动力来自多元存在,来自多元之间的矛盾运动。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贡献。

实现多元存在情况下的一元领导,比实现一元存在情况下的一元领导要吃力得多。比如,现在占道经营者很多,妨碍交通,影响卫生。“三优杯”检查时被赶跑了,

检查后,又跑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个体的“元”同政府的“元”不是一回事。这就是多元存在造成的问题。“文革”时一元存在,一元领导,个体商贩被看做“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街头根本就不允许摆摊,检查卫生特别方便。但同时经济发展也单调了。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没有必要实行一元领导,建议“无为而治”。有些地方确实可以多元存在无为而治,但有些地方必须一元存在。在元与元竞争剧烈的多元存在处必须由一元领导。

本质的东西必须是一元存在。从某种角度讲,一个事物只能有一种本质。社会制度是本质性的,所以必须是一元的。作为领导的那部分事物必须是一元的。如政府,负有操作性的领导责任,必须是一元的。再如,人的大脑、中枢神经负有对全身的“领导责任”,必须是“一元”的。如果大脑“二元化”了,势必导致精神分裂症。基本理论必须是一元的。要想成为理论方面的大家、集大成者,必须在某种理论领域达到一元化。西方的理论是多元的,那是指群体。但就个体而言,每一种理论都是一元的。弗洛伊德是拿“潜意识”(“性”)作为其理论一元的基本概念、基本要素;萨特用“个人自由”作为其理论一元的基本概念;杜威、詹姆士以“实用”作为其理论一元的基本概念;尼采则是用“超人”、“强权”作为其理论一元的基本概念。总之,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有一个基本要素,形成一个基本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不能出现第二元、第三元的东西,否则就无法自圆其说。这就是理论建设的内和谐性,俗话叫“圈划圆了”。如果在以上三个领域实行多

元化,必然会出现思想混乱、社会动荡、政治无序、国家解体,如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致。但这种“多元化”只能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状态,必然很快进入新的一元化状态,只有一元化才是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亦如此。

在改革中,只要我们还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还想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秩序,还需要我们的理论体系保持内和谐性,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一元化。这就要求我们党和党的干部队伍,在思想上要一致,要一元化。

多元并存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处在高速发展状态,使得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当然,多元存在也使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多元存在培养竞争性、创造性,也培养适应性。

高等学校建设也有“一元领导,多元并存”的问题。在高校的学术领域,没有一个宽松的、相对多元存在的氛围,发展、提高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社会科学方面(自然科学的理科领域也有元的问题,但是不太显著,自然科学中经常碰到的是方法问题)。在综合性大学里,必须在一定领域里允许多元存在。不要说别的地方,起码在图书馆里,就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奴隶制的东西。这是静态的多元存在,而且是非常精美、非常深刻的多元存在。某些人的思想领域也是多元存在。这是动态的多元存在。我们默许这种存在,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在某些理论领域、思想领域增加一点碰撞,增加一点矛盾运动,增加一点创造性。这是我们默许多元存在的一个

道理。在静态的多元上必然会生长出动态的多元来。现在社会经济的多元存在必然反映为高校理论形态的多元。

我们允许多元存在,正视多元存在,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并有效解决“一元领导”的问题。

首先,是对性质进行区别。凡是本质性的东西,都有用“元”进行分析的必要。凡是带有性质区别的问题,不是“种”和“类”的区别,必须用“元”的概念进行分析。进行“元”的分析容易系统化,容易抓住本质。

其次,要把自己头脑里的这一“元”搞彻底。“元”概念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体系性,而体系性的必然要求是彻底性,就是要从头到尾,从现象到本质。比如社会主义。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的这个道理在自己的信仰中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程度。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也好,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也好,有很大的过渡性。过渡性是一种不彻底性,是一种灵活性,是一种允许多元混合、多元并存的灵活性。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一般党员干部接受这种过渡形态是可以的,但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担负着一元领导多元的任务,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此,而必须将此发展到共产主义的水平,这样才能把某些问题认识透,才能使自己真正坚定地站在今天的领导岗位上,解释、解决今天的很多矛盾。一元领导多元的坚定性,来自一元的彻底性。比如领导同志,生活上可

能要穷一点,受的个人约束会多一点,这些东西要靠局部的价值观的解释总有解释不了的时候,只有具有共产主义意识,才能较长远地解决这些问题。又比如,我们还允许各种思想意识局部地、暂时地共存,领导这些意识需要有比较彻底的共产主义意识,共产主义的理论。多元包围中的一元,既可能成长为比较坚强的一元,也可能被“和平演变”。

党的自身建设要一元化,干部的自身修养要一元化,要站在一元的坐标上理解多元存在的社会条件。没有这些一元化,很难抵御各种不健康思想的侵蚀。如果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看成为三个层次的逻辑结构,那么,世界观属于本质的层次,具有最抽象、最普遍、最深刻的特点;价值观属于现象层次,最接近表面,最具有实践特点,最接近现实行为;人生观属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过渡层次。凡是本质的东西都是一元的,都必须解决一元化的问题。因而,它也是远离具体行为的。价值观层次因为接近行为,所以允许一定程度的多元性、灵活性。国有资本人格结构中的世界观应该是与共产主义、与工人阶级和公有制相联系;人生观是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相联系;其中的价值观层次是集体经济人的模式。现象比本质更丰富多彩,更复杂多元,更有个性和更具有矛盾性。

我们还要帮助多种经济形式发展。在一些同志的家庭、亲属成员中就可能有一元出现,形成“一家两制”模式:一个人在公有制的事业单位或机关工作,取得劳保、住房和权力;另一个人“下海”,搞私营,或个体,或“三

资”，赚大钱，这样有权有钱，两全其美。这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是过渡阶段。“一家两制”、“一国两制”的优点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给我们做党的工作带来了新课题。我们是否有本事领导这些多元呢？凡是处在不同“元”的经济所有制里的人，时间长了，可以看到他们的思想意识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差别，不管他们原来多么一致，要对市场经济实现党的政治领导，要讲政治，重点和难点都在一元和多元辩证统一的问题上。搞得很纯，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必然导致僵化，我们无法适应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无法适应当今的探索阶段；放任自流，把多元状态放任到没有领导、没有方向的程度，必然导致一片混乱。对大学生和对大学教师的要求有所不同。我们对大学生必须有一元化的要求，这在其他领域是不突出的问题。高校应该把大学生当成接班人来培养。我们现在的教育方针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建设者”，一个是“接班人”。“接班人”是一元化的概念，“建设者”是一个允许多元存在的概念。“建设者”允许有剥削。“三资”企业的资本家也是建设者，但不是我们的接班人。在我国的高等院校里，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更要强调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领导同志头脑一定要清醒，因为大学同上层建筑、同领导机关的联系十分密切。郑州大学历届毕业的学生有3000人在河南省省委、省政府工作（约占干部总数的40%），河南大学毕业生在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数量仅次于郑州大学。今后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会有更多的人是综合性大学培养出来的，

不用一元的共产主义意识去教育他们,我们国家的性质能保证吗?省委、省政府机关这 6700 人就决定着全省 9000 万人的社会方向、社会意识,它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的分子、原子是我们大学教师培养出来的。我们允许在高校的理论领域存在某种程度的多元状态,是为了增加理论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有道理的。但决不能把这种多元状态变成学生的思想状态,决不能影响学校讲台的导向。在这个领域,“兼容并包”又是绝对不行的。如果我们完全不给学生介绍一些多元的东西,如西方的经济学,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学生就没有免疫力,就会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但是,如果不用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在讲台上对那些多元的东西进行分析、批评和本质上的否定,我们就不可能领导这种多元状态,不可能培养出“接班人”。

第三章

提高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水平

十三、党要学会驾驭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头脑清醒、胸怀宽广、勇敢顽强、勇于斗争、善于建设的党。为了发展中国经济,为了富民强国,共产党清醒地主动地请来了自己的对立面,请来了与自己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矛盾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市场竞争的格局。这说明共产党自信自己居于高于市场经济的位置,有能力、有信心驾驭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经济机制是指向资本主义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与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多数是对立的,所以,共产党不能让市场经济的原则任意发展、扩张。否则,就会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共产党要学会驾驭市场经济。这里,着重研究一下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方法问题。

任何事物要保持自己的性质,都有一些必须固守的

客观边界条件。一个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就是这个国家的客观边界条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必须固守的。别的国家侵入了,占据了,你夺不回来,就国将不国了。一个政党也是这样,党的客观边界条件是党的宗旨、奋斗目标和原则立场,这就像一个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必须固守的。如果共产党退出了这些客观的边界条件,即使反复整风、搞“三讲”,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党只有固守这些边界条件,有了这些客观基础,再加上一些主观方法,才能解决共生中的“免疫力”问题。中苏论战时,中国搞了个“九评”,当时,毛主席有一个判断:只要中央不出修正主义,党就不会出修正主义,中国就不会改变颜色。这是实行计划经济时作出的判断,当时的中央有主体性和主动权,地方、基层缺少主体性和主动权。缺少主体性和主动权也就缺少自发性。这个判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改变,因为现在地方、基层经济基础的主动性甚至超过了中央,与之相应的是,地方、基层的主体性也超过了中央。这次全党自上而下进行“三讲”教育,效果究竟如何,实践将作出最后的检验。这是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的一次重大考验。

我们先从基层、从经济基础说起。

就经济基础而言,《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的指导方针中指出,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

争和共同发展”。就是说,不管怎样竞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保证,公有制在比例上要大于私有制,在经济总量中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这里的私有制是指私营企业,不包括个体。广义的私有制是包括个体的。为什么不包括个体呢?列宁说过,小生产是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是资本主义的后备军。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把这种小生产搞得几乎绝迹,就和这个指导思想有关。但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我们发现,个体经济并不完全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主义。在低潮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它还有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一面;而在高潮的时候,赚钱容易的时候,它又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小生产也曾经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因为个体经济有两面性,所以把它排除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比例之外。不同生产关系下的人数是“比例”的重要内容。我们并不仅指经济实力。共产党要巩固领导地位、执政地位,就要有基础,这个基础,最重要的是人。共产党是代表多数人掌权。如果多数人的阶级状况处在被雇佣状态,我们党执政的雄厚阶级基础就没有了。多少人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多少人在那种生产关系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经济实力占多数,具有控制力。从市场竞争力来说,公与私的比例不仅仅是指静态的人数,而且是指公有制企业不能简单地退出市场竞争领域,退出竞争会变成“傻子”、“呆子”、“阿斗”。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显示自己的实力。你退出竞争,退出这个领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就成了“傻子”、“呆子”、“阿斗”。西方的国有



企业没有什么阶级性、自主性问题,培养出来的工人阶级没有主体性。独立的主体性非常重要,必须靠竞争才能培养出来。竞争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机制。我们借鉴资本主义,在共生的地方锻炼工人阶级,用的就是这一招。退出竞争,就是扔掉这一招。现在,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表现非常让人着急,但不能躲避,需要硬着头皮顶着干。局部退出一两个不要紧,总体上不能退出来。只要公有制企业退出市场经济,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存在了。我们要的不是“抱大的孩子”,我们要的是“练大的孩子”。

就上层建筑而言,我们要的是稳定,是一元化。这个领域不能搞市场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建立这种竞争的体制,决不是在思想领域、上层建筑领域搞市场化。我们一定要区别市场化和商品化这两个概念。教育、卫生、文化、民主法制这四个领域可以有局部的商品化,但不能搞市场化。否则,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就会把整个社会推向资本主义。因为这四个领域是整个社会生产大循环的重要环节:教育是培养人的,是思想和知识的再生产;卫生是劳动力、身体健康的再生产;文化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再生产;民主法制是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再生产机制。这四个领域如果推向市场化,靠竞争、靠本位利益来解决问题,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整个社会生产的大循环,必然被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引向资本主义。我们就是靠这四个环节还没有全部市场化来掌握着逆调节。比如教育,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有少数人

先富起来,没关系,这辈子你先富了,可能下一代轮着我富了。我让孩子读名牌大学,本事大了就可能富起来。这就使阶级不固定,先富和后富的人不固化为阶级。如果他们这一代人富下一代人还富,一直富下去,积累的资产使其后代总是处于富人的地位,阶层就固化为阶级了。西方的高等教育在培养劳动者和培养接班人上是分开的。名牌大学如哈佛、耶鲁,是培养资产阶级执政党接班人的大学,都是私立的,收费较高,一年上万美金的学费,先用市场化手段把穷人整体地切下来,挡在了这种学校门外,然后才是考试。我们的大学收费一年两三千元人民币,但培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一年需要1万元,4/5的费用是国家支付的。如果全部费用由个人承担,相当一部分穷人的子女即使考上大学也上不起大学,或者说上不起名牌大学。只要阶级不固化,党就能在教育领域对市场的嫌贫爱富性格起逆调节作用。卫生也是这样,如全部市场化,就会因为医药费、保健费的昂贵,致使一部分劳动者的身体状态处于再生产的弱势,永远被排除在富裕和强者的大门之外。少数的私立医院、贵族学校也许暂时局部是可以存在的,但普遍化不行。这和资本主义的所谓福利国家是两回事。他们的福利国家搞得再好,资本主义在这些领域总要留出一块完全市场化,尤其是和统治阶级地位相关的那部分领域,它靠市场经济倾向于强者的机制,把阶级统治固定化。这就是他们同构的道理和我们不同构的道理。

1998年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占社会的比重是53%,美

国是 90%，日本、德国是 80%。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比我们要高得多，但仍然要留百分之几或者百分之十几的领域搞非市场化，由国家直接掌握。我们之所以留得多，就是不能让市场化全部掌握社会再生产的大循环，避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发地引向资本主义。这就要求在非市场化领域，人格特征不能是经济人，不能自私，要培养雷锋、焦裕禄。美国在百分之几的非市场化领域也提倡雷锋精神，西点军校里挂有雷锋的照片。军队要打仗，要献身，要有雷锋精神。但出了西点军校，他们就不提倡、不鼓励雷锋精神了。市场领域越大，培养“雷锋”、“焦裕禄”的困难就越大。这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难题。

就劳动力而言，不能搞完全的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惟一留下的缺口。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后，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资本流通是不是市场化。十五大报告承认了国有资本的概念，提出了资本运行的概念。从理论上讲，十五大最本质的突破在这里。但是，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是个大难题，劳动力需要在市场里流动，但是，需要不需要完全市场化，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如何把握，这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还能否成为一个主体阶级的问题。工人被私营企业主雇佣时，就很少再可能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了。因为他是被雇佣的，精神状态是受压抑的，思想方法是自私的、个体的，和私营企业主之间的关系是买卖交易关系。工人阶级只有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在非雇

佣状态下,才有可能成为执政的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才有可能培养出执政意识。所以,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可以闹革命,可以夺取政权,但不会自发地产生支持共产党执政的思想。西方有西方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民主社会主义,其产生的最大根源就在这里。

劳动力市场化问题的关键是知识分子和管理干部的市场化。如果知识分子和管理干部市场化了,党要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阶级在市场经济中参与竞争、组织运行时,必须依靠管理干部和知识分子完成管理与技术的竞争。如果这两部分人的主体没有市场化,前面的两个条件——公与私所有制的比例、非市场化领域的稳定才有保证。建设一支稳定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是一个重要的边界条件,也是搞好党建的边界条件。研究市场经济对共产党建设的影响问题,起码这三条是关键,这些边界决不能再退了。如果要从这些边界后退了,事态发展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漩涡,内部正反馈的机制就会自动地放大资本主义范畴,自发地缩小社会主义直到消灭。这些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这些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才能存在。

我们再来研究主观方法问题。第一个主观方法是要靠内因。我们党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党,只有靠内因,才能克服自身的缺点。我们党经历了长时间的建设过

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宽广的共产主义胸怀,坚持只有解放全人类后才最终解放我们自己,比世界上任何党都先进得多。我们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人民群众是本,我们是末,人民群众整体上比我们更有水平。只有人民群众有资格来帮助我们,其他政党不具备这种资格。在党内,内因有个人和组织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信仰,个人的内在动力就是信仰,就是有共产主义信仰。如果说动力机制,这是最大的动力机制。共产党员也需要有第二种机制,如市场经济机制,挣钱、分房子、提工资、干部提拔、职称晋升等,这些都是动力机制。这些机制必须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第一位的必须是共产主义信仰,否则,其他的动力就统一不起来。共产主义是我们最大的内因、最大的动力。内因的第二个方面是组织力,靠组织生活,靠谈话、谈心,靠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

如果我们不能依靠内因来建设好党,我们党不能高于市场经济、驾驭市场经济、领导市场经济的话,就只有面临被革命的危险。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就是渐进,渐进就是改良,渐进的改良好。这20年,没有什么大的破坏,中国也富裕了。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搞1949年的革命,死了那么多人,造成那么大的破坏。”这些说法是不对的。改良和革命的区别在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没有能力推进矛盾的发展。当时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成为矛盾发展的障碍,已经阻碍历史的前进,发生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自己解决、有能力自己解决的,就可以用甚至是最好用改良的方法、渐进的方法;否则,只能多花些代价、多死些人、多流些血来革命。改良和革命的关键区别就在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能否推动历史前进。这个历史命题,今天已经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党也可能照着现在的路子走下去,现在还没有崩溃的危机,但解决不好自身的问题,被革命也将成为必然。所以,从主观方法来讲,就是要重视并且搞好“三讲”教育等形式的思想教育,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我们党内部存在的问题。

现在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减弱,“好人主义”上升。因此控制不住腐败的蔓延。有好心人转而乞灵于西方两党(多党)制。应该承认两党相互竞争监督有自发的严格性。但前提必须把立党为公改成立党为私,每个党出于自私,监督对方自然严格,所谓“狗咬狗是真咬”。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党制同市场经济是契合的。我们怎样在市场经济的外环境中保持立党为公的内环境,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水平与强度能够超过资产阶级政党的“狗咬狗”机制,怎样防止一党制容易产生的“自我麻醉”机制(自我感觉良好=掩盖矛盾=自欺欺人),这是重要的党建课题。

第二个主观方法是要用阶级分析方法和用“主义”的概念来认识市场经济,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来分析区别具体政策和党的宗旨,区别个人生活和社会责任。列宁说过,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主持的。在市

市场经济多元混合概念中,作为一个执政党,丢掉阶级概念,放弃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自我解除思想武装的逻辑起点,理论上就没有了主体和主导概念,共产党就会失去作为工人阶级政治代表的先进性,很可能会滑向社会民主党。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容易滋长模糊阶级意识,淡化阶级分析方法。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切不可模糊阶级意识,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今天的一项具体政策是要帮助私营企业大力发展。有些地方经常派 1/2 的干部去招商,招的都是资本主义企业,这是对的。但一定要明白:作为党员,我们在思想上要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我们把它招来是为了加快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区别个人生活和社会责任的界限同样重要。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也要按照自利的原则买卖东西。但在党的岗位、干部的岗位上,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就是二重性。党要用“阶级”、“主义”的概念和方法分析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身建设的二重性问题,分析解决党员成长的二重性问题。

第三个主观方法是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防止片面性。邓小平理论最突出、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两”字特别多:“一国两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二元并存,是一元为主的二元并存。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有其历史规定性,决不能片面理解。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性质的道德

规范必须占主导地位。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若干不同性质的道德规范,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也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性质的道德。只不过这一社会同时存在的道德规范和另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的道德规范,在内容和形式上不同罢了。要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性质道德规范的对立、统一及其内涵变迁,首先必须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的主要特征及道德关系的主要特征。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论上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虽已初步确立,但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虽然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且在资源配置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的市场配置为主的原则,也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虽然成为社会的主要分配制度,但同时仍然存在着其他性质的分配方式,并且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一些剥削现象和食利现象;地主、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还有少数残余存在,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这种不成熟性、不完全性和复杂性,反映在道德上,就呈现出各种道德规范的并存性、对立性和斗争性。即存在着以工人阶

级的道德规范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封建地主阶级道德规范、资产阶级道德规范、小生产者道德规范的并存、对立和斗争。这四种不同性质的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从来不是并列的,而是表现为一种高低主从关系。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规律和客观要求的,是自始至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对社会各领域、各个成员起根本导向作用的道德规范。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或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进来的。它们与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起着消极腐蚀、涣散斗志的作用。所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必须同这些腐朽的道德规范作斗争,并在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内涵。同时,对小生产者道德规范也要进行分析批判,努力把它引向社会主义方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思想意识必须升华为道德意识。比如,必须把物质贪欲冲动升华为一种社会责任感、社会成就感和敬业精神。只有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高尚的动机,才能真正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搞上去。必须把流通致富意识升华为一种工业精神和实业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如果只鼓励流通致富,不注重培育工业精神和实业精神,长此以往就会严重影响基础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必须把竞争求利意识上升为一种经济正义精神。在竞争求利心理支配下自利会产生大量经济自私行为,如逃税漏税、走私、黑

市交易、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粗制滥造、以次充好、冒牌造假、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等等。经济正义要求人们认识到:不合理的东西不可能真正符合大多数人的权益,而违背大多数人的权益的东西也不可能是真正合理的。经济正义提升着经济活动的目的,经济赢利原则必须不损及人类的合法权益,有效的经济行为本身就具有伦理性。不正义即使赢利也不能去做,因为不正义一定会损害人类的合法权益,损害人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发展目标。我们还应认识到,经济非正义只想多分割经济总量,只想多占别人的经济利益,不想依靠科技投入、提高生产率、提高经营效率来创造经济效益,就根本不能提高国家经济的总效率,不可能扩大国家经济的总收益,也不可能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升华为一种追求生活价值的超越精神。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贫穷是一种挑战,它问询一个民族能否面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面对财富,也是一种挑战,它问询一个民族能否不沉湎于感性享受,不沉湎于物质财富,进而升华出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随着财富相对增多,随着获得财富手段的相对增强,我们必须警惕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泛滥。必须升华出一种超越感性、超越享乐的真实精神追求。马克思早就说过:饮食男女诚然也是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与人类其他活动割裂开来,并使他们成为最后的惟一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他们就只有动物的性质。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把人类的需求依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分为五个层次:最低



的是食与性的生理需求,依此向上为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表现实现需求。越上升,需求的精神成分越多。一个民族的需求层次越高,这个民族就越具有创造性,越有前途。我们只有走出“消费就是美德”、“享乐就是价值”、“金钱就是万能”的误区,树立起“节俭才是美德”、“人生应有所追求”、“金钱买不到尊严”的新意识,才能使我们的民族在市场经济中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主观方法不胜枚举。解决党的建设问题最终必须依靠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队伍这个整体。亲身经历并参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创造性事业,是值得我们非常自豪的事情。我们的前人没有遇到过我们现在面临的如此复杂的局面和如此重大的课题,也没有能够像我们这样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环境。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可以处理好共产主义理想和市场原则这个二重性问题的。我们有信心通过“三讲”教育和其他党建方法,经过不懈努力,把我们党建设好,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市场经济的领导者、驾驭者,并创造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十四、国有企业在市场中要强化 集体主义的自利观念

国有企业在市场中不仅要谋求自利,而且要强化自

利的观念。自利不等于自私。传统的语言用法,自私自利往往被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生活中有必要将二者加以区别。自私是以个人为本位、以排他为特点谋求利益的行为或思想,往往涉及道德伦理领域。它现在正被某些人称为人的本性而加以宣扬,并作为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它必然要追求利益,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追求利益,这不一定必须是自私,而应该是自利。自利是可以以集体为本位的更接近价值观层面的行为方式,它不以排他为前提,并且可以和利他相容,形成互利(可以双赢)。自利可以有条件地与共产主义相容。相对于国际主义来说,爱国主义就含有自利的因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先是国际主义,然后是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抽象地否定自利。自私是私有制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自利既有社会学根源,又有生物学根源。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竞争会推动自利成为自私。正是在这一点上,很多资产阶级学者混淆二者的区别,认为自私是人的生物学本性,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推论资本主义的永恒。在计划经济体制里,缺少使自利成为自私的推动力,但容易产生忽视自利的倾向。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这种推动力与竞争强度成正比。即使是国有企业也会在这种推动力下产生自私。从理论上讲,国有资本应该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提供一种自利而不自私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就是重视自利原则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反对自

私,认同自利。自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不同利益主体能够共同存在和发展的哲学伦理基础之一。肯定自利原则,可以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谋求自己利益确立理论的依据。

国有企业在市场中也要自私,从集体本位利益出发的自利,是由国有资本的性质决定的。资本的本质是自私的,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本实现增值的载体,应该具有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对政府来讲,国有企业也应该有独立的本位意识,应该有“自利”的成分,要在照章纳税的基础上,依法保护本企业的利益。

几百年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老祖宗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经济中所有人都自私的假设。这个假设一直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所有的人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有的人都是聪明的、理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才会自然而然地运行起来,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客观效果是使整个社会得到繁荣。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西方学者兢兢业业、日日夜夜地研究这门学问,由此产生了许多许多的西方经济学派。西方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直按照这一假设在运转,没有人来推翻这个假设。按照这种假设,经济人为了取得利润,就得竞争,所有人的竞争加在一起,就形成市场的繁荣、经济的发展。这个假设的前提是经济人的自私。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提倡的是学雷锋,是精神文明。如果每个人都成为活雷锋,市场经济就没法搞。为什么呢?因为雷锋不

自私,不竞争,你要他就给你,你不要他也会给你,他会白送给你,因为他大公无私,助人为乐,他经常想的就是如何帮助别人,经常干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决不会在利益上和别人进行竞争。如果所有的人都成为活雷锋,就没有利益竞争了。没有人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就没有市场经济了。雷锋精神和亚当·斯密的假设正好相反,它否定了市场经济后边的全部公式。只有自私才能搞市场经济,只有自私才能把账算得很细,才能用最小的成本赚取最大的利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经济人的问题。国有企业听国家的,以社会利益为自己的最大利益,服从国家调度,但是没有企业本位利益,没有一点竞争意识,就形成不了市场经济。因此,必须让国有企业变成一个个有自己本位利益的集体,从利益上把它分成一个个的单位,让本单位的利益成为本企业的动力,我们暂时把它称为“集体经济人”。让单位自身的利益成为激励的动力,约束的机制,让国有企业以有自身利益的单位去参加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亏了是本单位自己的事,赚了也是本单位自己的事,这在经济改革上叫“主体法人化”,叫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作为一个法人,有自己的权利,有自己的利益,靠自己的本事为自己赚钱,靠自己的权利把自己的利益拿到手。这实际上是一种自发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微观机制。国有企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这个问

题解决不了,国有企业就无法进入市场,或者说,国有企业就不具备到市场上进行竞争的资格和条件。要让国有企业到市场上参加竞争,就必须承认国有企业的本位利益。这个本位对外具有经济人的性格,它是以企业为单位的自利。这种以自身利益为动力的机制是一种自发机制。凡是利益都具有一定的自发性。

我们过去是计划经济,不大注重自发性。那时企业所具有的本位自利性都被取消了。统一计算利润,统一发工资,不赚钱也得发工资。“大锅饭”不可能出现本位自利,不可能出现自发性。现在搞市场经济,情况完全不同了。“大锅饭”取消了,国家不给你统一发工资了,企业本位化了,得为自己赚钱,赚得多就可以多发,赚得少就只能少发,不赚钱就只好不发,这样一来,自发性就出现了。国有企业变成有本位利益的单位了,成了自利的单位了。这就产生了一种微观的动力机制。作为有本位自利的独立法人单位,得拼命去赚钱,拼命去竞争。自发性这个微观的动力机制是很有用的。我们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整天睡不着觉,为本单位的利益最大化而兢兢业业,殚精竭虑,这确实是市场经济发挥的巨大作用。但即便这样,我们国有企业领导的自发性和私营企业的老板比,还是相差甚远。在全国和省人大、政协会上,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私营老板会议期间四处活动,跟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领导照相、拉关系。可我们国有企业的领导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会议时总是老老实实地开会,很少像私营企业的老板那么活跃,这说明自发性还不够

强。严格地讲,就是我们国有企业的自发性不是真正的经济人的自发性。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具有两重性,不是地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比如讲某一位国营企业的领导,某个总经理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他首先要入党,入党的过程是什么?是让他无私,让他学雷锋。他如果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起码是半个雷锋的水平,他很难当上国有大企业这么个级别的老总。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个人的身上,肯定有无产阶级、有共产主义这样的思想,他不是一个人道的个人主义者。但党和国家又把他放到了企业老总这个职位上,让他代表数千或数万职工履行一个经济人的职责,去当一个集体自利的代表,那好吧,市场经济就把他逼出了这一套本事。他的前一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所应具有的政治素质,对他的要求是大公无私,后一部分是市场经济中经济人所应具有的本能,对他的要求是自利。这就是他身上的两重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他的人格是两重的。而私营企业的老板,从伦理上说他的人格是一重的。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作为个人是自私的,作为企业的老板,也是自私的。他也可能会捐献一点什么,但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广告宣传,是为了宣传他的企业和产品。这也是企业利益起的作用,挣名也是资产,是无形资产,他绝不会白捐的。所以,这个私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间就非常适应,就如鱼得水。我们一搞市场经济,这种人顺顺当当进入市场就会赚钱,就发起来了。

国有企业之所以这么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私

营企业的老板的自发性是内生变量,而国有企业法人代表自发性是外生变量。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是经济学概念。与生俱来、天生就有的叫内生变量,外边加进去的叫外生变量。某国有企业的一个老总曾经向我抱怨过,说干到55岁就不干了,这活累得不行,一天只能睡4个小时,一天到晚很少有时间能够让自己自由地支配。我给他总结说:你是无产阶级,你的时间也是无产阶级的。所以,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出现了很多问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求每个主体都有自发性,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国有企业来说,这个动机的因素是外生的、二重的。形象地讲,就是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本质上是雷锋的无产阶级、大公无私,形式上却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要自利,要当资本家。这有点像南街村的外圆内方。外圆,我们理解为市场经济,要跟别人接轨。内方,我们理解为社会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是改革开放给国有企业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再大、再难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因为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要拿到资本主义的好处。经济学特别讲究实证。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就是最大的实证。20年了,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还没有学会自利。平顶山煤炭集团的54所学校,本来应该由社会、由政府负担的,但至今平煤集团还甩不掉。如果这个企业自私早就不干了,因为企业缴过税了,税中已经包括了教育这一部分,凭什么还要



背这个包袱呢？就是因为它有雷锋精神，有大公无私精神，还坚持为政府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这是二重性中的第一重性。第二重性也很明确，干不好就发不出工资，干不好就得破产，平煤集团必须为本企业谋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作出了巨大的无私奉献。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形成，国有企业该得到回报。起码不应该再让国有企业继续奉献了，否则，真的要把国有企业拖垮了。与此同时，对私营企业实行减税、免税政策。这即是超国民待遇，是负担超轻的国民待遇。当然，这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是无可非议的。而国有企业不但要缴税，而且要承担社会负担。这也是一种超国民待遇，是负担超重的国民待遇。实行这一政策，意味着国有企业要多承担一些负担。同样生产一种东西，同样的投入，同样的产出，同样的成本，同样的利润，缴同样的税是合理合法的。私营企业的税被减了、免了，国有企业就得多缴一部分，把本来应该由私营企业缴的税补上去。这就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负担。比如，用国有企业缴的税搞公共建设，修公路、办学校、建图书馆等。私营企业的车也要在路上跑，私营企业主的孩子也要上学、看书。除高速公路有排他性措施外，多数公路都是政府投资修建的，是用国有企业缴的税修建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一般地说，这部分投资占整个固定投资的30%左右，我国高于这个比例，占40%以上。应该说，私营企业没有承担这部分投资，发展要快得多。这是一种转移支付，即从一种所有制转移到另一种



所有制。

另外,国有企业还承担了一部分改革成本。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每年花费 1 亿多元承担政府职能,包括办的学校、医院等公益性事业。当然,这 1 亿多元有六七千万元由政府承担后,它每年还有三四千万元的支出。一家企业每年承担六七千万元的政府负担,太沉重了!上面讲的平煤集团的 54 所学校也是这种性质。私有企业或者个体户不是直接享受,是相对享受,这叫“转移支付”;国有企业替政府支付着这些钱,等于加重了自己的负担,减掉了私营企业或者个体户应该承担而没有承担的这部分负担,这叫“改革成本”。20 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为新生的资本主义企业承担了相当重的社会负担,也为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无私奉献,“三资”企业享受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减免税优惠政策。

国有企业已经用自己的乳汁把私有企业养大了,私有企业现在应该和国有企业一样承担社会义务,一样缴纳税赋。1998 年,我国的国有、集体所有、私有(个体经济,有雇佣关系的私营经济,港、澳、台来中国大陆投资的资本主义经济,外国及海外华人来中国大陆投资的资本主义经济)三部分,大体是三分天下,各占其一。1997 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共占 69%,加上混合经济成分中公有部分的 7%,公有经济占到 76%,私有经济只占 24%。可仅仅一年,就各占 1/3 了。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国有的、集体的比重还要下降,私有的

还要上升。“一五”期间上马的 156 个工业项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上要孝敬“父母”，下要抚养“弟妹”，尽了孝心和爱心。国有资本如果能够在竞争中复壮，一定还会以某种形式帮助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在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共产党通过执政手段不断自觉地调整几种经济成分的比例，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或称之为重要的执政能力。认识几种经济成分相互促进的作用与认识它们相互矛盾的作用同样重要，是同一个命题。那种认为一部分地区可以完全私营化与过去认为公有制最好是 100%，恐怕是两个极端一种思路，都有机械论、形而上学的烙印。

十五、公有制企业劳动力 不完全归个人所有

劳动力完全地归个人所有，纯粹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最终必然走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试分析一下，所有的人都承认，劳动力是有差别的，有的智力高，有的智力低，有的身体强壮，有的身体弱小。如果劳动力完全归个人所有，如果搞纯粹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智力高、身体强的劳动力肯定得到的就多，智力低、身体弱的劳动力肯定得到的就少。得到劳动报酬多的劳动力，必然产生消费不完的那部分剩余，这部分剩余的积累，就会形成资本。如果这部分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提高



劳动生产率,提高剩余价值率,扩大了生产规模,则必然会雇佣其他劳动,雇佣无法积累的劳动,因此产生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与对立。到这一步,这部分资本就要要求分配权。完全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是两极相通的。两个极端一种本质,本质在劳动力的完全私有。资本参加分配,超过一定的比例之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是死劳动。我们要坚持劳动力不能完全归个人所有,捍卫活劳动分配权的优先地位。

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就是按资分配的,所以并不完全否认最终导致按资分配的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按劳分配的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水平上比社会主义搞得还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虽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我们一定要看到按劳分配的局限性,看到按劳分配有重要的几种类型,每种类型的性质、作用有很大的不同。劳动力完全归个人所有,纯粹的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必然导致按资分配。按资分配就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剥削。共产党最终是要消灭剥削的,所以劳动力完全地归个人所有,纯粹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是与共产党的党性原则相背离的。我们这样分析的目的,是要从理论上弄清按劳分配的内部结构,弄清各类按劳分配的历史位置和历史作用,弄清它们与公有制、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更好地把握它、运用它,而不是取消它。

在政治经济学中,个人是最小的单位。市场经济的



大前提就是自私、自利。我干的活是我的,他干的活是他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这样,劳动力便完全归个人所有了。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在高科技的脑力劳动中,尤其在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的生产中,很多领域里分不清某些劳动成果到底归张三所有或者归李四所有。国有是国家所有,是人人所有,人人所无。我们一些经济学家解不开这个扣,往往拿西方经济学的东西来套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批评国有企业搞不成,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拿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公理作前提来进行推论。公理是有独立性的,你必须先无条件承认它。共产党的公理之一是不承认劳动力完全归个人所有。因为公有制是无法完全分解的,是无法精确地分解到每一个人身上的。如果把公有制的东西完全分解到每一个人身上,你就会逐渐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批教授到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新兴城市参观考察。当地领导介绍情况说:我们这里是靠集体企业、靠县一级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要进行一次新的改革,因为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有人说我们现在的所有制是不能调动所有者积极性的,原因是产权不明晰。我们原来认为,企业是我们县里管的,归我们县里所有,产权是明晰的。可如果这个厂里的一位女工说,她现在要嫁到湖南去,她要带走她的一份,你能给她吗?集体所有就应该有她的一份,可她带不走。县委常委讨论时说,我们怎么没有想明白这一点呢!公有制说起来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所无。有人就让我们



通过股份制量化到每一个人。当然,在这种量化分配中也有矛盾,你量化得的多了,我量化得的少了,我的贡献并不比你少了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走了这一步。看样子大家的责任心都有所提高。这位领导介绍完之后,一位大学教授问:书记同志,你讲的故事有一定的道理。据你介绍,你们县工业的老底子是在50年代打下的,据说,在50年代为你们的县办工业打底子的县委书记现在在省里离休了,你们这次量化时想到他没有?这位领导一下子傻眼了,说:对了,这个老同志我们一直感谢他呢,逢年过节我们还去看望他,这次量化怎么就把他给忘了呢?我们的教授又说:听说50年代为你们这里办工业作贡献的不是一两个人,是一批人,一代人呀!我听说周总理来这里视察过,还出过主意,还批示支援过什么东西,周总理也为这里的发展作过贡献,你们有没有记着给他的后人也要量化一点?他说,对了,周总理可不能忘呀。这位领导一时被问得瞠目结舌。同志们,这个量化的原理之一就是劳动力完全归个人所有。这是最难办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要素市场问题上,党的十五大突破了资本市场。还有一个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突破。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和管理干部领域里,如果完全的市场化,我们就会受到市场经济指向资本主义更大的推动力,推动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一步一步地否定共产党的性质。当共产党的干部脑子里不能有劳动力完全归个人所有的思想。有了劳动力完全归个人所有的思想,党的利益、党的需要就

失去了基础,就成了空中楼阁。需要你为党作贡献的时候,你就会强调个人利益,就会与党闹对立。所以,在共产党的原则里,是不承认劳动力完全归个人所有这个概念的。这个理论上的概念,经过这么一个逻辑推导,结论就是在共产党里必须提倡共产主义精神。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进行“三讲”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市场经济赋予我们各个部门大小不等的各种权力,并带来大小不等的各种利益,但只要我们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市场交换的原则全部侵蚀党的肌体,党就有可能驾驭市场经济,我们就有可能创造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非常有活力、发展前景非常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才发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东西,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半社会主义的,是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通道,是从属于所有制结构、并以极大力量反作用于所有制结构的规定性。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就得承认以劳动力的个人所有为主。在告别计划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在分配制度上否定了以“大锅饭”、“铁饭碗”为主要形式的平均主义,强调了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但在国有企业中,由于所有制性质和工业化大生产的特殊要求,仍然需要部分地否定劳动力归个人所有。这种否定,在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中间量的大小是不等的。在工人领域中,这种否定的量小,越是体力劳动多的工人,越少否定劳动力归个人



所有这一条。体力劳动可以采取计件工资,计件工资是最接近劳动力归个人所有的一种分配形式。但是,一部分工作是不能量化的,不能量化的劳动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就只能实行计时工资。如化工厂里的化学反应,有的反应罐一个生产周期就需要几天甚至几年的反应过程,一个人工作8个小时,无法实行计件工资制,只能实行计时工资制。计时工资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劳动力个人所有的概念,必须以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能够以个人计算为标准起点,当它不能以个人为单位计算时,就无法真正做到以个人为单位的按劳分配。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被局部否定的原理来自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环节,即来自生产力的自然特性。这是这个原理的公理性质,是生产力的使用价值不能无限细分量化所决定的。由于在商品流通与金融环节里,使用价值都转化为价值,而价值是可以细分量化的,所以这个原理在商品流通和金融环节里表现得不如生产环节里那样充分,但实质上这个原理在大循环的三个环节都是客观存在的。

在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被局部否定问题上,工人阶级还存在着某种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源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这种局限性,在国有企业里跟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冲突得非常厉害,就连褚时健这样的问题,也有人给他打抱不平,他们打抱不平的理论根据,就是劳动力完全地归个人所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是不能完全归个人所有的,是不能实



行纯粹的以个人为单位计的按劳分配的。在国有企业内部,应该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机制。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他首先是党员,是党的干部。他具备了党员干部的条件,具备了当厂长、经理的资格,他才能当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他仅仅具有当厂长、经理的资格,但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他只能当私营企业的厂长、经理,不能当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他劳动的目的是为这个企业赚钱,为国家赚钱,为全国人民赚钱,而私营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为自己自己赚钱,为资本家赚钱。同样是赚钱,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他的本事是从哪里来的,主要是党培养教育出来的,不能认为主要是他自己挣来的。这里又涉及到劳动力价值形成理论问题。党和国家在干部的培养教育上花了大量的力量,把这个人培养成为厂长、经理之后,他作为个人不能把群众的劳动视为他自己的劳动,把党培养教育的结果变成他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共产党员的一切都是党的。战争年代,党需要你献出生命的时候,你就要献出你自己的生命。无数革命先烈在党需要他们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建立了新中国,才有了我们的今天。这个巨大的成本是我们今天所有“收益”的公共成本。和平建设时期,党需要你献出自己的工作才能,你就应该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工作才能,这样才无愧于为党献出生命的先烈们。所以,在共产党内部,在共产党的党性原则中,劳动力是不能归个人所有的,连你的生命都是党的,



你的劳动力就更应该归党所有了。不是说“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吗?共产党员对党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在共产党内部,是没有劳动力归个人所有这一说法的。劳动力归个人所有,知识、本事归个人所有是市场经济的定义,在这里市场经济是指向资本主义的。

如果劳动力归个人所有,就建立不起对党的忠诚。这是因为,劳动力归个人所有的出发点是个人,终结点也是个人。如果一个人自认为其知识、本事、智慧、劳动,都归个人所有,就难以建立起对党的忠诚,也建立不起对政权的忠诚。李自成打进北京城之后,他的两个谋士李岩和牛军师在景山东街散步时发现,已投奔李自成的明朝大官们骑着高头大马谈笑风生地从崇祯皇帝的棺材前面走过,好像他们根本不知道崇祯是谁似的。然后,李岩就问牛军师,他们这些人都是崇祯皇帝提拔任命的,为什么会这样寡情薄义。牛军师说这是崇祯实行科举制的结果。明朝的官都是考出来的。十年寒窗苦,一日步青云。他的官是靠自己寒窗苦学挣来的。劳动力归他个人所有,他靠十年的苦读挣来的这个官位,自然归他个人所有。他没有把自己的官位看成是明朝的官,而是看成他自己的官。所以他对明朝政权就没有一点感情,对崇祯皇帝的死就一点也不感到难过。劳动力归个人所有建立不起对政权的忠诚,科举制建立不起对政权的忠诚。共产党如果要求自己的党员保持对党的忠诚,就不能承认劳动力完全归个人所有,共产党要维护自己的政权,就不能让党员干部认为他的职务是他自己的,他的本事完全



是他自己的。职业革命家不能把革命当职业。革命家的一生都是为了革命，干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全人类，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为了个人吃饭而干革命的。如果为了吃饭，为了挣钱才干革命的，那就是把革命当成职业了，就把革命的职务、革命的岗位变成挣钱的工具了。把革命岗位、革命工作当成挣钱的工具后，他就要挑肥拣瘦了，他就要以自己为中心了，他就把他的知识、本事当成他自己的资本了。党的整体性在他心目中就消失了，党的利益就低于他个人的利益了。党的分化必然带来国家的分化。那些蜕化变质的干部，追究其思想根源，重要起点之一，就是把自己的知识、本事完全当成他个人的资本了，当成他个人的私有财产了，把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力变成他自己的权利了，变成了他挣钱的工具了，一旦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私利，他就要发生质的变化，就把自己放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就要变成党和人民的敌人。翻开《大牢里的市长们》一书看看，书中收录的那74位市长，74位党的干部的变化历程，都有把革命当职业，把工作岗位当成挣钱工具的思想基础，都有把劳动力完全归个人所有，把党和人民给他的知识、本事归他个人所有的思想基础，正是这种思想基础，导致他们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十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公有产权占主体地位的股份制企业的工人有做主人翁的资格。私营企业主与受雇于私营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买卖关系、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部分工人没有资格做主人翁，支撑不起执政的共产党。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整体中的一部分。国有企业管理层与工人群众、知识分子中的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关系，是目标一致、利益一体、相互依存的关系。企业法人是完整的人。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只有努力使本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巩固并发展，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人翁。国有企业亏损了、倒闭了，被私营企业兼并了，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也就沦为“亡厂奴”了。工人阶级不能仅仅靠政权保护主人翁地位，要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整体素质，不断独立自主地去争取、巩固、提高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工人阶级是否有独立完整的主人翁资格，最终决定共产党和其政权的性质。党要顶天立地，顶马克思主义之“天”，立工人阶级之“地”。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的党就会偏离自己的政治方向，就会改变自己的性质；离开了工人阶级，就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党的性质同样要发生变化。共产党要想不发生质的变化，就必须全心全意



地依靠工人阶级。

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是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它的阶级基础就不能还是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必须是处于主人翁地位的工人阶级。如果我国全面私有化了,即使共产党的名称不变,其性质实质上已经变了。国有企业不存在了,自然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也不存在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实质上也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被雇佣的工人不具备执政意识,不容易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经济基础是私有的,工人阶级是被雇佣的,处于被剥削地位,私有企业成为国家的主要纳税人,政府就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私营企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主要受到了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

一是竞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是一个简单的整体,安阳钢铁厂的工人和武汉钢铁厂、重庆钢铁厂的工人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成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和法人实体在市场上竞争,工人阶级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许继集团和阿继集团都是国有企业,许继还是阿继分离出来的,但在市场竞争中许继打败了阿继,许继用继电器行业 20% 的职工占领了本行业 80% 的市场,日子红红火火,而阿继则举步维艰。这就是市场竞争。



二是劳动力市场。私营企业的工人不是主人翁，因为他在劳务市场上已经把自己卖给资本家了，他的一切由拿钱买走他劳动的私营企业主说了算。列宁曾经说过，身为奴隶，但起来斗争的不是奴隶，是英雄；身为奴隶，但意识不到奴隶地位，逆来顺受的是奴隶；身为奴隶，但以奴隶地位自豪的是奴才。这三种人的客观地位相同，但由于主观不同，定义就不同。国有企业的工人有主人翁地位，但减员增效时，部分人要下岗。下岗是劳动和生产岗位的分离。工人离开这个企业，不再是这个企业的员工时是失业，失业是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劳动和生产岗位的分离必须坚持，因为要调整生产力结构，提高效率，生产力要求你下岗，但是，失业要尽量避免。一失业，就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这是市场经济对工人阶级的一个严重挑战。

三是允许按资分配。这是对劳动的挑战，对工人阶级的挑战。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但有些机制指向资本主义，给工人阶级带来种种挑战，也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权利。机遇就是使工人阶级在微观环境里，在以法人为单位的企业里，形成了完整的社会力量。国有企业要生存，不但要搞好生产，还要完成市场中完整的运转任务。过去，这些运转任务是由国家计委完成的，国家计委是这些国有大厂的调度。企业的任务、权利是不完整的，看不见生产、流通和资本的整个社会大循环，只需要按照计划生产。现在，企业的任务、权利增加了，整个社会大生产的三种形态——生产、流通、资本在每个企

业都出现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这种完整的循环,有利于工人阶级完整地认识和理解整个社会。过去的工人阶级,对整个社会循环不了解,只能是半个工人阶级。不仅如此,现在的企业,还要重视法律和文化。许继集团走了一个博士,要诉诸法律,许继的领导必须学习和运用法律。法律是上层建筑。企业还得抓意识形态工作,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苏联共产党搞了70多年,想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确保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但苏联共产党政权倒台时,苏联工人阶级作为整体几乎没有反响,没有保卫政权、保卫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完整的,其主人翁地位不是靠自己奋斗得来的,而是外边恩赐的。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工人阶级通过一个个完整的独立的经济法人的运营,可以完整地经历和感受整个资本生产循环的三种形态,可以在自己企业的微观环境里直接涉足意识形态,涉足上层建筑的很多问题。市场经济给国有企业带来了挑战和压力,也为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我们要在市场经济中培养有主人翁资格的工人阶级。这里说的是“资格”,不是“地位”,是“培养”,不是“维护”。现在是共产党执政,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有主人翁地位。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地位还不够,还必须有资格,有能力!在微观经济里,国有企业必须像许继集团等好企业一样取得成功,成为有自己独立的、完整的、成熟的意识形态的集团,才能称之为阶级。西方的工人阶级严格讲不能称之为阶级。西方国家居统



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灌输给了工人,所以,工人不革命,不夺取政权,而是组织工会,为争取多一点的工资、福利而游行、罢工,搞工团主义。我们要用执政意识、独立的竞争意识培养工人阶级,最本质的是教育和引导工人阶级勇往直前,提高素质,把无产阶级的优势、党的优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结合起来,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如果工人阶级没有主人翁的水平 and 能力,已有的主人翁地位是难以维持的。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夺取了政权,把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交给了我们,解决了第一步的问题。要维护和巩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的主人翁地位,只能靠每个国有企业自己,靠工人阶级自己。洛阳色织一厂在负债 1481 万元的情况下于 1992 年被迫停产,被一家私有企业用十分苛刻的条件收购。收购者提出,政府要免税 20 年,挂账停息 20 年,20 年后按原资产归还;只接收 1/3 的青年职工到该企业下属的养猪场里喂猪。一句话,就是卸债、撵人、清场、要地皮。工人们被激怒了,他们认为,与资本分离后,就会成为资本的奴隶,成为“亡厂奴”,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要求民主选举厂长,自己决定企业的前途命运,自己拯救自己。企业破产逼得他们深刻认识到了主人翁地位的重要性。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时全厂职工都去了,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当为人厚道、党性强、懂技术、会管理的原车间主任马明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厂长时,全厂顷刻之间鞭炮齐鸣,锣鼓

喧天,笑声、哭声混成一片。退休工人高双成因为精神高度紧张,高兴得跑回家对老伴只说了一声“我们胜利啦”便突发脑溢血倒在地上。一些工人谈起当时的情况说,这种感受只有在日本投降、洛阳解放、“四人帮”倒台这三个时刻才有过,那种翻身感和求生欲使人们产生了搞好企业的巨大热情。一个退休工人把一生积攒的2000元钱献给厂里,一位姑娘把准备结婚用的8000元钱也拿出来给了厂里。不到20天,全厂职工凑齐45万元启动资金。工人自己选出来的厂长不负众望,带领职工日夜奋战,终于把这个油干灯灭、弹尽粮绝的厂子救活了,半年后开始发工资,一年后扭亏为盈。1995年冬天,该企业开始兼并另外的企业,又盖了两栋家属楼。这种扭亏为盈的情况经济学称之为“非线性过程”。西方经济学基本上只研究线性过程。只有共产党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创造非线性经济学。

面向未来 迎接挑战

十七、勤奋学习,做好理论准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为我们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全党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以十五大为标志,我国进入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邓小平理论”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一个专有概念,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闭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十三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的提法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十四大的提法文字长,还没有形成专有概念,还属于个人作品。由于文字长,为了简便,一些地方使用“邓理论”、“中特理论”等缩写,很容易造成歪曲。十四大后,很多同志提议要形成专有概念。十五大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专有概念,并不完全是为了使用方便,它标志着这一理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理论,反映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理论一旦形成专有概念,就成了党的旗帜,就有了很强的严肃性,就与邓小平同志个人的讲话有了区别。《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因为它是中央集体讨论通过的,就像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是经中央讨论通过的一样。邓小平理论有小平同志个人重大的决定性贡献,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的共同财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专有概念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凡是解决这个历史阶段重大问题且被全党认可、通过的,都是属于这一理论的范畴。它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带有历史阶段性的概念,有其独立的历史规定性,有其完整而独立的意义。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原来的几个阶段——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既有继承关系,又有发展关系,既有上下连贯性,又有左右并列性。我们从这一系列专有概念中体会到一种和谐——主义、思想、理论,这完全可以看做是从三个角度来讲的同一件事情。这个专有概念形成的时间,在社会心理的把握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其政治艺术水

平是相当高的。大家知道,这个专有概念是在邓小平同志去世半年多后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提出来的,从一般社会心理来讲更好接受,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一般社会心理认为,我们党提出这个专有概念,是为了继续高举邓小平同志的旗帜,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狭隘的功利目的。

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人阶级政党要不断发展和高举自己的理论旗帜。这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工人阶级政党生存、发展和保持性质不变的内在需要。资产阶级政党追求本阶级、本政党的利益,不像工人阶级政党那样惟一追求的是真理,所以它不可能产生高度一元化的、逻辑性非常强的、严密的理论体系,没有一套清晰、稳定、一致的概念体系。它的指导思想只是散见于其学者的著作或总统的演讲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相比,从当今世界范围讲,在经济、技术、军事、文化上还是弱者。我们要由弱变强,靠两个重要的看家本领:一个是自觉性,有科学的理论,有理想,有信念,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另一个是组织纪律性,能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拳头。而理想、信念、精神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个总称,包括不同的发展阶段,有马克思主义阶段,有列宁主义阶段,有毛泽东思想阶段。十五大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阶段。这是我们党的光荣,显示了我们党的历史资格。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使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之后有了新的思想武器,有了新的旗帜,在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上没有出现理论上的真空。在列宁主义阶段，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 20 世纪后半叶，它没有继续发展，出现了某种僵化、真空状态，这种状态很容易被错误思想侵入。从赫鲁晓夫的“解冻”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多元化思想和自由化意识形态侵入苏联共产党内的反映。僵化、真空必然打败仗。

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就像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尽管其外形可能很强大，而实际上很虚弱，没有力量与对手抗衡，很容易被对手击败。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如果不能很好地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就难以凝聚全党、团结人民，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就难以解决我们面临的复杂矛盾和问题，不断开创事业的新局面；就难以承受和抵御各种风险，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在只有 20 万左右的党员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200 万左右的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2000 万左右的党员时却瓦解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不仅仅在于人数的多少，更重要的在于有没有旗帜，在于其思想是否具有革命性、先进性，是否能掌握群众。列宁主义曾使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上半叶取得了长足进展。当时，是否提出“列宁主义”在苏联共产党内有争论。有人认为，列宁主义本身构不成阶段，只不过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坚持提出“列宁主义”。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有阶段性地位的，它回答了 20 世纪上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提出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下半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回答了这些新问题,解决了在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使命没有完成。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每当革命和建设处在重大历史关头时,总是特别重视理论的指导。”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这是我们的幸运。我们能够在 20 世纪下半叶,以 20 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以我们党、国家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创造、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邓小平理论,并且实实在在地用这一理论指导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确实是我们的一大幸运。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中最有创新意义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扭住不放。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同志认

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有上百年的时间。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邓小平同志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多次论述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邓小平理论的新贡献,最主要的表现在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十二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初级阶段,但真正形成完整概念,是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建设任务。提出问题并不等于已经很成功地实践了它。比如,十五大提出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其中包括股份制等,离我们很好地贯彻、很熟练地运用还有相



当长的距离。这是一方面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的任务是,通过新的实践继续发展这个理论。这个任务,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严肃地提了出来,这也是我们在学习邓小平理论中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虽然都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其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感觉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邓小平同志去世时,正好处在邓小平理论的开创、发展时期,尽管有些概念是在他去世后提出来的,比如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等,但这些概念属于邓小平理论,这是符合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大不一样。毛泽东思想基本上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完成于党的八大。就是说,毛主席去世时,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重大发展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毛主席本人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后期说的话和做的工作,还需要党和人民鉴定是否属于毛泽东思想。十一届六中全会就是解决的这个问题,让全党来讨论哪些是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哪些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可以说,毛主席后来的言行,部分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而邓小平同志去世,恰恰处于邓小平理论的开创期、发展期,提出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但没有能够最后全部解决问题。这个任务留给了我们,所以,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要求继续发展邓小平理论。我们这次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决不

是重复,不是背诵,不是过去那样的感觉。

中央有个精神,把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从1978年提到1956年。把1978年确定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有道理,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确实是一个起点。但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成熟期,到1956年就基本上结束了。1956年以后也有实践,但从理论上来界定,已经不属于前一个历史时期的任务了,从“大跃进”、反右、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都有很多不合适、不成功的地方。这一时期算到邓小平理论时期更有道理,更加科学。尽管邓小平同志当时在党中央还不是“一把手”,但那是个酝酿时期,在历史任务的提出和划分上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那一段的摸索,就没有现在的邓小平理论。小平同志去世后,党的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专有概念,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勃勃生机。在20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情况下,我们党没有气馁、灰心,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提出邓小平理论新概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对邓小平理论所处的历史位置及我们的历史任务,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忘记我们肩负的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我们不仅要努力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而且要积极主动地参加到这一理论的发展中去,努力回答实践中提出的前沿问题,不断发展、完善这一理论。

第二,群众参与创立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程度与马



克思主义其他阶段的程度不同。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产生的,而革命实践一开始参加者总是少数人。几万人的红军,几十万人的八路军,几百万人的解放军,绝大多数群众在接受毛泽东思想时有一种从天而降的感觉。毛泽东思想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八年抗战甚至包括第二次、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章及其整理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毛主席的主要著作是在窑洞里完成的,参与者很少。而群众对邓小平理论有一种亲近感、亲切感,因为这些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这些道理,经常可以听到。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小平同志的思想,随着党中央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召开,不断地通过新闻媒介和广大群众见面,群众对他的许多讲话都非常熟悉。邓小平理论的很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广大干部、群众一直都在参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是这个理论创造的主体,而不是这个理论的客体。许多同志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的未来发展空间很大。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初期,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也可能有少数知识分子、工人运动骨干)参与,《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主要是两位导师的著作。创立和发展列宁主义的队伍扩大了。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人更多了。创立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干部、群众、

党员、专家、学者可谓是数不胜数，大大高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阶段。

第三，载体不同。马克思主义早期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主。列宁主义阶段，列宁的许多战友、同事有了著作，像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到现在仍然是马列主义中的一部经典著作。到了毛泽东思想阶段，除了毛主席的著作外，还有大量中央文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著作。邓小平理论发展的特点，党员和人民群众参与的程度，党的领导、集体成员在中间所起的作用，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不一样，其载体必然也不一样，更加扩大了。邓小平理论在我国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有资格发展马克思主义。苏联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它就没有资格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在这一时期、这块土地上应运而生，回答了历史提出的问题，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同时，历史给这一理论的出现提供了某种可能，这又是一种历史的选择。甚至包括反面实践的对比，比如“文化大革命”、苏东剧变和邓小平理论的出现，都有某种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否定性的逻辑联系有时比肯定性的逻辑联系还重要，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文化大革命”把中央计划体制的弊端推向了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副产品，出现了“一手软”问题。人们的态度是既批评，又容忍。总的说，20年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人民群众



对改革开放是衷心拥护的,对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是满意的。

有许多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对邓小平理论的体系性、理论性和新的阶段性以及它是否有资格成为一个专有概念有疑问,提出了不少问题。一方面,说明人们爱护我们党,尊重党的理论工作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一些同志在学习中还有某种思想上的局限性,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新的理论阶段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在这个理论面前所处的位置。我们不能把自己置身于这个理论之外,远距离地挑毛病,而要置身于这个理论之中,学习它、运用它、发展它、完善它。我们要在学习、实践中继续发展邓小平理论,让这一理论在实践中掌握群众,要注意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与当前前沿性的社会问题相衔接。研究、解决当前前沿性的社会问题是我们继续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推进这一理论的发展。比如,我们过去搞的是计划经济,现在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同志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但如何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条开拓性的、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被称为“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我们在研究、解决这类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创造出对邓小平理论有贡献的内容。

第二,要与个人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相衔接。邓小平理论是共产党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结合自身情况,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马克思主义必须有与执行这个主义的物质力量相结合的能力,或者说,执行这个主义的物质力量必须能够接受这个主义,并以这个主义作为自己的特点。这种结合的一个关键就是“三观”。然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做法,已成为现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党内出现了许多反面的问题,有的甚至很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了会、发了文件,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但为什么效果不好呢?说到底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没有真正和自己的“三观”相结合,没有形成作风的力量。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在战场上最大的不同是,共产党员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国民党员则与此相反。这是共产党之所以战胜国民党的一条重要原因。这是党的作风发挥的巨大作用,产生的巨大影响。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主要建立在“三观”基础上。我们的党员、干部是把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物质力量。邓小平理论如果不能和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那就是异化了。

第三,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衔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邓



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区别仅仅是形成的历史条件和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同。毛泽东思想主要回答和解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理论主要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础,任何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体系性、系统性,有人总停留在对《邓小平文选》的注意上,这样做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理论体系,天天都在发展;否则,它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文选》三卷中有丰富的内容,小平同志没有,也不必要去重复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基本原理。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阶段性和发展部分,要重点读《邓小平文选》,也要读马克思主义各个时期的著作,因为阶段性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认识到。如果对邓小平理论之前几个阶段的经典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功底,在对邓小平理论的体系性、系统性的理解上就会更容易一些,理解的程度就会更深刻一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联系,不能割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联系。否则,就会破坏邓小平理论的继承性、一贯性。离开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基础,就不可能正确、完整、系统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第四,要与党建工作相衔接。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

建设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党的建设。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实现这次大会确定的任务,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把党建设好,这是小平同志给我们开拓的一个新的、很大的空间。比如,就目前一个阶段来看,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怎样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克服自身消极腐败现象,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等,都是党建工作中一些崭新的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课题,需要我們不断地去探索去发展。

十八、搞好“三讲”,做好思想准备

“三讲”集中教育是党为迎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在思想和组织上所做的重要准备。搞好“三讲”集中教育,首先要弄清楚“三讲”集中教育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命题。

中央多次强调,要以整风的精神进行这次“三讲”集中教育。“整风”是这次“三讲”集中教育的重要特点,也是党建的重要方式、重要成果之一。延安整风以来,我党多次整风都是有成效的。这次整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



历史命题。所谓历史命题,就是历史任务,即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这次“三讲”集中教育,最大的历史背景就是我国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在20世纪末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写到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是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经过近几年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出现了大的轮廓,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市场经济的环境,最突出的表现是1998年出现了买方市场。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买方市场是典型的市场经济机制。一旦出现买方市场,价格供求竞争机制就要发挥作用,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指挥棒、最重要的调节杠杆就要起作用。出现买方市场后,很多企业不景气,有些同志就提出用扩大内需等方法拉动需求。用投资拉动等方法来扩大内需、拉动需求有一定作用,但不足以消除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减缓它的严重程度,但若消除它,就等于取消市场经济机制,取消市场经济主要调节杠杆的作用。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追求的目标就是市场经济的这个调节杠杆,就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机制。当这种机制真的出现在面前时,又觉得它那么陌生,对它那么不适应,甚至还有疑问。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时,不仅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搞不成,国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搞不成。但是,1998年我国出现买方市场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调子开始变了。美国首席经济学家、世界

银行副总裁斯蒂格里兹的调子变了,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排斥公有制。而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公有制跟市场经济是不沾边的。既以公有制为主体,又出现了买方市场,这就是党进行“三讲”集中教育最大的历史背景。

确立改革的目标模式非常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的改革目标模式。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也是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主要区别之处。邓小平理论真正核心的内容,真正和毛泽东思想相区别而有特色的,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搞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搞市场经济,过去出现过萌芽(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没有系统的论述,更没有完整的实践。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时进行“三讲”集中教育,是我党的一个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应该怎样搞,是认识“三讲”集中教育的一个逻辑起点。党之所以要整风,是因为党出了问题,整风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整风的针对性。胡锦涛同志在“三讲”集中教育动员大会上讲了5个方面的突出问题,用的语言分量很重。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对这些问题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要知道产生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最大的创新点,也是我们最大的难点。难就难在创新的地方。新生事物都会遇到种种困难,只有克服困难才能成长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党建带来的首要历史任务就是党要驾驭市场经

济。“党要驾驭市场经济”，是江泽民总书记几年前提出的概念，非常重要。世界上有资本主义制度“加”市场经济体制，也有过社会主义制度“加”计划经济体制，但从来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加”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党的一个伟大创造。这个“加号”非常关键。能否“加”起来，“加”起来会出现什么问题，产生什么矛盾，能否“加”成功，研究和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我们党身上。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就“加”不起来，更谈不上成功与否。资本主义“加”市场经济是自然、自发的。我们党是有意识地把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本主义制度上剥离下来，植入社会主义制度之中。这就像医生动手术一样，手术成功与否，还要看能不能解决抗体问题。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对植入物会产生抗体，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是自我保护机能的自然表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对移植进来的市场经济机制也会产生“抗体”，这是制度本身的一种本能反应，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这个“加”，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就要解决制度本身产生抗体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性格和计划经济的性格完全不同。计划经济像算盘珠，拨一拨，动一动，不拨不动，没有自发性；市场经济像活蹦乱跳的小马驹，有内在动力，有很强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是指向资本主义的。这就带来了“驾驭”市场经济的问题。引进市场经济机制，要的就是这种自发性，难的也是这种自发性。这匹“小马驹”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跑，哪里利润大就往哪里跑，社会主义的方向

和原则对它不起作用。因此要给它装上笼头,要驾驭它,让它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从生产力的层次看,市场经济的运转有周期性,而这个周期的某个阶段有破坏性。从经济学角度讲,要尽量“熨平”周期,把波峰、波谷、高潮、低潮的差距尽量减小,进行反调节。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带有很强的客观性、自发性,大起大落造成生产力的浪费。东南亚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部规律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框架下也会出现周期,我们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要尽可能地防止和减少周期性造成的破坏,要想办法“熨平”它。这种“熨平”,我们称之为宏观调控,西方称之为凯恩斯主义。在“熨平”过程中,是否有党的领导,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生产力层次的驾驭概念。在生产关系层次上也有一个驾驭概念,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市场经济的个性就是偏向强者。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就是竞争,通过价格、供求关系等在市场上竞争,完成资本集中和生产集约化,优胜劣汰。优胜劣汰就是偏向强者。市场经济的好处在此,坏处也在此。有人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负面影响”概念不准确。因为市场经济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是同一个机制,是分不开的。比如,“优胜劣汰”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自发性”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都不好回答。我们要的就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机制,利用这种机制推动生产力发展。但是,这种机制确实产生正面影响的同时有其负面影响,西方经济学称之



为“马太效应”，即《圣经》中马太福音讲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效应。最明显的例子是银行。过去，我们的银行很大程度上履行的是政府职能，钱贷给谁、贷多少听领导的。现在，4家国有银行转变成商业银行后态度马上变了，企业愈有钱，生产条件愈好，市场愈广阔，愈不需要钱，它却愈是积极地找上门给你贷款；企业愈穷，生产条件愈差，市场愈不好，急需大批资金来扭转不利局面，它却愈是不愿贷给你。银行对企业的这种态度，就是市场机制对人的态度。产生马太效应的机制，就是产生阶层或阶级的机制，就是产生两极分化的机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避免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在生产关系领域也有一个驾驭问题，也就是说，要进行反调节。你不是偏向强者、否定弱者吗？我们通过调整领导班子、救济、贴息贷款等非市场经济的办法，帮助弱者变强，避免市场经济机制把我们的社会搞得一塌糊涂，避免两极分化。对扭亏增盈，理论界、经济学界一直有不同意见。一位著名经济学家1997年曾说过，扭亏增盈是市场经济的反动。他的本意是，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优胜劣汰，让亏损的企业倒闭，盈利的吃掉亏损的，扭亏增盈是和市场经济对着干。这位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幼稚和片面的。扭亏增盈是对市场经济机制的反调节，是要驾驭市场经济，用社会主义的自觉性控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自觉性要高于自发性。如果我们放弃扭亏增盈办法，等于放弃反调节机制，那就真的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在生产力层次进行宏观调

控,很少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的建设的历史命题就是党要驾驭市场经济。党要居于驾驭者的位置,驾驭者就是要高于被驾驭者,强于被驾驭者。另外,市场配置的马太效应、高成本、随机性和“哈哈镜效应”(扭曲效应),必须有一个非市场机制的党来驾驭,必须有宏观调控的政治机制。宏观调控以私有制为基本制度还是以公有制为基本制度,其效果是不一样的。1993年,我国通货膨胀得厉害,从年底开始进行宏观调控,经过两三年,1997年我们实现经济“软着陆”。之所以在如此快的“软着陆”过程中没有产生破坏性后果,党的非市场机制起了重要作用。比如“菜篮子工程”,在当时通货膨胀中,蔬菜、粮食的短缺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召开全国“菜篮子工程”会议,要求各省、市的省长、市长使用各种手段把菜抓上来。在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环境里,这种“菜篮子工程”即使要搞,周期也会很长,成本很大。但当时我国说抓就抓,几个月后菜价便下来了,使得整个通货膨胀率一下子降低了。另外,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居于最高位置,领导位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如此,一切资本说了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要让劳动高于资本。代表劳动,让劳动的呼声、愿望高于资本的呼声、愿望的只有共产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总之,这次“三讲”集中教育是要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背景下党驾驭市场经济的历史命题。什么时候我们党能够成熟地、从容地驾驭市场经济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这一新生事物、伟大事业在人类历史上就算成功了。

十九、纯洁队伍，做好组织准备

目前，我们党面临着充满挑战的环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台湾的李登辉公然宣称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围攻党政机关、新闻单位，都是对我党的严重挑战。为了发展经济，我们请来外国的资本主义，培育国内的资本主义。对党来说，这些资本主义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有加快发展经济的一面，也有腐蚀人们灵魂的一面，还有涣散党的组织的一面。大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小到党的一般干部，被资产阶级拉下水者数以万计。跟着李洪志及其“法轮功”跑的党员达20万人。只有清除腐败分子和不合格党员，纯洁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党才能在严重挑战面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中央提出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整风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立足于学习提高。毛主席说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反映，是事物靠内部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一个创造，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减弱，一党执政体制就会产

生自我麻醉，自我感觉良好，自欺欺人，忽视矛盾，掩盖矛盾的机制，即使有少数人能够居安思危，居高思坠，党也躲避不了周期律。一个政党要保持其先进性，必然要进行党内斗争。党内斗争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党和党之间也有斗争。资产阶级两党之间的斗争，从阶级性来看，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党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有能力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来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党内斗争，要注意防止出现“左”的问题。“左”的斗争十分残酷，而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与社会斗争的残酷性是成正比的。历史上，秦始皇“左”得非常厉害，他消灭旧意识形态的主要方法是杀人，被人视为暴君、暴政。当时，封建制度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奴隶主义落后势力比较强大，封建主义进步势力比较弱小，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巩固新生政权，容易犯“左”的错误。刘邦吸取了他的教训，手段上比较缓和。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也“左”，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雅格宾党人。“革命”这个概念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使用的。革命党人把路易十四推上断头台，采取的手段是很激烈的。雅格宾党人的几位领导，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对敌斗争很残酷，党内斗争也很残酷。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也采取了“左”的办法。斯大林的“左”和当时斗争激烈、残酷的大背景有关，和当时苏联的实力弱小有关。斯大林跟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应该是其右的一面。我们党内的斗争也出现过“左”的做法，“文化大革命”达到极端。这是因为当时党比较幼稚。要用历史的观点来



看党内斗争。党的执政问题是职业化、技术化、资源化以及我党面临的市场经济的考验,这些考验反映到党内斗争中来,就是当前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目前,党没有搞运动的要求。是否搞运动取决于我党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党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解决纯洁性问题,就用改良的办法。“改良”是个中性词,改良不总是错的。改良主义是错的。改良是内部的、渐进的、缓和的方式。历史留给我国和平发展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们要抓住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能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搞运动。我党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处在执政地位,应该也能够通过改良解决自身的问题。资产阶级就是靠两党竞争来解决自身退化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不能采取资产阶级两党竞争的办法,但必须寻找出解决自身退化问题的机制。

中央为什么提出“三讲”教育要立足于学习提高呢?“三讲”教育是解决防病问题,防病应该从庸俗化、从起点开始解决问题。治病是解决终点问题。防病、治病是两套方法。这次强调依靠群众,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整个领导班子。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即使有个别恶势力,也不敢放肆。在目前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要有一种危机感,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对待“三讲”教育。“三讲”教育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把着眼点放在事物发展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所以,中央一再强调学习提高。党内只要把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善的面扩大,先进的



部分更先进,中间部分往前移,那么即使出现少量的恶,也不会泛滥。“三讲”教育,首先要看到在庸俗化、职业化、技术化、资源化问题上有没有忽视的地方,有没有不讲政治、不讲正气的地方。如果把“三讲”教育搞到很好的同志也发现自己有很多缺点,“三讲”教育就达到目的了。这就叫立足于学习提高。提高什么?提高标准,不提高我们就感觉自惭形秽,感觉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善招和恶招、“白箱”和“黑箱”,解决问题的领域不一样,目标和标准也不一样。比如,在党内就不用侦查手段。如果你触犯了刑律,里通外国,搞自由化,跟海外势力、“精英”相勾结,才上侦查手段。上侦查手段就是恶招和黑箱。立足于学习提高,就是在党内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不用搞运动的办法。单纯地使用恶招也会把善推到恶的一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要保持其先进性和阶级性,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保持党同它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内在联系,使党和工人阶级之间保持一种自发的、自动的、客观的联系。党的执政地位所造成的某些党员干部的优越感,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党员干部处于对工人阶级队伍管理者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甚至割断这种内在联系。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同工人阶级的内在联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自觉行为,同时也是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磨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屠刀考验出来的。在那种条件下,党同自己阶级基础的密切联系是自发的和自动



的。今天,党仍然必须保持同工人阶级的内在联系,否则共产党就会丧失自己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本性,从而也丧失自己的先进性——工人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问题在于现在的情况同革命战争年代有了很大的变化,阻碍和割断党同工人阶级的自发的、自动的、客观的内在联系的因素在增多,这是党的建设中的一大难题。某些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对我们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他们看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形成保持这种内在联系的客观机制。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就不可能得到保证,党离开自己的阶级基础,就有变质甚至瓦解的危险,我们就是要找到避免出现这种悲剧的办法。

腐败和治安问题是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我党面临的两大难题。去年中纪委下发的文件中说大案要案上升了24%。最近,灵宝破了一个大案,三个人几年间就杀了80多人。匪首是一个1966年出生的人,小时候随母亲要饭为生。17岁时他把母亲卖了,尔后就开始杀人犯罪。他手段非常残忍,一杀就杀全家。这个案例触目惊心。他世界观的形成与他的经历有关。他要饭过程中接触到的白眼多,被人看不起的时候多,日积月累,这种白眼和被人看不起的感觉使他心灵深处产生一种对社会的仇恨,没有人去教育他,去化解他这种仇恨,仇恨膨胀到一定程度,就要发泄,这便产生犯罪。社会治安问题,已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过去一列火车上是两个乘

警,现在增加到8个,仍然经常发生盗窃事件。铁道部之所以取消慢车,也是为了安全。现在新盖的房子,都装上防盗门,一家一户还感觉不安全,又加装上防盗窗、防盗网。根据资产阶级的观点分析,治安状况最根本的取决于分配。这是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的结论。他分析了60多个国家的治安案例,得出了治安状况跟两极分化成正比例的结论。两极分化的经济指标叫基尼系数,公认的两极分化指标是基尼系数达到0.5,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了。两极分化就使社会出现不稳定。应该说,我们治安状况中大案的上升,反映了社会不稳定程度在增加。最近的“法轮功”,闹得全国不得安宁。全国200多万人信“法轮功”,其中20万是党员,甚至极个别的高级干部也信“法轮功”。由此看来,这些年来,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与形势的客观要求是不适应的。20万党员都跟“法轮功”跑了,高级干部为“法轮功”出谋划策了,放在战争年代,这就是投敌。这么多人投敌了,问题还不严重吗?必须承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有它的魅力,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魅力赶不上唯心主义,阵地就会被抢走。腐败和治安这两个问题,党解决不了,就会有地下组织去解决。亨廷顿有这么一句话:黑社会是地下政府,地下政府是由于地上政府的无能才得以产生与存在的。最近出版的《十面埋伏》这本书,这样的人物已经出现了。这位“黑市长”及其同伙,已经开始了当正式市长的行动,杀了现任的市长。这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你在这个领域控制不住



的时候,黑社会就来替你解决。美国电影《教父》,就是讲黑社会的,非常鲜明地反映了亨廷顿的那句话。腐败与治安的关系,还是用亨廷顿的话“腐败和治安是一个本质的两端,腐败是体制内的犯罪,治安是体制外的腐败,治安是拿刀子的腐败,腐败是用权力的犯罪”。他把这两部分全部等价了。他统计了60多个国家,发现腐败揭发出问题的程度和数量全部与治安和犯罪率成正比。腐败率是无法统计的,因为腐败不会去登记,对未揭露出来的问题无法考察,但犯罪可以登记,可以考察。去年中央政法委说大案要案上升了24%,那么是不是可以推论腐败率也上升了?要解决腐败和治安问题,核心是解决党的建设问题,解决党和政府纯洁问题。地上政府强大了,党的正面宣传强大了,唯心主义和地下组织、半地下组织、准地下组织的力量就缩小了。亨廷顿的分析链条起源是两极分化。现在党的政策鼓励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也强调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要两手抓,一方面鼓励先富起来,一方面要消除贫困,解决下岗问题。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如果面积过大,就会造成中间状态的减少,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经济领域,贫穷和富裕的结构问题,一定要紧紧抓住不放。它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它直接涉及到党能不能有效地反腐败,有效地防止犯罪。党从1998年7月份理论工作会议到11月开始布置“三讲”教育,一直在强调防止片面性和极端化。这是邓小平理论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思想就是防止片面性、防止极端化,而防

止片面性、防止极端化最重要的就是防止两极分化。

二十、防止党的庸俗化

邓小平同志谈到党的建设问题时说过：“说到质变，庸俗化是一个起点。”什么是庸俗化？实践上的庸俗化就是低标准。理论上的庸俗化就是注重表面，背离本质。政党应高于群众，干部应高于普通党员，如果干部队伍用一般党员或者普通群众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是庸俗化。庸俗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危害，其实，它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从好变坏的起点，是最危险的一个起点。没有这个起点，就没有从好变坏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一个人，一个政党，就会永远处于最先进、最坚定、最有力的良好状态。

庸俗化的内容，大致有职业化、技术化、资源化三个方面。

什么是职业化？职业化就是我们党政干部把自己的工作看成自己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职业？是职业，但不能全部看成是职业。恩格斯指出，“国家应该成为超越一切集体利益之上的机构”。当国家机器把自身变成目的时，就会官僚化。执政党和政府结合在一起就是国家，就是国家机器。国家机器里的人，如果把自己的工作、职位、职业看成工作目的，就变成了官僚。我们党执政后，不能总是实行供给制，要给干部一定的职业位

置,不搞职业不行。我们党从1954年开始评工资、评等级。因为执政党要稳稳当当,要争取让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是一种工作条件。改革开放前,虽然取消了过去的供给制,但实际上是半供给制。改革开放后,工资等级的增加变得很复杂,考虑了多种相关因素,许多平均供给的生活条件也货币化了。本来这是一个手段,一个条件,干部分配的等级化、货币化,促使干部把手段当成目的,这是可怕的。只要搞行政管理,就得有等级,这叫科层原理,这是行政管理学中建立秩序的一个必然规律。但是,这个规律能够促进职业化,它会把人的人格、思想都变成科层制,这就危险了。我们共产党是搞革命的,从党的总书记到普通共产党员都是平等的,不但人格平等,党性也平等。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人给我讲了很多关于等级的学问。比如,我的一个下级对我说,“我观察你,觉得你当官的水平不够。你和领导一起走路应该慢半步,喝酒的时候举杯要低半分,跟领导说话要等一句,开会要早到几分钟”等。我原来不耻的东西,现在不得不承认已经成了一种风气,泛滥了,这就是职业化、庸俗化。我们需要职业,但不能职业化,职业化就把职业泛化了。我们在必要的场合承认这个层次,比如,把最主要人物的位置摆在正中间,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但要把它变成人格,变成相互之间稳定的关系,就不像是革命党了。延安时期,毛主席在上面作报告,其他领导同志坐在下面的小板凳上,有人渴了就到前边端起毛主席的水杯子喝几口,没有那么多规矩,是革命本质的一种体现,当

时没有职业化。周恩来总理和艺术家们合影,喜欢站在旁边的位置,让艺术家们站在中间。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虽然有等级,但人格是平等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革命队伍高度团结、高度民主、高度统一,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在我们国家,要坚持共产党的本质,就必须从这些地方开始研究。这些差别离质变还很远,但它是质变的起点。如果我们不从起点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等问题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像朱振江、曾锦成、杨善修等人那样,已经发生了质变,被抓进监狱再去研究解决就太晚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肯定会有一个阶段是处于“黑箱”状态,“黑箱”状态是非常不易控制、不易认识的阶段,即使能有所掌握,成本也很高。而质变的起点肯定是处在“阳光”下的阶段,防微杜渐,会相对容易一些。我们这次“三讲”教育的领域大部分是解决起点问题的领域。江泽民总书记在谈“三讲”时就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

职业化是庸俗化的一个表现、或者一个原因。有人说,不看《厚黑学》不会当官。《厚黑学》上所讲的,与“三讲”教育是矛盾的。它教人们要想当好一个官,就得“不工、不农、不商、不贾、不教、不学”,关键是“不教、不学”,其重要理论就是当官就要专心当官,不能再干别的。这就是庸俗化。另外,还有人说:“在上级面前,要懂装不懂;在下级面前,要不懂装懂。先发言说‘仅供参考’,后发言说‘作点补充’。”这话让人听了感到舒服,而这是形式主义。在上级面前懂装不懂还不要紧,因为上级比你



高明,你不懂他懂,他指导你。下级面前不懂装懂就危险了,那是瞎指挥。类似的当官之道很多,已经发展成了体系。这个问题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做官,把本来是干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变成了做官;第二个层次是尝到做官的好处后,跑官要官;第三个层次是买官卖官。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我们都要研究解决,关键要从起点抓起。党员领导干部,只要还有革命之心、有为人民服务之心,不会发展到买官卖官的地步,至多是碰到这种情况时心理上有点不平衡。所以,一定要解决做官问题,这是职业化中的主要问题。我们要用好职业这个手段,完善等级,但我们的目的一定高于职业、掌握职业,高于等级、掌握等级。做到这一点靠什么?靠觉悟,靠革命精神,靠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千万不要把工具当成目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职业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执政、为阶级掌权的工具,是国家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什么是技术化?我们要学习自然科学,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去头脑发热地大搞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大跃进”时,如果尊重客观规律,重视技术标准,就不会出现全国性大炼钢铁的政治狂热。炼钢需要 1700℃ 的高温,用木炭的土炼钢炉达不到炼钢所需的温度。最基本的技术标准都不遵守,靠革命精神去大炼钢铁,结果肯定炼不出钢铁,资源却遭到了严重的浪费。“文化大革命”中也发生过很多这样搞空头政治的问题,比如,有人搞实验,客观条件不成熟,靠革命精神硬搞,结果把事情搞坏了。要尊重技术就

必须反对空头政治。

执政党也有一个如何对待执政技术的问题。尊重技术并不等于技术化,不能把技术泛化。不能从空头政治的极端变到技术官僚的极端,不能让技术的地位超过政治。这个技术是广义的技术,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它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的“道”和“术”关系中的“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指的是总的规律,“术”指的是技术,是手段,是战术。“术”是相对于“道”的一个概念。政治上“术”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学会统帅和驾驭“术”。例如,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增加了技术性的手段,党内有纪委,政府有监察机关,还制定了大量的法规、条例,反腐败的技术程度是很高的。对领导干部坐车都有规定,如果毛主席看到这个文件,他绝对会说这是不讲政治的。正省级干部用车标准可以放宽到3.0升(排气量),副省级干部还是2.5升(排气量)。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某种技术手段来控制,他用另外的技术手段来对付。副省级以下的干部坐排气量是2.45升的车,但在车里配置价值两万多元的CD机,数万元的冰箱,排气量在文件规定的范围之内,但这一改造,一辆2.45升排气量的车比一辆3.0升的车花钱还多。还有中央文件规定四菜一汤,头天公布,第二天街上的大盘子全卖光了。反正规定的是几盘菜,没有规定一盘盛多少菜,一个大盘子里盛好几样菜。后来火锅也卖光了,因为火锅里边可以填好多东西,算一个汤。技术化措施总有走到头的时候,现在出现了杀官抢官的现象,如果我们再出台一个文件

曰：不许谋官害命！岂不貽笑大方？在技术与政治（人心）赛跑的过程中，技术总不会赢。

用技术化的手段来反腐败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反腐败的一招，有这一招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总比没有要好些。反腐败的关键是要抓起点，要从人们的思想抓起，不解决思想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技术打不赢政治。你发明了这种技术来约束他，他就会采用另一种技术来突破你。但是，不用技术手段，或者技术手段太笼统也不行。干部任用条例，公务员的录用方式，考试、交流、考核票数，都是组织技术，层次非常多，你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进行学习研究。

技术越细，民主监督的面越窄，因为多数人掌握不了具体标准。有人说三级领导，处长专政，就是处长把有关专业领域内的各种规定条文背熟了，你不知道这些规定，就得听处长的。处长的地位实际上是技术地位的转化。严格讲，法律也属于技术层次的问题。有的同志说，过去没有法律时我们还有办法，现在法律多了，反而没有办法了。法律和方法是同一层次的东西，都是属于技术层次。没有法律的时候，工作的空间大，伸缩性大。现在法律多了，给自主方法留的空间就小了。技术层次的东西就是这样，只要增加这方面的技术空间，那方面的技术空间就会缩小，这相当于任何药都有副作用。所以，在执政问题上，我们需要讲法治，需要建立各种制度。党内也在建立大量的制度。现在党内处理事情也有很多很细的依据，但这是技术层面。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无论多么细的制

度,都管不住活人,因为任何制度都是死的。那怎么办呢?就得讲政治,讲正气。共产党纯粹靠法治不行,不讲信仰,不讲人的因素不行。技术像职业一样重要,但不能技术化。防止技术化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讲政治,讲正气。有的同志说,“三讲”教育最好要落实到制度建设上,依靠制度来保证“三讲”教育的结果。这样讲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只是一个层面,不是最高层面,最高层面是用我们的信仰和理想、用我们的阶级本质来保证党的本质。我们要靠不断的思想教育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过去有人讲,专家治国,这个专家不是纯粹的技术专家,而是政治专家,这个政治专家首先是有信仰的政治专家。

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是非常复杂的。在和平与发展时期,不能简单地靠革命手段,要靠复杂的技术来维持和平状态。但这种复杂的技术也可能发展到另一个极端,造成一部分人单纯地依靠技术,变成技术化。政治上有一些是不能技术化的。比如政治的坚定和毅力,政治的信仰和勇气,靠技术是造不出来的。所以,“三讲”教育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执政的考验,是政治和技术的关系,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这个枪指技术概念,党指精神力量。比如还有外行领导内行和内行领导外行的问题。可能有些处长在某些条例上是内行,对某些技术条款背得很熟,但是我们仍然要从讲政治、讲正气的角度来统帅这些条例。尼克松1986年到东欧转了两个星期,回去以后就说,东欧和平演变的形势已经成熟了。果然,过了两年苏联就垮台了,

解体了,东欧共产党的政权就丢了。所以,有些人就很佩服尼克松的政治观察能力,说他也没有联系群众,也没有深入基层,语言也不通,怎么在东欧转了一圈就敢这么判断呢?这就叫政治家。他判断的根据是执政的经验,他在东欧接触了一些总理和部长,发现都是技术官僚,谈的都是某个法律、某个工程技术上有什么问题,从来不讲信仰、不讲意识形态。技术官僚充当执政党的领导,早晚是要垮台的。他就是这样下的判断。这就是政治家的水平。一叶知秋,而这片叶子必须是很关键的一片叶子,这片叶子就是执政经验。我们党执政,要区别政治和业务,区别技术层面和政治层面,要防止技术官僚。技术官僚不是指像工程师那样的技术官僚,而是指法律、条例、规定这方面的技术层次,像股份制、干部任免条例这些东西,都带有技术性。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但不能放到第一位,要防止其侵蚀我们的思想。

庸俗化的第三个内容是资源化。资源化是指用本部门、本位置的权力带来的实际利益。作为执政党,我们就是要用权力来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权力有可能被用于谋取本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有权力、利益问题,但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突出。权力部门和个人可以通过批条子等手段利用中间的差价得到钱,可以满足部门和个人的利益需求。市场经济给权力提供了一般等价物后大大拓展了权力的资源性。权力成为有含金量的一种生产要素,可以在灰色市

场中交换,这是市场经济给我们党带来的执政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执政的考验中间有一座重要的桥梁,它就是权力变成本单位的资源和利益。资源使得沿海省与内地省出现了利益之争,部门与部门之间、上级单位和下级单位之间出现了利益之争。所有的权力后面都有资源。权力问题、资源问题不是腐败方面的问题,是可以摆在桌面上的、可以公开争取的问题。权力资源向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我们党是讲真理、讲目标、讲党性、讲社会规律的,是面向未来的。在党内,最高的指挥棒是社会规律,是人民的利益。但是,许多地方和单位现在往往把这些最重要的原则排在了第二位、第三位,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排在第一位,造成权力的争夺,形成权力的矛盾,使很多事情办不成。资源化是权力商品化的前奏,一个政权、一个执政党如果容许权力的资源化,那么,其统一性、政治性、正气必然会削弱和下降。

资源化(从合法不合理的不正之风到违法违纪的贪污受贿)已经使中国出现了一个预备役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还有全局意识和良心随时准备把不明不义的财产安全地还给政权,希望有朝一日把储蓄态的资产转为公开合法运行的资本。这是党内主张私有化的一个动力源。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党存在危机,而且改革即使走向资本主义,也会因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而使这种资本主义缺少真正的自由、公平的市场机制。

现在,资源进入了交换状态,在交换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利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

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山和水就是本部门权力后面的资源,靠的、吃的就是这资源。还有,“硬不过组织部、说不过宣传部、吃不过统战部”,“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提高知名度;跟着统战部,有吃又有住”,这些顺口溜,把权力后面的资源说得很清楚。政府部门因为有实权,资源化更厉害。在公开的资源化后面隐藏着化公为私的可能,“小金库”可能为在每个圈子里的人一份灰色的收入而赢得集体掩护错误。在这种“攻守同盟”的保护伞下面,“小金库”可能给关键人物提供十份百份的灰色收入。资源化是当官职业化、技术化的重要推动力。部门、单位甚至个人为了控制资源,制定大量的制度和条例。相当一部分干部把职业化和资源化结合起来,任命时对岗位挑肥拣瘦。职业化、技术化、资源化,“三化”是党执政考验的一个起点。“三化”使一些干部特别会当官,回避矛盾,患得患失,当老好人保自己的位置,跑官要官,甚至谋官害命。

因此,邓小平提出防止党的庸俗化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提高党的质量问题。党的队伍的质量和数量是决定党的战斗力的两个基本因素,二者是辩证的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党员已经超过60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提高党的质量已经成为提高党的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革命战争年代的某些阶段,党员数量太少,党外积极分子大批存在,那时,要建立全国性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党的数量曾经是主要方面。今天,质量比数量更重要,要像战争年代解决数量问题那样来解决

党的队伍的质量问题。所谓党的质量,主要指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以及干部、党员队伍的自身素质等。现在,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都是正确的,但是党内有时的思想混乱、统一性的弱化、派别性活动的出现和部分干部、党员素质的不高等现象,都表明党的队伍的质量在下降。社会学原理认为,一个组织的一致性与其规模的增大成反比。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数量增多而质量降低的严重危险性,更加自觉防止庸俗化,注重提高党的质量,建立一种根据提高质量的要求而严格控制数量甚至减少数量的机制,达到纯洁队伍、增强战斗力和生命力的目的。

二十一、培养造就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一项事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能否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能否实现的战略性工程。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这项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需要,是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一、培养和造就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确分析国情,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



五大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代表未来、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构成的共存状态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相当多的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这里蕴涵了育人工作的广阔空间，提出了育人工作的历史命题，即在长达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能力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社会制度先进与社会生产力落后之间的矛盾，首先要抓住社会生产力落后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发展经济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实践中，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必然要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打交道，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学习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新的技术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稳定增长，实力大大增强；垄断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发生经济总危机的周

期延长；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劳资矛盾有所缓和；国家行政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弊端仍然存在：把生产剩余价值作为生产的动因和目的，剥削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变。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局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仍然是历史的必然。因此，西方一些敏感的专家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和悲惨命运忧心忡忡，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其新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指出，在资本主义体制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关键时刻，出现了科技和意识形态发展方向不一致的矛盾，动摇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础。他们出于阶级本能，为资本主义的未来设计各种蓝图，诸如“后工业社会”、“后文明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新工业国”等，企图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尤其是资本主义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股权分散”、“管理民主化”、“社会福利制度”等成为资本主义新的求生术，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至资本主义生存提供了新的容量和空间。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在其社会基本矛盾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状态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于其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相当的空间，使其社会制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在某些发展阶段还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发展和繁荣。而与之相对的处在初级阶段

的中国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追赶、改革、发展的进程之中。因此,我们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的,大胆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同时,注意克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保持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市场经济原来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和独有的。它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产物,作为现代文明成果,与社会主义这一人类的另一个文明成果相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掀开了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新篇章,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得到增强,社会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得到扩大,也使我们党驾驭全局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如同工人运动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一样,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地产生驾驭自己的力量,必须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靠社会主义实践主体在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从思想观念到精神境界对市场经济的理性超越。尤其是能够驾驭市场经济的人,必须靠马克思主义,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培养产生。市场经济对人的思想影响有二重性:有利于培养和加强个人的自立、自强和竞争意识;但由于市场经济产生于资本主义,其体制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有某种契合关系,其多种分配方式,尤其是按资分配机制,是否定共产主义意识的,其主体法人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市场竞争要素,是贬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整体性的机制性要素,其劳动力市场是用雇佣关系消解工人阶级队伍政治关系的要素。我国生产力的二元结构使生产力从落后到先进形成了很宽的“谱”,它使

得我们不能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简单地、机械地理解为要么促进,要么阻碍。为了二元结构生产力的“谱”中各个成分有各自发展的空间,生产关系必须有多种成分。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市场经济中的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上层建筑有某些负面影响,而改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又不能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允许市场经济原则自由泛滥。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利用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解决好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问题。有驾驭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才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发展得更快,才会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归根结底,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主义体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过程中,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批既敢于、善于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经济管理技术,又坚持社会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历史性课题。

为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培养和造就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显得更加重要。从市场机制的形成,到“资本”概念的引入、资本参与分配乃至资本运营,都强有力地刺激和发展了国内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之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尽管这种生产关系不是完整的资本主义,但面对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如何防止拥有资本的阶层形成阶级,这是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必须关注



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的初衷是完善社会主义，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发展生产力的一切举措必须有利于这个初衷和目标，而不是背叛、消解这个初衷和目标。为此，必须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由他们把握现在，决定未来。在现实社会和理想目标之间，必须有一代又一代超越经济的、社会的、家庭的制约，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能自觉地把思想境界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科学地处理自身思想境界与执行现实政策的关系，在模范执行党在初级阶段的现实政策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既不把思想境界当做现实政策，做到不偏“左”，也不把初级阶段的现实政策作为自己的思想境界，做到不偏右。有一批又一批既能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执行党的现实政策，又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主义将和非公有的生产关系一起发展，这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抓青年一代的培养教育，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二、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坚定其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下工夫

共产主义以其理论体系上的完整性、彻底性，超越了社会主义在思想、制度和实践上的多元存在，是更高的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克服倒退的“补课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需要从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的高度,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与发展,克服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悲观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出现阶段性发展和繁荣的情况下,需要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高度,认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克服在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的盲目崇拜;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处中,需要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高度,认识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克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他还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这一点。我们必须把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着力点。把理想信念定位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就使得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追求体现出规律性要求,具有科学的恒久的意义;把理想信念定位于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上,就使得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追求取得了和党的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在实践上表现得更自觉、更彻底。

邓小平同志曾将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视为我们党的真正优势。凡是科学的政治信仰都必须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紧密结合在一起。列宁曾经说过,许多知识分子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共产主义是从他们的专业知识开始的。科学的真理性、专业的逻辑性对他们具有天然征服力,而马克思主义则在真理性上内在地与各种科学学科联系在一起。从各自所学的

专业出发,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更容易培植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使这种坚定性具有更宽广的领域,更坚实的基础。这种坚定性还要适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高科技高速发展的要求。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运营全球化的加剧和对外开放的深入,青年一代会在时间、空间的调整与转换中认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会把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理论追求放在当代世界的大格局中去认识,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形态的对比中去认识。这种认识可能是历史的、现实的,也可能是前瞻性的。要通过培养和教育,使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经得起种种全球一体化和未来新事物的考验,自觉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

三、高等院校要成为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阵地

高等院校负有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职责。高等教育是现代高素质人才尤其是治党治国人才必经的教育阶段。青年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同时,通过学校教育和对现实社会的思考,逐步形成较为稳定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这些观念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结合在一起,对其选择人生道路至关重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在社会高知识群体中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健康成长依赖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培养工作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高等院校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要与其受高等教育的过程同步。要让接受高等教育的

青年学生在利益主体多元存在、思想观念多元存在、价值取向多元存在的社会环境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比较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对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缺乏切身体会、缺乏艰苦工作环境和基层工作锻炼的条件下走向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任务非常艰巨,高等院校责任重大。高等院校要不断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住青年学生(包括青年教师)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努力培养和造就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高等院校在培养和造就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项工作中,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严格的党内生活和长期的社会实践锻炼等方面下大工夫。要深化和丰富高等院校“两课”教学内容,按照“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精选马克思主义原著,由最优秀的教师讲授和辅导,引导学生在校即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研究和回答社会的前沿问题和深层次问题,对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阶级分析问题、劳动观念问题、腐败问题、个人功利和个人自由问题、物质享受问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下岗职工问题等,向学生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最重要的是讲解好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现行方针政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还要注意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注意克服教育中性化。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等经典核心理论讲深讲透,使学生掌握无产阶级政党赖以存在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二是充分体现时代要求。要把重点放在邓小平理论上,在把握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其精神实质上下工夫。三是善于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衔接,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质量。

党内生活锻炼是马克思主义者走向成熟和坚定的必由之路。很难设想,离开党内生活能培养和造就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青年学生参加党内生活的过程,就是学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过程,是继承和实践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认清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分子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也是利用组织力量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改造,从而获得思想的纯洁性、信念的坚定性和行动的先进性,努力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他们通过党内生活的培养和锻炼,党的利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成为他们超越一切个体性因素的强大动力,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路线和纲领而顽强地奋斗。

加强社会实践锻炼,在实践中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相伴终身的过程。在学校阶段,主要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树立尊重实践、尊重工农的思想。这样的社会实践锻炼偏重于在思想意识层面确立实践观念,在其成长的全过程中处于起步阶段。能否真正地、彻底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仍然是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做好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工作的关系。党的教育方针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体现了党对教育工作的总要求。严格地讲,前者已经包括了后者,后者对前者是在内容上的深化,要求上的提高。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前提。学校党委既要善于从宏观上、战略上着眼,又要善于把重点工作抓紧抓好。要理顺培养合格人才和培养优秀建设骨干的关系,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目标,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的合格人才;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目标,为党的事业培养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二是培养工作的基本目标和培养工作的依靠力量的关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政治业务素质较高、包含较为全面的群体。培养出完全意义上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多方面的投入,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参与和支持。要充分认识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高素质群体这一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学校要发挥基地和主导作用,既要依靠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培养工作,又要把一切有利于实现培养目标的力量、因素都团结、调动起来。要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培养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培养对象以青年学生为培养主体,积极考虑青年教师。还要把工作目标和个体评价区分开来,不能将培养对象中的个体简单地称之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三是培养提高和逐步成才的关系。人才素质的提高

有其自身规律,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尤其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高素质的人才群体,更需要在遵循人才成长一般规律的同时,充分把握其特殊性。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拔苗助长,人为地制造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帮助他们全面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技术素质,使其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二十二、加强和改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表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得到巩固。相反,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不能完全避免遭到削弱甚至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党既可以站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列,也可能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所吞没。因此,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变已经过时的领导方法,研究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巩固执政地位,提高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水平。

为此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方式需要转变。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党创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如何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对我们党来说,还是对于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现实中出现了两种倾向。

一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排斥党的领导的倾向。在一些人看来,既然要发展市场经济,那么就应当不折不扣地引进国外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淡化党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只适用于传统计划经济,不适用于市场经济。党不应当在企业中继续设立基层党组织,因为企业中党组织的活动不符合国际惯例,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外企业中没有党的组织照样可以取得高经济效益。这些人认为,对党和国家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应当重新思考其适用性,民主集中制要求集中和纪律,而市场经济提倡自由竞争,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就会和市场经济原则相冲突,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由,拒绝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倾向。与上述“淡化论”、“取消论”相反,有人认为,既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那么党理所当然地应当实行“一元化”领导,实行党政“一体化”。党应对企业的全部工作进行领导,应当在企业中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把发展市场经济同党的领导对立



起来,认为两者是矛盾的、不相容的。这些事实说明,在要不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以及怎样实现这一转变的问题上,党内仍存在着思想混乱的状况。这种状况,严重地妨碍着党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实现对市场经济的有效领导。

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现实中存在的许多具体问题,往往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人们对党执政的信心。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首倡的,而且实践已经证明,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可行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恰恰是掌握在党和国家手中、代表着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国有企业,却大规模亏损、效益不佳、生存困难,而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起来、通常没有党组织领导的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却蓬蓬勃勃,充满后劲。两者形成的强烈反差,致使一些人对党究竟胜任不胜任对市场经济的领导产生疑问。又如: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改革应当首先给工农基本群众带来好处。但是不少人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成为独立经营主体,普通工人和劳动者的主人翁感不是增强了,而是减弱了,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被剥夺感和不安全感。有些人便把这种情况归结为党保护劳动者能力下降,从而产生失望情绪。再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但由其政治地位所决定,我们党并不把这些人作为执政的依靠力量,而这支力量又在不断壮大,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执政基础是否像以前那样牢固,也是人们十分关

心的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对市场经济的领导作用就无法得到体现,也就很难说党已经能够熟练地驾驭市场经济,牢牢掌握了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动权。

3.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坚决克服自身消极腐败现象。消极腐败现象同我们党的性质是格格不入的。这些年来,我们党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但是,总的来说,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效果离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消极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腐败行为增多,集团犯罪、顶风作案在干部犯罪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表明反腐败斗争仍面临着严峻的任务。实事求是地说,人们对当前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欢迎的,但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果是不满意的,对党是否能够有效地遏制消极腐败现象缺乏足够的信心。实践证明,缺乏信心往往逐渐转化成失望,失望还会进一步转化成对党的不满。这种规律性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失败,从根子上说,是由于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异变。而人民群众之所以抛弃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已经绝望,认为共产党已经腐败,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党不能在反腐败这个问题上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党和人民之间的隔阂就会越来越深,党和群众的联系就会越来越脆弱。若遇突发事件,党的执政地位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威胁。

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同样如此。但是,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个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环境,把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下去的问题。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是强调根据人的需要发展经济生产,强调利益驱动。因此,它承认人的合法利益,允许人们通过正当手段去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是市场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动力。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承认个人合法权利的同时,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先人后己,无私奉献,强调为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必要时能够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从这一点上说,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市场经济原则是有矛盾的。如何看待这一矛盾?从理论上说,我们既不能因为要坚持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不允许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放弃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也不能因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就放弃共产党人的理想。但是,从实践上看,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不坚持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共产党就有失去其先进性的危险;但如果这种“坚持”脱离了市场经济的实际,又会被人们认为虚假、不可信、不现实,这同样会使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无法得到真正的坚持。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被放弃了,党执政的思想基石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动摇。从现实状况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既要看到外部的原因,也要看到党自身的原因。从外部原因看,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和各种没落腐朽思想、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大大加强,形成对党所倡导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使党的思想建设出现了巨大的困难。这是影响党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深刻的原因在党本身。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方式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往的党建理论虽然不能说已经过时,但其中许多内容已经难以用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党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以三大作风为主体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都仍然是正确和适用的。新时期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就是要把这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结合起来,努力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套理论毕竟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也作过探索,但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思想上始终没有跳出搞阶级斗争的框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仍然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会显得十分吃力。如在党执政的情况下,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党政关系?和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弊

端。因此,从列宁开始,党政分开就作为共产党执政的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但是,党政分开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党能进行总的领导而不能代替国家机关进行管理?从以往党建理论中很难找到有说服力的答案。理论上的不完善,导致实践上总是不能摆脱一统就过度集权,一分就削弱党的领导的循环圈。各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践结果,无一不是如此。再如,共产党内为什么会出消极腐败现象?按照以往党建理论的解释,党内之所以会出现腐败现象,是因为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被这些思想所腐蚀,就会滋生消极腐败现象。然而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几乎在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中腐败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并且至今尚无良药可治。相比之下,倒是不少资产阶级政党能够把腐败现象遏制在不危及其执政地位的范围之内。因此,仅用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来解释,已经很难令人信服。西方国家政党对于自己执政有一整套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功效在于,它能够使代表统治阶级的政党在即使社会上存在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的情况下仍能维持政权。我们党不能照搬这套理论。但是,共产党同样需要一套完备的执政理论。然而,应当承认,我们党目前的执政理论还有不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这使它还不足以抵制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等理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建设遇到挑战,人们的思想出现混乱是不足为奇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

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以往党建理论的精华,已经为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确立了基本框架。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基本框架下,探索和完善我们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在党的建设的实践方面,一些陈旧的、带有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痕迹的观念还远未消除。这些旧观念中,最明显、最具代表性的,一是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干部任命制、变相任命制等同起来的观念。这种观念把过去党组织对企业干部的任用变成今天的“参与”,把过去党委的直接决定权变成今天的考察、建议权,而任命权归董事会、厂长(经理),把公平竞争机制引进干部管理,甚至基层干部实行直接选举等,都被看做是对党管干部原则的削弱和背离。二是把党的领导和党组织具体掌握行政与经济管理权等同起来的观念。依照这种观念,党的领导就是各级党组织都要抓具体业务,至少要分掌一定的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由此推论,党政分开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削弱党的权力必然导致削弱党的领导;把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降低为只起监督保证作用、只参与重大决策的“政治核心”也是错误的,因为党在基层不掌握实权,党在整个国家的领导就失去了基础。三是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坚持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等同起来的观念。依据这种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独立性、自主性,允许它们大胆探索、大胆实践,提高地方党组织自主解决本地区问题的能力,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党内民主等,不但不被看做是在发展和完

善民主集中制,反而被看做是在不同程度地削弱民主集中制。四是把党的原则同否定个人利益等同起来的观念。依据这种观念,共产党人讲大公无私,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此,做党员就不能讲个人利益。市场经济的趋利原则同共产党人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本质上是矛盾的。这些观念,显然妨碍我们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受这些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容易把坚持已经逐渐不适应形势的传统的党建理论和实践模式看做是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而把对传统党建理论和实践模式的改革看做是削弱党的建设的行为。这在实践上会导致只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的消极影响,而不见党的建设应当根据实践加以改进、跟上时代步伐的客观要求,怨天尤人,缺乏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两张皮”状况的自觉性。

受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党的建设还未能形成一套系统有效的运行机制。一是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由于没有对为什么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权力相互之间也要制约、为什么共产党掌权也需要监督等基本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的实践是比较零碎、比较不系统的,有时各项操作性措施间是互相矛盾的。例如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定位,如何在同一层次上使各级党的“一把手”的权力受到约束,权和钱之间的关系如何用科学的机制予以规范和界定等,都是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这种状况,导致了党的干部运用权力的失范。二是干部任用制度不完善。

按照党章的规定,党的各级机关由普通党员自下而上选举产生。与此同时,党管干部的原则强调的是对党的干部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二者都是干部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二者更多的是处于一种矛盾状态、非和谐状态。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往往被看做会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而强调选举的作用,则往往被看做是在削弱党管干部原则。这使干部任用工作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失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三是民主集中制不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但是,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党内集中,都需要有具体的操作机制来落实。为了适应计划经济的客观需要,我们党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曾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集中的机制。相比之下,当时党内民主不能说没有,但离建立机制还有相当的距离。这种情况客观上造成了当时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失衡,使集中因为没有民主的约束而变成了高度集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没有从机制上解决问题。四是党群关系沟通机制不完善。共产党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它与人民群众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不存在任何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这个优势同样需要机制来体现。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群众向上反映情况、问题和建议,领导了解基层和群众的实际,群众和普通党员对任用干部、制定决策施加影响,都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实现。这表明,党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不够畅通,制度不够科



学,反馈机制不够灵敏。就是说,这方面的机制是不完善的。沟通机制不完善通常不但会歪曲信息,使领导决策失误,而且使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淡化,群众对党的不信任增长,隔阂加深,这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所面临的这些基本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深刻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紧迫性,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把党的建设的重点放在改进和改善上。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如下:

1. 继续强化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观念。转变观念,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党的建设进行大胆探索的思想前提。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应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真正做到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全党观念的根本转变就可以说实现了。当然,这并不是说邓小平理论就是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的现成答案。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根本特点是改革开放,大胆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关键就是要把握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基本精神,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用改革的精神探索党的建设的新思路。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进行新的创

造,把发展、完善党的建设基本理论摆到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上来。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党的建设理论,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党建理论应当是有明确区别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要否定原有的全部理论。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应当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展这个理论,完善这个理论。因此,对现有的党建理论和体系必须重新审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一般公式上,对需要发展什么,完善什么,坚持什么,放弃什么都要尽量作出具体明确的回答。

2.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党内民主机制。按照党章规定,党员都有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但在实践中,普通党员往往需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这说明,我们的党内民主,总体上还处在党员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普通党员对党的各项决策很难发挥影响的状态。其原因在于,我们虽然已经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原则和主张,却缺乏落实党内民主的有效机制,党内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体制尚未形成。这种状况,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党内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所以,必须把党内民主机制的建设作为今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个重点。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把党内民主规范在严格禁止派别产生的范围内,规范在不妨碍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范围。这项工作很难,但必须去做,否则,我们在党内民主问题上会处于被动,今后再遇政治

风浪,后果难以预料。

3. 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促进党的领导方式的现代化。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首先要着重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政关系(广义地说包括政企关系),建立科学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初就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思路。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把它具体化,使之落到实处。其次,要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运作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要把理论基础建立在任何权力都具有腐蚀性的人类共识之上,靠制度而不是只靠个人的自觉性来规范和约束权力的运用。要特别重视完善基于民主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把干部命运的决定权交到广大群众手中。当然,群众学习民主会有一个过程,其中会出现一些错误,付出一点代价,但这是值得的。过去的教训已经说明,没有这种机制,付出的代价要比建立这种机制的过程中出现失误的代价高得多。再次,要切实提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除了通过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来增强他们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之外,更要重视提高他们把握全局的政治水平。要恢复党掌握政权以前那种党群关系,把领导和管理区分开来,摆脱旧的思维定势,改变长期形成的那种似乎离开权力和行政手段就不会领导的习惯。要把建立党和群众之间良好沟通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作为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职责。

4. 加快改革步伐,以改革的发展促进党的建设的改

进和加强。党的建设的深层次问题,归根结底要靠改革来解决。在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两种情况。一方面,党的建设的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暴露出来,但由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因而问题还会存在下去,有时还会有所恶化。例如,在双轨制存在的情况下,利用政策谋私的腐败现象很难完全消除。另一方面,党的建设的有些问题在一段时间里非常严重,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问题在逐渐消失或弱化。这两种现象都说明,改革的深入尽管会给党的建设带来新情况、新问题,但同样会给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带来新的契机。因此,党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改革,这是党的建设问题治本的途径,守成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党是整个国家政治和上层建筑的核心。党的建设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重要保证,必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进行。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必将有力地促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将为党的建设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我们对此有足够的信心。

2000年1月25日



